


5分钟
系列



简明教会历史

[美] 理查德·W·科尼什 (Richard W. Cornish) 著
杜华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
知
书
屋
PDG

每天5分钟，读懂2000年

读教会历史对我有哪些益处？
我的信仰受哪些教会传统的影响？
各个教派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本书极适合那些生活节奏很快的人阅读。作者以简单实用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教会历史上近百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和许多重要的事件。大力推荐！”

——汉克·法里斯，主任牧师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供了近百个短小的剪辑，每个剪辑都自成一体，其中的教训清晰明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些剪辑促使读者愿意更多地了解教会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故事，而那些正是我们宝贵的属灵产业。”

——唐纳德·范白恩，教授

5 MINUTE CHURCH
HISTORIAN
Richard W. Cornish

ISBN 978-7-5468-0149-0



9 787546 801490 >


定价：28.00元

5分钟
系列



简明教会历史

[美] 理查德·W·科尼什 (Richard W. Cornish) 著
杜华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教会历史 / (美) 科尼什著 ; 杜华译 .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 2010.11

ISBN 978-7-5468-0149-0

I . ①简… II . ①科… ②杜… III . ①基督教史
IV . ① 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532 号

图字 : 26- 2010 -002 号

This edition issued by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with NavPress, a division of The Navigators, U.S.A.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avPress in English as **5 MINUTE CHURCH HISTORIAN**, copyright 2005 by **Richard W. Cor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0 by ZDLBooks.

简明教会历史

[美] 理查德·W·科尼什 (Richard W. Cornish) 著

杜华 译

出版策划: ZDLBOOKS

责任编辑: 侯君莉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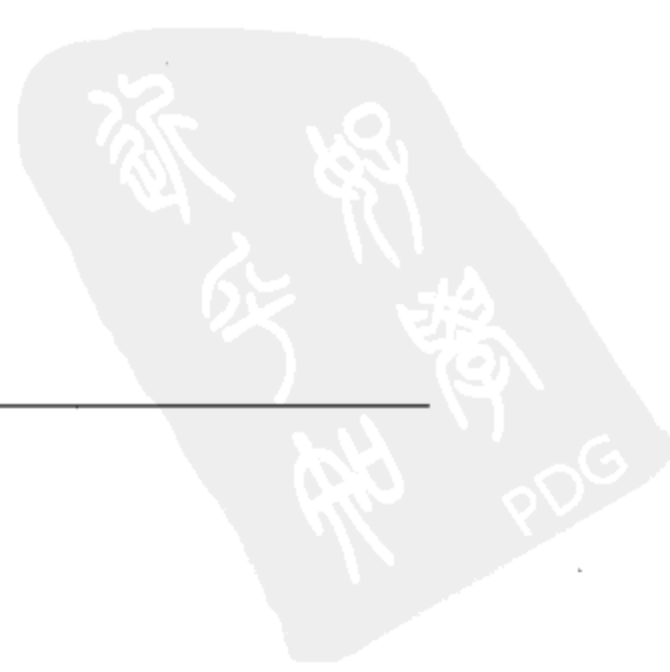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68-0149-0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谨以此书纪念
艾布恩 (Bob Eberz) 先生



致 谢

《简明教会历史》一书得以完成，有赖于许多人的帮助。我曾给我的妻子特蕾茜、儿子斯科特和本读过这本书。为了帮助我完成创作，我的儿子们甚至放弃了陪伴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时间。艾里克·斯坦福、拉歇尔·加德纳、唐·辛普森、达拉·海桃尔、格里尼斯·诺坦以及导航出版社的尼西·乔丹在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均提供了指导。

我的前任行政助理荣达·莫里斯在读过本书的草稿后，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圣经团契教会，将本书的部分章节分发给他们教会中的年轻人，以及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帮助我调查青少年对这本书的接受程度。我还要特别感谢汉克·法里斯博士，是他引发了我对教会历史的热爱。还有唐·范白恩博士，是他发现并帮助我修改了本书中好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地方。

这本书得以面世，也要归功于布鲁斯·德马里斯特博士、肯·冈吉尔博士、克雷格·布隆伯格博士、格登·刘易斯博士、鲍伯·奥斯本博士、名人堂成员及前美国议员史蒂夫·拉吉特先生的鼓励。我还要感谢当初詹妮斯·大卫和乔·西里格的劝导，是他们两人率先敦促我开始了本书的创作。此外，我还要感谢布鲁斯·谢利博士拨冗为本书作序。



也许有人会说，理查德·W·科尼什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些人觉得教会历史像一个堆满杂物的仓库，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科尼什展示给我们的，虽然头绪繁多、事件频出，教会历史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科尼什称之为“属灵的遗产”，他认为教会就是神的家，他不过是讲述了发生在这个家中的故事。

他能将众多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如此流畅而生动的故事，实在令我深为感动。对我们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仅仅是一堆事件。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曾在他的经典著作《回到正统》（*Orthodoxy*）中说，他觉得“生活就像是一个故事”，而且“哪里有故事，哪里就有讲故事的人”。理查德·W·科尼什知道，他并没有创作什么故事，只不过是将自己听过的故事转述给其他人而已。

布鲁斯·谢利（Bruce L. Shelley）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丹佛神学院
教会历史学资深教授
《简易教会史》及《被爱改变》的作者

目 录

引言

第一部分 遭受逼迫的早期教会（公元30~313年）

1. 教会的建立（公元30~100年）五旬节、逼迫及破坏 / 8
2. 殉道者犹斯丁（Justine Martyr, 公元100~165年）死亡的别称 / 11
3. 波利卡普（Polycarp Martyred, 公元155年）殉道的力量 / 14
4. 爱任纽（Irenaeus, 公元130~200年）驳斥异端 / 17
5. 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60~225年）犀利有力的文笔 / 20
6. 俄利根（Origen, 公元185~254年）铁人 / 22
7. 德西乌斯（Decius）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发起的大逼迫
（公元250~303年）逼迫加剧 / 25
8. 圣安东尼（St. Antony, 公元251~356年）修院鼻祖 / 28
9. 君士坦丁大帝及“米兰敕令”（公元313年）宗教自由 / 31

第二部分 经过考验的早期教会（公元313~590年）

10. 优西比乌（Eusebius, 公元263~339年）教会历史之父 / 36
11.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公元325年）一字定乾坤 / 39
12. 亚他拿修（Athanasius, 公元296~373）反对世界的人 / 42

13. 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公元4世纪末期）“卡帕多西亚三杰” / 45
14. 安布罗斯（Ambrose, 公元340~397年）伟人之师 / 48
15. 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 公元347~407年）最伟大的传道人 / 51
16. 耶柔米（Jerome, 公元345~420年）学者中的学者 / 54
17. 奥古斯丁（Augustine, 公元354~430年）从坏小子到伟人 / 57
18. 帕特里克（Patrick, 公元389~461年）既非天主教徒也非爱尔兰人 / 60
19. 迦克敦会议（公元451年）基督是谁？ / 63
20. 努尔西亚的本笃（Benedict of Nursia, 公元480~543年）规定制定者 / 66
21. 凯尔特人的基督教（公元6~7世纪）爱尔兰之光 / 69

第三部分 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教会（公元590~1054年）

22. 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 公元540~604年）教皇的权力 / 74
23. 怀特比宗教会议（公元664年）凯尔特人与罗马人的冲突 / 77
24. 比德（Bede, 公元672~735年）可敬的圣徒 / 80
25. 波尼菲斯（Boniface, 公元680~754年）日耳曼人的使徒 / 83
26. 图尔之战（公元732年）西方的得胜 / 86
27. 查理大帝（Charlemagne, 公元742~814年）巨人国王 / 88
28. 基督教在俄罗斯（公元988年以后）第三罗马 / 91
29. 大分裂（公元1054年）大家庭的致命纷争 / 93

第四部分 中世纪教会的分裂（公元1054~1517年）

30. 安瑟伦（Anselm，公元1033~1109年）专心致志 / 98
31. 克莱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公元1090~1153年）为了上帝的爱 / 101
32. 大学的崛起（公元12世纪）学者云集 / 104
33.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公元1225~1274年）沉默的公牛 / 107
34. 瓦尔多教徒（公元12世纪起）瓦尔多在哪里？ / 110
35. 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公元1330~1384年）宗教改革运动的启明星 / 113
36. 约翰·胡斯（Jan Hus，公元1369~1415年）我愿为真理而死 / 116
37.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453年）第二罗马的灭亡 / 119
38. 古腾堡印刷厂（公元1454年）信息时代的开始 / 121
39. 伊拉斯谟（Erasmus，公元1468~1536年）路德思想的催生者 / 123

第五部分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公元1517~1563年）

40.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公元1483~1546年）“野猪” / 128
41. 路德的试炼（公元1521年）虫宴？ / 131
42. 乌尔里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公元1484~1531年）军牧改革家 / 134
43. 重洗派运动（公元1525年起）激进的宗教改革 / 137
44.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公元1494~1536年）英文圣经之父 / 140
45. 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公元1489~1556年）英国的宗教改革 / 143
46. 伊格那丢（Ignatius）及其反宗教改革的举措（公元1491~1556年）卷土重来 / 146

47. 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公元1509~1564年) 宗教改革运动的规划者 / 149

48. 天特会议 (公元1545~1563年) 确立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 152

第六部分 宗教改革运动的继续 (公元1563~1648年)

49. 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公元1513~1572年) 脾气暴烈的苏格兰人 / 156

50. 胡格诺派 (公元16世纪) 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 / 159

51. 浸信会 (公元1609年) 又一个新教会? / 162

52. 英王钦定版圣经 (公元1611年) 保罗会为之叫好吗? / 165

53. 英国清教徒 (公元16~17世纪) 美国人的先祖 / 168

54. 威斯敏斯特信条 (公元1646年) 完美的概括 / 171

55. 30年战争 (公元1618~1648年) 旷日持久的战争 / 174

56.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 (公元1620年起) 山上之城 / 177

第七部分 理性主义统治时期 (公元1648~1789年)

57.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公元1608~1674年) 第二个盲人诗人 / 182

58. 约翰·欧文 (John Owen, 公元1616~1683年) 清教徒中的伟人 / 185

59. 布莱斯·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公元1623~1662年) 见解独到的思想家 / 188

60. 约翰·班扬 (John Bunyan, 公元1628~1688年)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 / 191

61. 敬虔主义者 (公元17~18世纪) 心灵的宗教 / 194

62. 艾萨克·牛顿爵士 (Sir Issac Newton, 公元1642~1727年) 科学革命 / 197

- 63. 摩拉维亚教派（公元1732年）**现代宣教运动的诞生** / 200
- 64. 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公元1703~1758年）**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 / 203
- 65. 属灵大觉醒（公元1740年）**预备独立** / 206
- 66. 大卫·布莱纳德（David Brainerd, 公元1718~1747年）**印第安人的使徒** / 209
- 67.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公元1703~1791年）**追求完美** / 212
- 68. 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公元1714~1770年）**最伟大的布道家？** / 215

第八部分 宣教运动风起云涌（公元1789~1900年）

- 69. 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 公元1761~1834年）**现代宣教之父** / 220
- 70.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公元1759~1833年）**社会改革家** / 223
- 71. 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公元1834~1892年）**讲道王子** / 226
- 72. 约翰·巴顿（John Paton, 公元1824~1907年）**逃离食人族** / 229
- 73. 德怀特·慕迪（Dwight Moody, 公元1837~1899年）**“疯狂的慕迪”** / 232
- 74. 戴德生（Hudson Taylor, 公元1832~1905年）**入乡随俗的传道人** / 235
- 75.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公元1869~1870年）**权柄属于谁？** / 238
- 76. 慕拉（Lottie Moon, 公元1840~1912年）**浸信会宣教团的圣徒** / 241
- 77. 玛丽·斯莱瑟（Mary Slessor, 公元1848~1915年）**卡拉巴的女王** / 244
- 78. 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 公元1837~1920年）**一切所有都归基督** / 247

第九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20世纪（公元1900~1945年）

79. 世界宣教大会（公元1910年）从西方到全世界 / 252
80. 比利·桑戴（Billy Sunday, 公元1862~1935年）棒球手布道家 / 255
81. 基要派与自由派的论战（公元20世纪20年代）走向极端 / 258
82. 格雷欣·梅琴（J. Gresham Machen, 公元1881~1937年）不是基要派的基要派 / 261
83. 卡尔·巴特（Karl Barth, 公元1886~1968年）“新正统运动”的得胜者 / 264
84. 路易斯（C. S. Lewis, 公元1898~1963年）从无神论者到护教者的转变 / 267
85. 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公元1934年）人人读懂神的话 / 270
86.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公元1906~1945年）做门徒的代价 / 273

第十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公元1946年至今）

87. 死海古卷（公元1947年）从古籍中学习 / 278
88. 卡尔·亨利（Carl Henry, 公元1913~2003年）福音派巨人 / 281
89. 葛培理（Billy Graham, 公元1918~）简洁的福音 / 284
90. 吉姆·艾略特（Jim Elliot, 公元1927~1956年）巨大的牺牲 / 287
91.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公元1929~1968年）“我有一个梦” / 291
92. 弗朗西斯·谢弗（Francis Schaeffer, 公元1912~1984年）真正的真理 / 294
93. 耶稣运动（公元1967~1974年）耶稣迷 / 297
94. 特里莎修女（Mother Teresa, 公元1910~1997年）爱，照亮黑暗的角落 / 300
95. 培养当地教牧人才（公元2005年~）展望未来 / 303

引言

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这样概括教会历史：“保罗死后，福音真理就失传了，教会也开始四分五裂。直到很久以后，马丁·路德出现了，教会这才得以复兴起来。稍后，大量的宣教士受差派出去传教。1953年，我嗜酒如命的祖父得救了，脱离了酒精的捆绑，此后，我的家人也纷纷成为基督徒，然后我也信主了。”这种说法并不算错（假设这位基督徒所述祖父信主的内容是真实的话），然而教会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事，显然远不止这些。

另一种对教会历史的认识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同寝室的室友向我讲解了‘四个属灵的原则’，于是，我接受了耶稣。可是我并不关心历史，也没读过太多这方面的书，我只知道2000年前耶稣替我受死，如今我死后就能上天堂。至于从耶稣的死到我的得救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并不觉得那有多重要。”

这两种对教会历史的说法并非全属杜撰，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些说法的不同版本。难道教会历史除了保罗、马丁·路德，还有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自己得救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认为，属灵上的传承远比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重要得多，毕竟遗传学意义上的传承只

能延续80年，而属灵的传承却要持续到永远。

我的曾祖父詹姆斯·科尼什是一名传道人，在美国西部巡回布道。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圣经，就是他在堪萨斯边境上一座教堂任牧师讲道时用过的。这本圣经显示着这个家族远在康沃尔（Cornwall）定居时的历史（从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家族的来历）。

康沃尔是英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岛，岛上四季狂风肆虐。我在那里的先祖们，很可能是凯尔特勇士，或者是德鲁伊教士。他们当中若有人信奉基督，我希望他们不会成为伯拉纠的追随者，并且希望他们的后代都是清教徒。如果你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甚了解，也不知道这两种人对圣经的忠信度有什么不同，这本书正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我从未去过康沃尔，却很喜欢阅读有关科尼什家族的历史。然而我们的家族史，除了令我们产生既骄傲又尴尬的复杂情绪之外，又能使我们得着什么持久的好处呢（那些死去的先祖看到我们这些后代会很尴尬吧）？

说起我的属灵家族，可以追溯到我一个朋友的家人，是他们把我带到基督面前。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可以追溯到给他们传福音的那家人。但是再往前，追溯的线索就断了，我不知道谁是我的属灵曾祖父，也许这辈子我都不会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多少对我属灵家庭的全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2000年来，各族各方凡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都是我的属灵家人，这其中我想

应该也包括你。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教会历史呢？对于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基督教既是真理也是生命。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前的信徒，都努力要活出这个信仰。如果我们只是学习这些人的教义，而不去了解这些教义是如何被实践的，那么我们对这些教义就仍是一知半解。这些属灵前辈如何实践真理呢？他们虽然死了，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真理。虽然我们并不会盲目地接受他们对真理的所有解释，但我们应该参考这些比我们更属灵的先辈们的看法，不会因为要持守自己看为宝贵的观点而自以为是。教会历史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哪些是纯正信仰的核心教义和观点，哪些是异端的教义和观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研究教会历史时，就会对自己的观点持有更加谦卑审慎的态度。

此外，通过了解以前世代信徒所犯的错误，我们也得到教训，得以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至少从中得到警戒。教会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并不都是圣徒，其中也有一些失败的见证人。这让我们看见，在跟随基督的人中，并不是只有你我才会失败！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活出基督的性情及其属天生命的人，我们乐意效法他们。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普通信徒，靠着神的恩典来信靠他，却从未能得胜到一个地步，得以进入圣经所提到的应许之地。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命状况，我们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步履蹒跚地走在老路上。

到了天堂，我们会直接听到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经历。我特别喜欢听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所以光是这个想法本身就令我兴奋不已。到那时，我会听见主耶稣亲口对我讲述他那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经历，我还会听到摩西、但以理、保罗、马可、亚他拿修（Athanasius）、奥古斯丁（Augustine）、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以及其他许多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只是这些人的部分经历已为我们所熟知，因此，也许那些不为人知的信徒，他们的故事会更加引人入胜，比如4世纪在埃及沙漠独居的那个信徒，或是11世纪生活在欧洲贫民窟的那个信徒，或是21世纪生活在前苏联劳改营的那个信徒。我期望着能听到你的经历，也希望你能对我的经历充满兴趣。

经历并不会因着我们肉体的消亡而终止，我们身后会有更多追随我们脚步的人，继续不断地书写教会历史。我希望神会使用你我来带领这样的人归向他。在天堂里，你会遇见那些你去世后仍在地上继续追随你脚步而行的人，他们会因着你所带给他们的恩典而感谢神。到了教会在地上的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其中会留下怎样的一笔呢？

我编写《简明教会历史》、《简明神学》和《简明护教学》这三本书的初衷是相同的。我当初的想法是想帮助我的儿子们养成思考的习惯，于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写出了这三本书。我想既然我的儿子们在学校、教会或者青年团契都无

法学到有关教会历史的内容，我就应该在这方面亲自教导他们。与另外两本一样，这本书中每章的篇幅也是特意为那些工作繁忙的人设计的。读者可以轻松地读完每章的内容，其中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反映的都是历史的原貌。

这本书适合个人、青年团契以及在家里接受教会历史教育的人使用。这三本书都是一样简明易懂，读者翻阅起来既快捷又方便。我相信它不只是对高中阶段的孩子们有益，也可以使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受益。总之，我们不仅需要威克利夫创办的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我们更需要了解教会的历史。

这本书是按照年代的顺序编写的。第一部分（公元30~313年）记录的是早期教会的历史。那时耶稣刚刚升天，教会面临着四面受敌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世纪早期，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时为止。第二部分（公元313~590年）记录的是教会如何在持守先辈信仰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发展。第三部分（公元590~1054年）记录了教会的强盛与合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马主教制度兴起的时候。这个制度的发展引发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东、西方教会分离，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两个不同的宗派。第四部分（公元1054~1517年）记录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东西方两大宗派）在这一时期各自的发展。第五部分（公元1517~1563年）记录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它对当时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第六部分（公元1563~1648年）记录了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方

社会所产生的后续影响。第七部分（公元1648~1789年）记录了人类理性主义对上帝的启示造成的危害（在某些领域内）。第八部分（公元1789~1900年）记录了宣教运动的兴起。第九和第十部分记录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隔点的20世纪及21世纪初的事件。

我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近百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相关事件——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我的选择。我选择的人物只限于一小群拥有持久影响力的基督徒，其中有思想家、神学家、传教士、殉道者、牧师等；我选择的历史事件也只限于那些给教会带来改变的主要事件，其实除了新约的记载、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和“我外公信主了”以外，还有许多历史事件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本书记载的一些历史事件虽然并非广为人知，它们却曾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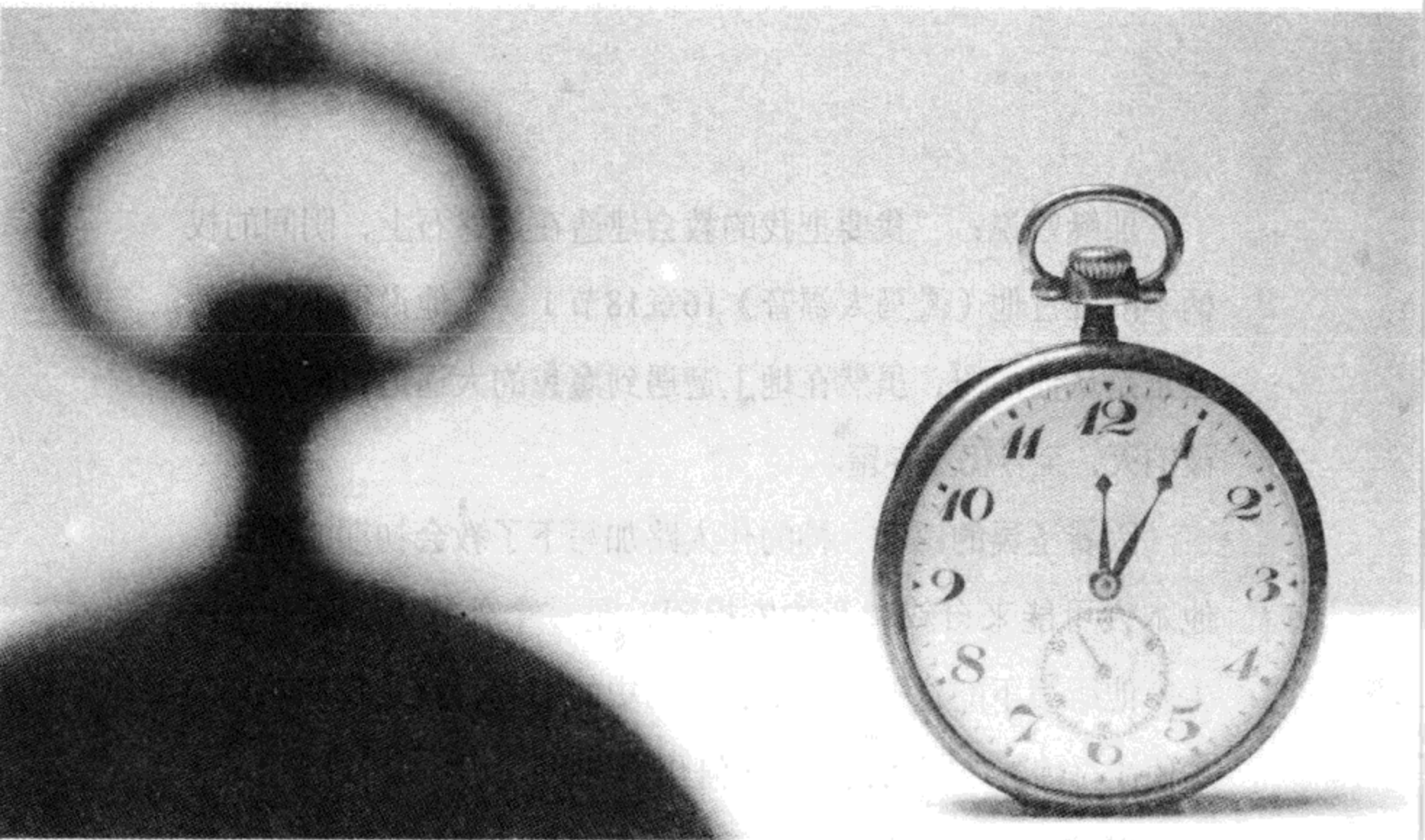
我们共有的属灵产业使我们每一个人从中得到造就，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也在塑造着这个属灵产业。历史让我们看见，人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在这条改变世界的道路上，有许多人走在我们前面。我希望《简明教会历史》这本书可以让读者更深入地挖掘我们所拥有的属灵遗产，并在这份产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一部分

遭受逼迫的早期教会

(公元30~313年)



新
学
社
知
道
就
买
PDG

1

教会的建立 (公元30~100年)

五旬节、逼迫及破坏

耶稣曾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说得不错，教会正是从他而出，虽然在地上遭遇到魔鬼的大逼迫，但并没有被消灭，至今仍然存留。

因着圣灵的感动，神的仆人路加写下了教会初期的历史，他本人可能来自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职业是医生。他所写下的这卷记录了教会历史的书卷，就是我们熟知的《使徒行传》。那么教会是如何开始的呢？

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后的第七周，罗马帝国辖区内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准备过五旬节。当时正有120名耶稣的门徒在一名信徒的家里聚会。聚会的时候，圣灵突然降临到这些人身上，于是他们走上街、走向圣殿。有一群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听见这些加利利人（通常是教育程度很低

的人)用他们各国的语言说话,就非常震惊。在圣殿里,彼得大有能力的讲道使3000人悔改受洗,教会就这样被建立了起来(《使徒行传》1~2章)。

接下来的40年,教会在各地的发展极其迅速,然而教会的扩展也带来了逼迫。犹太公会认为司提反的讲道太过激进,于是用石头将他打死(《使徒行传》6章15节~7章60节)。司提反因此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殉道后,教会大遭逼迫,迫使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四散到各处(《使徒行传》8章1节)。然而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四处传讲耶稣的死而复活,以及他的救赎大工(《使徒行传》8章4节)。

有一位名叫扫罗(后更名为保罗)的青年犹太学者,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大逼迫(《使徒行传》8章1~3节)。后来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使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使徒行传》9章1~22节)。

当教会从犹太全地逐步向罗马帝国全境扩展的时候,对教会的逼迫也变得愈加残酷起来。由于罗马人主张多神崇拜,他们认为敬拜独一真神的基督徒无异于无神论者。再加上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都拒绝将罗马皇帝当做神明来敬拜,这更加激发了罗马人对基督徒的仇恨。一场针对基督徒的大逼迫蓄势待发。与此同时,对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迫害也正在酝酿之中。

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一直充满火药味。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起义反抗罗马统治。罗马人派军队将耶路撒冷团团围住,

围困一直持续到公元70年，最后罗马军队攻破圣城，烧毁圣殿，城中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迁往异乡。而在破城之前，大多数城里的基督徒早已逃走（犹太人认为逃跑就是叛国），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就此分开。基督教的中心向北迁至叙利亚的安提阿，那里的人们听到了上帝的话语，面向外邦人的宣教活动开始了。（《使徒行传》11章19~26节，13章1~4节）。

到了公元70年，大多数使徒都已过世，教会有了新的领导团体。在逼迫和分散中，教会进入到第2世纪。这时的教会仍在传讲相同的信息，只是教会所面对的会众不再局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而是开始走向世界。早期教会预见到所要面对的逼迫，几乎是从容不迫地接受了它。他们认为能为替自己受死的基督殉道是效法基督的最高表现。他们“满心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使徒行传》5章41节）。



2

殉道者犹斯丁

(Justine Martyr, 公元100~165年)

死亡的别称

因坚持信仰被杀害，这样的人被称为殉道者。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这种死法，但2世纪的基督徒犹斯丁，却为信仰而死，事实上，后人称他为“殉道者犹斯丁”。

犹斯丁出生在撒马利亚的一个非基督徒家庭，按异教徒的方式被抚育成人。年轻时，为了探寻真理，他开始学习哲学，研读了斯多葛、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但他并没有从这些人的著作中寻找心灵慰藉和所求问的答案。

他30岁时，有一天在河边行走，遇见了一位老人，便与之攀谈起来。这个老人在与他讨论了神和其他高深莫测的事之后，就建议他尝试走另外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他告诉犹斯丁，古代先知对神的了解远比当代的哲学家更多，他劝犹斯丁去读读他们的著述。犹斯丁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寻求的真理，其内容指向的是基督

以及基督教真理。

在迁居到罗马之前，犹斯丁在以弗所开设了一所学校，但神更多使用的是犹斯丁的写作才能，而不是他的教导才能。公元155年，他撰写了《护教学卷一》这部书，这是第一部基督教护教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公元160年，他又写了另外两部著作——写给罗马议会及国民的《护教学卷二》以及《与犹太人特里弗的对话》。

犹斯丁将《护教学卷一》这本书题献给罗马皇帝安东尼·皮乌斯（Antonius Pius）和他的儿子们，希望能借此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消除人们对基督教威胁帝国安全的顾虑，使基督教能被列为合法的宗教。他在书中辩称，除非基督徒犯下什么罪行，他们不应当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到人们的谴责或惩罚，他在书中还竭力驳斥了关于基督徒行为不端的指控。

作为一名哲学家，犹斯丁本人的书籍所面对的读者都是哲学家。他在自己的书中从理性的角度论证了基督教的真实性。他相信，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头脑来到上帝面前。按照犹斯丁的说法，只有“道”所启示的那位永活的基督才是使人得救的源泉。犹斯丁的写作风格既亲切又令人尊敬，完全没有那种犀利好辩的味道。

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61~180年在位）却极力反对基督教，他把罗马帝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不好的事都归到基督徒头上，并命令处决这些人。165

年，犹斯丁和他的一些门徒因信仰基督教而遭到指控，犹斯丁本人更因为教导基督教真理而被控为非法传教者。在接受审讯时，罗马官员询问这些指控是否属实，他们承认了这些指控，在遭到鞭打后被拉去斩首。其他的信徒都称犹斯丁为殉道者，这个称谓也沿用至今。

犹斯丁并不是第一个宣讲基督教真理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向哲学家宣讲基督教真理的人。他以哲学家熟悉的语言阐明了基督教真理，日后那些基督教思想家，像爱任纽（Irenaeus）、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Origen）和亚他拿修（Athanasius）等人均受到他的影响。

犹斯丁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应当如何使用听众能听懂的语言与他们交流。



3

波利卡普

(Polycarp Martyred, 公元155年)

殉道的力量

使徒约翰晚年一直都在以弗所一带传道。他于公元100年左右去世，此后他的门徒继续完成他的工作，其中一个名叫波利卡普（公元69~155年）的门徒在士每拿（现土耳其伊兹米尔）附近做牧养工作。

我们对波利卡普的出生年月、家庭背景、信主情形或生活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据我们所知，公元2世纪早期，他就已经在服侍社会各阶层的人。他还给腓利比教会写过一封信（类似保罗书信的样式），那间教会事先曾给他写信问过一些问题。他在小亚细亚地区服侍了50年，影响力极大，他的论敌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摧毁众神崇拜的“无神论者”。

他所在的教会记录了他被捕、受审及受难的过程，并将这份记录以信函的形式发往其他教会。小亚细亚省人民对基督徒的仇视迅速蔓延，甚至在士每拿引发了多起暴乱。当权者决定

杀害一批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下，波利卡普的朋友坚持要他藏在城外的一片农田里，他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后来由于一名仆人忍受不了士兵的折磨，供出了他的藏身之地，于是波利卡普被逮捕了。当权者并不想杀他，只是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能放弃他的信仰。

即便是被捕的时候，波利卡普都很慷慨，他请那些前来逮捕他的军官吃饭。他也为他的朋友们祷告，他们也许会因为他被捕而备受打击。

有人详细地记录了波利卡普与行政长官的对话。波利卡普站在人头攒动的竞技场内，他们要求他向恺撒宣誓效忠。面对这个要求，波利卡普回答说，他服侍主已有86年，不可能放弃主。行政长官提醒他说，别忘了竞技场旁等候的野兽将会把他撕成碎片。波利卡普回答说，那就把它们带进来吧。

行政长官告诉波利卡普说，如果他不想被野兽吞噬，还可以选择被火活活烧死。这位即将殉道的勇士提醒这位长官说，有一天他将面对上帝永火的审判。接下来，这位毫无畏惧的圣徒开始祷告，求神接纳他以死亡献上的祭，然后便从容地走向士兵们为他点燃的火堆，去朝见他的主了。

在死亡面前，波利卡普是那样勇敢、风度翩翩，所以，尽管他最后殉道了，上帝却使这一切成为他的凯旋之歌。围观者无不对这位尊者的死感到惊骇。很显然，即便是最残暴

的人，也想不出什么手段来收拾基督徒了，于是不久之后逼迫便停止了。波利卡普的教会每年都会举行仪式，纪念他在火中殉道的壮举。这种仪式成了一个先例，用来纪念殉道者。



4

爱任纽

(Irenaeus, 公元130~200年)

驳斥异端

早期教会除了要面对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以外，还要面对教会内部的异端邪说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但上帝总能使用他的仆人来应对这样的危机，爱任纽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对爱任纽一生的了解极为有限。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地区，年轻时和波利卡普有过一些交往，可能做过他的学生。他曾经去过罗马，之后在法国里昂（当时的官方交通枢纽）定居。公元177年，马可·奥勒留皇帝大力逼迫里昂地区的基督徒，里昂主教伯迪诺斯（Bishop Pothinus）也因此殉道，于是爱任纽接替了他。

爱任纽曾写过许多书，但只有两本流传至今。第一本名为《反对异端》，共分5卷。第二本为《使徒讲道的证据》。这本书将使徒的教训及书信（新约的内容）与旧约的内容联系起来。《反对异端》主要针对当时十分盛行的诺斯底主义，他们

使用基督教的用语传播异端。

诺斯底主义的教导五花八门，但其核心教义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都是邪恶的。只有属灵的、非物质的世界才是美善的。根据诺斯底主义的教导，旧约圣经中的神是一位低等级的神，他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作为他生活的疆域。生活在我们里面的人或者说“精神”是良善的，但却受制于外面这个邪恶的肉体。基督来就是要将我们的灵从肉体的监牢中释放出来。虽然表面上看他也有肉体，但那只是一个幻象。他要教导我们一些隐秘的知识，是关于那位真正的属灵之父的，我们将靠这些知识脱离肉体以及这个世界的辖制。

爱任纽提醒他的读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像诺斯底主义者那样，引用圣经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凡是偏离了使徒教训的教导，我们都需要用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如果诺斯底所说的是从神而来的“真理”，为什么使徒对此“真理”却只字未提？爱任纽从神学的角度澄清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驳斥了诺斯底主义的教导，表明旧约和新约所启示的是同一位上帝，耶稣是他独一的儿子，是“道成肉身”。上帝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其中也包括人的身体，他宣称自己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爱任纽并不是只反对诺斯底主义这一个异端。一位名为马克安(Marcion)的人也认为圣经启示的是两位上帝：一位是旧约中大发烈怒的上帝，另一位是新约中满有慈爱的上帝。马克安

的思想具有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因此他编辑完成的新约正典只包括《路加福音》和保罗的十封书信。当听从马克安教导的教会出现时，爱任纽再次起来著书反对这个异端。他再次强调了一神论的观点以及新旧约圣经的合一性。

爱任纽活着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并未彰显出来。只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他的影响力时，我们才能看清他对教会所做的贡献。爱任纽一直以圣经的教导为基础写作，他的著作坚固了基督教的根基，使其经受住了异端的冲击。他书中所论及的观点也成为日后神学家们研究神学的方向。按照传统说法，公元200年前后，里昂有许多基督徒被杀，爱任纽也在其中。我们无法核实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因为其中的许多细节已无法考证。但是，爱任纽至终为主殉道，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爱任纽让我们看见，按照正意解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圣经，而那些不切实际的揣测、挑剔以及按照私意强解圣经的方式既不合神的旨意，也不可能成为教会承传的属灵产业。



5

特土良

(Tertullian, 公元160~225年)

犀利有力的文笔

2世纪时，罗马人对教会的逼迫越来越严重，有思想的基督徒开始有所作为。他们著书立说，向当时的政治强权和异教哲学发起了反击。其中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学家就是特土良。

特土良是一名驻防在北非迦太基罗马军官的儿子。他早年生活的详情鲜为人知，但据我们所知，他聪明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接受过文学、法律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训练，能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论证严谨的法律问题。特土良正是利用自己高超的写作才能为信仰辩护的。

我们不知道特土良是如何信主的。有些学者推测说，他是被基督徒为信仰殉道的勇气感动而信主的。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也的确对殉道的行为大加赞赏，这似乎证明了这种说法的合理性。

特土良于公元197年开始了他的文字护教行动。他是一个文笔犀利的作家。凡是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无论是教内人士还是教

外人士，他一概撰文加以反击。他的文风严厉、尖刻，与殉道者犹斯丁宽容大度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基督徒忠于国家，本不应当受到迫害，因此罗马人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法的。

他呼吁基督徒将自己从异教文化及哲学中分别出来，他的观点是：“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意思是，属地的哲学与神的子民有什么相干呢？在他的护教理论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基本神学思想的雏形。特土良阐明了“三位一体论”及“基督论”，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

然而，他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倾向最终导致他背离教会，加入了孟他努教派（Montanist）。这是一个强调基督徒需要禁欲的教派，最初起源于小亚细亚地区，后来在迦太基影响巨大。孟他努教派的人相信，他们从圣灵直接领受了一个启示，声称主马上就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因此要求信徒严格遵守饮食条例以及其他一些繁文缛节（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谴责了孟他努教派的做法）。

没有人知道特土良卒于何年何月。传统上有一种说法是他得以颐享天年，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最终为主殉道。不过无论如何，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人们敬仰特土良坚定的信念，但对他强悍的文字风格却批评有加。他所阐述的“三一论”和“基督论”的思想，为教会进一步理解这些基督教核心教义打下了基础，因此大公会议在他死后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仍然受到他思想的影响。

6

俄利根

(Origen, 公元185~254年)

铁人

纽约佬洛·格里克 (Lou Gehrig) 因为连续几年在棒球比赛中没有输过一场球，成为众人皆知的“铁人”。他所保持的连胜记录，直到巴尔的摩金莺队的卡尔·里普金 (Cal Ripkin) 出现后才被打破。同样，俄利根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甚至在惨遭蹂躏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坚韧，也为他赢得了“铁人”这个称号。

俄利根生长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的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的教育及文化中心，他在那里接受了古典文学教育。俄利根的写作才能很强，一共撰写了800部著作，在学术界为基督教赢得了尊重。与此同时，他也给人们提供了正统解经法之外的另一种诠释圣经的方法——灵意解经法。

这位未来的学者17岁时，基督徒开始遭遇大逼迫，俄利根的父亲雷欧尼达 (Leonidas) 也因此遭到监禁。俄利根写信给狱

中的父亲，劝告他为了家人的缘故不要放弃信仰。父亲死后，俄利根也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但他的母亲劝阻他，不许他凭着年轻人一时的热情莽撞行事。于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便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用他教书得来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与俄利根同在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是一位伟大的圣经教师，这场大逼迫迫使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以及他的圣经学校。于是，俄利根18岁时成为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开始了他作为教师、学者以及作家的非凡生涯。逼迫仍然存在，作为回应，他过最简单和最严苛的生活，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公元215年前后，他开始从事写作，他写的圣经注解比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有一个有钱人赞助他出版了他超凡的著作，此人名叫安布罗斯（Ambrose），他出资雇人将俄利根的作品都誊写下来、制成副本，然后予以出版。

俄利根的神学理论融合了希腊哲学的因素。由于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认为圣经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理解：（1）字面意义，（2）道德意义，（3）奥秘之事的属灵意义。他认为理解最后一层意义最为重要。

禁欲的生活使俄利根的身体迅速衰败下来。公元250年，德西乌斯（Decius）皇帝开始迫害这位伟大的作家。德西乌斯想迫使基督教领袖放弃他们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俄利根遭到监禁并遭受了酷刑的折磨，但他向主的忠心仍未改变。尽管不久

之后他得到了释放，但这次牢狱之灾以后，他只活了3年便撒手人寰。

俄利根给我们带来的并不单是某一方面的影响。他才华横溢，又很多产，对教会的影响是超乎寻常的。按照他的说法，基督教不仅使人的头脑得到满足，同时也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是他写下了第一部系统神学专著《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后人认为这部著述有部分内容脱离了正统教义，不过更离谱的是，他的学生们在他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俄利根的本意。

3个世纪之后，在第二届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发起了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俄利根的部分作品被定罪并销毁。按照俄利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合正统的地方，但在他去世几个世纪之后，他的那些观点却被人冠以异端之名。

从俄利根身上可以看出，切不可将圣经与当代哲学混为一谈。此外，俄利根也为那些即将成为学者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除了必须具备聪明的头脑之外，还要有一颗奉献的心，将自己的智慧及热情都献给上帝。



7

德西乌斯 (Decius) 和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发起的大逼迫 (公元250~303年)

逼迫加剧

3世纪中叶的时候，针对基督徒的暴力行为几乎随处可见，施暴的人肆无忌惮、完全不受管制。直到德西乌斯（公元249~251年在位）和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皇帝统治时，任意伤害基督徒的情况才有所改变，那时，在帝国境内实施逼迫，必须听从帝国的统一命令。在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被看做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因此得以合法存在。但是好景不长，罗马人发现这些基督徒其实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群体，并非犹太教的一部分，而且可能危害帝国——至少罗马政府这么想——于是他们决定：除掉这些人。

德西乌斯登基时，罗马帝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对内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对外要抗击哥特人（Goths）的入侵。基督徒敬拜独一真神的做法，无疑挑战了罗马人多神崇拜及皇帝崇

拜的传统。由于基督徒敬拜的是一位看不见的神，于是人们觉得，这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群无神论者。德西乌斯下达了一条法令，要求人人都向罗马诸神献祭，他还下令说，胆敢违反此条法令的人，一律逮捕入狱。他认为这样做必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

那些向罗马诸神献祭的人会得到一张证书，以证明他们对帝国的忠心。那些不肯这样做的人，不是被囚就是被杀。许多基督徒妥协了，另一些坚持不向诸神献祭的人随即被拘禁、受尽折磨并被处决。因着神的恩典，一年之后，德西乌斯在一场与哥特人对峙的战斗中阵亡。他死后，这类逼迫结束了，自此教会享受了40年平静的时光。

3世纪时，社会局面异常混乱，急需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出现。戴克里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一次反对帝国极权主义（意图彻底铲除教会）的军事行动中脱颖而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动机并不十分明确，因为18年来他似乎从未关心过基督徒的状况。那时基督徒已经越来越多，接近总人口的10%，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女儿以及手下的许多军官。退位前的第二年，他下令对基督徒发起大逼迫，这次逼迫的情形极其恐怖。以前，基督徒只是被迫向罗马诸神献祭，这次，罗马人不仅不允许基督徒聚会，而且还损毁教会的建筑物以及圣经，并大肆拘禁教会的领袖。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他退位后不久，所有针对基督

徒的逼迫都平息下来。他的继任者加莱里乌斯（Galerius）曾极力煽动逼迫基督徒，但是他现在终于认识到，任何试图铲除基督教信仰的行为终将归于徒然。被逼迫、杀害的基督徒越多，基督信仰传播的速度就越快。公众再也无法忍受更多的血腥场面了。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说：“就到此为止吧！”于是这场大逼迫终于宣告结束了。这是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中持续时间最长、最血腥的一次。

尽管罗马人以极其残酷的方式逼迫教会，但教会却像耶稣所应许的那样得以幸存，并且日益兴盛。即使在逼迫最猛烈的时候，神带给教会的仍然是祝福。教会在极其严酷的逼迫中，意识到确定圣经正典（教会公认的、由圣灵默示的圣经书卷）的必要性。基督徒必须确知，他们是为从神而来的真理受苦、直至殉道的。



8

圣安东尼

(St. Antony, 公元251~356年)

修院鼻祖

根据圣经的教导，基督徒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们对这个教导的领受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从3世纪末起，开始有基督徒选择过远离社会、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或是一个人独居，或是与一小群人同居。这些人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方式，追求过一种更完全的属灵生活，以独处、祷告、禁食、读经、默想为主。

埃及的安东尼是第一个尝试过这种修道院式生活的人。我们对他所有的了解都出自《圣安东尼传》，这本传记是亚他拿修于公元340年写成的。虽然安东尼可能并不是第一个隐居的基督徒，但他却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所以有人称他为“修院鼻祖”。

他生于埃及的科马村，一个富有的基督徒家庭。18岁时，他的父母双双去世，于是他承担起照顾妹妹以及家庭产业的责

任。不久之后，他在主日去往教会的路上时，忽然想到早期基督徒变卖财产，将所卖收入分给穷人的事（《使徒行传》4章32~37节）。刚巧，那天早上传道人所讲的正是这个内容，他感觉这篇讲道正是给他讲的，于是便将家里所有的产业及财物都变卖了，将妹妹送入女修道院，然后便开始了苦行僧般的隐修生活。

刚开始，安东尼并没有完全远离社会，这使他可以和其他的隐居者一起商讨事情。他希望有一些独处的时间祷告并寻求神。渐渐地，他在附近村庄的村民中赢得了一些声誉，村民因此常跑来向他求问一些事情，他不得不迁居到沙漠的深处。他一共过了20年离群索居的生活，其间遭遇过与魔鬼的争战，也遇见过试探。当他脱离离群索居的生活，重新出现在人们中间时，他发现正有一大群人在等待他，于是他便把这些年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都慷慨地教授给这些人。

他余下的年日，继续在离群索居及群居这两种生活方式中不断交替着度过。他曾去过一次亚历山大，资助亚他拿修反对异端亚流教派（Arianism）的斗争。亚他拿修所写的《圣安东尼传》使安东尼名声大噪。他建立了一所修道院，成为后来埃及全地所有修院效法的模式。

他甚至影响了一个世纪之后的奥古斯丁。这位明日的信心伟人曾在他自己的信主见证中提及安东尼的信主过程。安东尼对其他普通基督徒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尽管这些人可能从未想

过要追求修院式生活，但他们却极为看重独处生活，以及属灵操练。随后的1000多年里，安东尼被奉为修士的典范，并给东方及整个欧洲地区的修院带来启迪。

尽管安东尼严守禁欲的生活方式，他还是活了105岁。死时他几乎一无所有。临死前他请求朋友务必把他那件羊皮外套转送给亚他拿修。没有人知道他的葬身之地，他也没有墓志铭。

安东尼一生专心追寻基督、服侍基督。他发现当人弃绝肉体的享乐时，人的灵魂会变得强盛；当人远离物质的缠累和时代的喧嚣时，灵里会变得通透。过多的物质享受，过于忙乱的生活，都会阻碍人们亲近神。当然，人们不必效法安东尼离群索居的极端生活方式，但可以和他一样过简单的生活，活得更自由、更亲近神。



9

君士坦丁大帝及“米兰敕令” (公元313年)

宗教自由

教会早期遭遇的迫害并没有阻碍基督教的发展。到4世纪的时候，全罗马帝国境内到处都已建立了教会。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发现，一旦政府允许教会合法存在，它就会干预教会事务。君士坦丁大帝在信奉基督教之后，颁布了“米兰敕令”，准许公民信仰自由，其中也包括基督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法令的颁布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结束了基督徒为信仰殉道的时代，罗马开始发展成一个“基督教帝国”。

君士坦丁于公元270年生于巴尔干半岛的一个罗马军人家庭，他父亲最终的军衔为英国及高卢的恺撒（仅次于皇帝本人）。作为一个恺撒的儿子，君士坦丁被列入皇帝候选人的名单，有一天将成为皇帝。为了职业上发展得更加顺利，他以一名军官的身份被送到帝国东部服役。

公元306年，君士坦丁的父亲去世，父亲手下的将领宣告

他成为父亲的继任者。6年后，君士坦丁统帅他的军队，向罗马帝国北部挺进了16公里，前去消灭马克森提（Maxentius）的军队。他期望得到神的帮助去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什么神都可以。战斗开始前的那一夜，他在异象中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十字架，于是他决定将这个代表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放到他的军旗上，然后就带着对这位基督教上帝的信心投入战斗。第二天，他力挫敌军，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半壁江山的统治者。

君士坦丁究竟是真心地信奉基督教，或者只是一名机会主义者，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实在非常有限，而且他直到公元337年去世前不久才接受洗礼，当然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他的确只相信独一无二的神并捍卫了教会的利益。公元313年，他和东罗马帝国的统帅李锡尼（Licinius）在意大利的米兰相遇，两人共同签发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所有人都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允许教会合法存在，并归还12年前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所侵占的教会财产。

但这个宗教自由的法令却令人喜忧参半。君士坦丁自封为教皇和第13位使徒。他认为自己拥有管理教会的权力。由于教会得到了当权者的祝福，导致许多并未信主的人也涌入教会，教会中出现了真假信徒鱼龙混杂的情形。麦子和稗子在同一块田里成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中世纪教会政教合一和钱权交易相互纠结的局面也就此成形，并一直持续了1200多年

才有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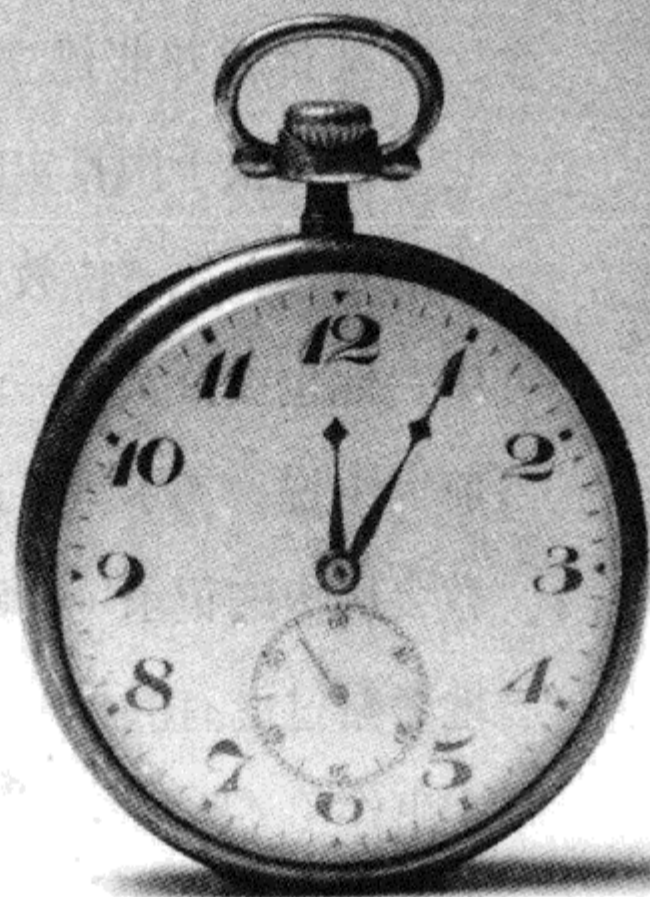
教会与政府之间如何相处？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基督徒。政府允许宗教自由，但它是否期待回报？政府逼迫教会或祝福教会，哪一种情况对教会的发展更有利？在美国，教会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它却受到世俗文化的冲击，影响力减弱。相反，遭到逼迫的教会，却像早期教会一样，福音迅速地兴旺起来。



第二部分

经过考验的早期教会

(公元313~590年)



新
学
社
知
识
产
权
PDG

10

优西比乌

(Eusebius, 公元263~339年)

教会历史之父

基督教并非建立在充满幻想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之上，它乃是扎根于由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构成的历史之中。按照现代人的定义，第一位教会历史学家应该是路加，即使在非基督徒中，他也被公认为一流的历史学家。路加在他所写的福音书的前言中说，为了写下这份圣灵所默示的、关于耶稣生平和早期教会历史的记录（《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他曾详细地考察过已有的相关背景文献，证明这些事都是确曾发生的真实事件（《路加福音》1章1~4节）。

然而，“教会历史之父”的头衔却被授予了优西比乌——第一位将基督教会史详尽记录下来的人。要了解使徒时代末期至4世纪初的基督徒的相关情况，唯一的来源就是他所撰写的《教会史》。他还撰写了歌颂君士坦丁大帝的传记，并因此名扬天下，但是现代历史学家却对这本传记提出了许多质疑，不

知应将这本传记列为历史记录、新闻报道，还是政治宣传作品。

公元263年，优西比乌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师从庞菲勒(Pamphilius)——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学者，后来为信仰殉道。庞菲勒拥有相当多的藏书，其中包括许多俄利根的著作，优西比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作品。

优西比乌生活的时代处在巨大的变革中。他既经历过戴克里先时期的大逼迫，遭到监禁和流放，也曾在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召开时坐在皇帝身边。当优西比乌从流放之地回到家乡后不久(公元303年)，恺撒利亚当地教会的主教便去世了，于是他继任了主教职位，并开始了写作生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他曾对亚流派表示过同情，但在他随后所写的一份信仰告白中，洗清了支持异端的罪名。也许是因为他和皇帝之间私交甚笃，优西比乌后来曾被提名为权倾一方的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但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继续留在恺撒利亚——这里的职位虽然不大，但不需要做很多事，他可以专心从事写作。

优西比乌给我们提供了4世纪初教会的内部视角，以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去描述当时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不失为最好的资料来源，帮助我们了解前3个世纪的教会历史。由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引述了其他人的著作，那些原本会流失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与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许多基督徒一样（也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优西比乌也被他所处时代的文化所蒙蔽，错误地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教会与以往的教会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很少在他所写的著作中看到使徒时代以来，教会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的原因。

作为历史学家、护教学家、神学家、圣经注释学家、演说家以及政治分析家，优西比乌很像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多面手”，但文艺复兴距离他的时代还有1000多年。他在政治上的独到见解，使拜占庭王朝及中世纪教会在罗马帝国倾覆之后，仍存在了长达1000年之久。从现代历史研究及写作的标准来看，优西比乌的著作缺乏客观性的评价与分析，但其优点在于，后世的教会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如果没有他，我们对所谓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前的教会历史，都只能如盲人摸象一般在黑暗中摸索了。



11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公元325年)

一字定乾坤

马可·吐温认为，关注文字细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用一个差不多的字和用一个对的字，其间的差别太大了——就如同萤火虫与闪电的差别那么大。”在神学思想的表达上，一字之差也同样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差别。

君士坦丁大帝本想通过《米兰敕令》给罗马社会带来和平，但这时的教会，自身还没能取得他所预期的合一。当戴克里先时期的大逼迫结束后，君士坦丁又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告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时的基督徒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神学辩论上。有时基督徒之间的争论会演变成如此激烈的论战，以致刚刚形成的社会和谐局面都被他们破坏了。就像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人说的一样：“教会内部的战争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激烈。”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基督徒之间激烈的论战呢？

就在《米兰敕令》颁布的前几年，亚历山大的亚流牧师

（Arius）教导说，基督并不是一位完全的神。他声称耶稣既非永恒也非全能，因此他并不具备与天父相同的本性；事实上，基督自己也是受造之物，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大有能力的天使；基督在被天父创造出来之后，又创造了其他受造物（这一观点类似于今天“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当地的主教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亚他拿修完全不接受这种教导，于是针对这种观点的论战开始了。

君士坦丁大帝并不是神学家，但是，有关亚历山大神学论战的传闻，还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于是他便把各教会的主教召集到一座名叫尼西亚的小城里——距离君士坦丁堡不远——他准备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恢复教会往昔的和平。公元325年，大约三百位主教（其中一些人身上还带着大逼迫时期留下的伤疤）来到尼西亚，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监督下开始了这次会议。

君士坦丁首先宣读了各位主教关于亚流教派问题的书信，并力劝他们共同找出一条合一的道路。许多主教表示愿意在关于基督本性的表述上有所妥协，对此亚他拿修表示拒绝，同时要求发表一个声明，支持基督拥有完全神性的论点。而亚流教义的支持者也宣读了一份他们所写的声明，直接表示他们拒绝承认基督神性论，对此绝大多数主教表示震惊，亚流教派属于异端的观点被广泛接受。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最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他们不

得不签署一份声明平息这个争论。声明中称：基督是具有真实神性的上帝本身，由天父所生，而非由天父所造，与天父拥有“相同的本性”。除了两位主教，其他主教都在此声明上签了名，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也就此宣告结束，至少当时是这样。正统神学的观点以一字之差占据了上风。

虽然“本性相同”和“本性相似”在希腊文中只是一字之差，但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具有“与完全神性相似的神性”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这个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尼西亚信经》的确立，为世界各地各个派别的教会接受正统神学关于基督本性的观点打下了基础。今天，当基督徒被神学思想和教义的精确性搞得晕头转向时，千万不要忘了，即便是一词之差，甚至是一字之差，也会带来很大的差别。



12

亚他拿修

(Athanasius, 公元296~373年)

反对世界的人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次应门的时候，迎进来两个“耶和華见证人”的信徒，试图与我们争辩有关基督神性的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措辞严谨，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若不是我们对圣经有所了解，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意歪曲了圣经真理。非信徒和没有经过培训的信徒很容易被这些人自以为聪明的小手段搅浑了头脑，还以为只有这些刚认识的朋友才是真正认识真理的人，而这真理是那些在教会里的人不明白的。

类似的“真理争夺战”早在4世纪时就已经开始了。正统神学的捍卫者是一个年轻学者，他来自亚历山大，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名叫亚他拿修。关于他的背景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于公元296年生于亚历山大，并在那里的一所基督教学校接受了教育。23岁时，他被亚历山大主教任命为教会的

执事，并以助手的身份，陪同亚历山大主教参加了尼西亚大公会议，并在会议上被要求负责裁决有关亚流教派是否异端的问题。

公元328年，亚历山大去世，亚他拿修接掌了主教的职位。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四十多年间，他一直任主教一职。其间他经历了各样的指控，从行巫术到谋杀不一而足。他曾因为干涉帝国政治，五次遭到流放。也就是说，他在做主教的几十年中有差不多17年是在远离家乡和教会的其他地方度过的。他的个性相当坚毅，为了捍卫真理，他甚至可以站出来反对帝国和整个世界。

他曾写过3本举世瞩目的著作。其中《圣安东尼传》推行修道院制度，给西方基督教带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这本书广受欢迎，因此人们开始认为，只有沙漠中的隐士才拥有真正高尚的基督徒生命。《论道成肉身》这本书阐明了早期教会对于救赎的理解，以及耶稣“道成肉身”成全救赎的需要。它指出，借着耶稣“道成肉身”的救赎，我们得以恢复神最初创造的样子。《反对亚流教派》一书对耶稣完全的神性进行了论证。书中说，耶稣并不像亚流教派所宣称的那样，是由天父所造的被造物，而是与天父同等且与天父同享永生的上帝本身。亚他拿修在尼西亚会议上，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因此这个观点被纳入了基督教正统神学之中。

亚他拿修的一生中，另一件值得人们关注的事是，他所认

定的27卷经卷，后来最终被教会接纳为圣灵默示的《新约》正典。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书卷及其顺序，都与他在公元367年复活节书信中所提到的一致，那是他第一次将《新约》书卷的名称及顺序准确地记录下来。

75岁时，亚他拿修死于任上，那时他关于“三位一体”的观点尚未完全成形，这个观点也尚未被所有的基督徒接受。于是，这项工作便留给了那些在他之后的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Cappadocian Fathers），他们在亚他拿修已建造的根基上继续完善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持守这些教义。

奥古斯丁也把亚他拿修看为信心伟人。这位备受争议的非洲神学家为真理受了许多苦，但他在面对批评、拒绝，甚至整个帝国的反对时，仍然毫不屈服。任主教的时候，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流放或逃亡中度过的。



13

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 (公元4世纪末期)

“卡帕多西亚三杰”

虽然尼西亚大公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但亚流派的人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公元373年，亚他拿修去世后，神兴起了土耳其中部卡帕多西亚地区的三个人，继续为正统神学教义而战。这三个人是：恺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和他的好友拿先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以及他的幼弟尼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被人们称为“卡帕多西亚教父”。由于这三个人所造成的持久影响，公元381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做出了重大决议，确立了圣子及圣灵的神性，并重申圣子和圣灵并非隶属于圣父，而是与圣父同享相同且永恒不变的本性。

巴西流（公元330~379年）生于一个富裕的基督徒之家。还在雅典上学的时候，他便遇见了格里高利，两人迅速成为莫逆之交，这份友谊持续了一生之久。公元356年，他完成学业

返回家乡恺撒利亚。回家后，他并未像他从事律师职业的父亲一样，选择一份世俗工作，而是接受姐姐的建议选择了修道生活，并最终于公元370年成为恺撒利亚地区的大主教。

巴西流撰写了第一本专门探讨圣灵的书籍，其中论证了圣灵完全的神性，他也因此被称为“圣灵神学家”。他创建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院；时至今日，希腊天主教的修士们仍在沿用他当初所设立的修院制度。他死于公元377年或379年的新年。他的工作在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得到了完全的承认，虽然他并没能活着看见这一天，但他的思想被人们推崇，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

拿先斯的格里高利（公元330~389年）生于拿先斯（他因此得名）卡帕多西亚城附近一个富有的基督徒家庭。巴西流曾力劝他接受主教一职，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但这位生性羞涩、书生气十足的格里高利，却更喜欢深居简出、以研究及写作为主的生活。他的书对“三位一体”进行了论证，很有说服力，为下一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但是，到了大公会议召开时，大巴西流却去世了，于是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的要求下，格里高利接受了主持这次大公会议的任命。但好景不长，可能是因为遭受了批评和来自亚流教派的威胁，他最终辞去了主持的职位。

尽管如此，他的神学思想仍然被继承下来。这次的大公会议还影响了从5世纪起就开始使用的“尼西亚信经”的内容。有

些人认为“尼西亚信经”的部分内容正是格里高利在教会受洗时所做的信仰告白。公元390年左右，他辞去了主教一职，并在家中去世，他深邃的思想为他赢得了“神学家”这个朴素的称谓。

尼斯的格里高利（公元340~395年）并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只在他哥哥巴西流的手下受过教，但他卓越的头脑弥补了他受教育上的不足。他曾在卡帕多西亚的尼斯做过几年主教，巴西流去世后，他继承了哥哥的衣钵，继续为捍卫“三位一体”的教义而奋斗。有些学者认为他是早期教会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作为神秘主义者和学者，他所创立的神秘主义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东正教教会。

格里高利在他所撰写的许多书籍中都是以希腊哲学来显明上帝的奥秘。他对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贡献颇多。在会议的开场演说中，他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立场，还重申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部分结论。他死于公元395年。

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在捍卫教会正统教义、抵制亚流教派侵蚀的过程中，以及确认并澄清圣子及圣灵的神性问题上，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4

安布罗斯

(Ambrose, 公元340~397年)

伟人之师

奥古斯丁是4世纪的伟人，甚至可以说，在公元1000年以前的教会历史上，他都算是伟人。上帝使用很多人带领他归向基督，其中，安布罗斯可算是最杰出的一个。

安布罗斯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基督徒家庭，他的父亲名叫奥勒流·安布罗修（Aurelius Ambrosius），是当时英国、西班牙和高卢的总督。作为总督的儿子，安布罗斯在罗马接受了教育，希望将来能在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谋到一个职位。

公元365年，他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又成为意大利北部米兰地区的总督。公元374年，米兰的主教去世后，人们都要求安布罗斯继任他的职位。他将这次公众的呼吁看成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便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全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为自己的新使命做着准备。他成为西方教会中最杰出的传道人，也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东方教会中只有约翰·克里索斯

托 (John Chrysostom) 与他齐名。在神学上，他的观点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认为人的过犯、包括基督徒的过犯，都是由原罪造成的——奠定了基础。除了牧养一间颇具影响力的教会之外，安布罗斯还成为当时在米兰生活的皇帝一家的密友及顾问。

在那个历史时期，罗马帝国的国教就是基督教。如果你是罗马人，那么你就是基督徒（或者说你最好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可以领到犒赏，而非信徒则会遭到惩处。当时的皇帝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而安布罗斯却反对这种提法。当时，狄奥多斯皇帝为了一件很小的政治事件，下令屠杀7000名帖撒罗尼迦人，安布罗斯因此开除了狄奥多斯皇帝教籍，以此作为对这个事件的回应。不久之后，皇帝为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悔意并公开赔礼道歉。安布罗斯主教勇敢地阻止了罗马政权试图管理教会事务的企图，这样的事在安布罗斯的监督下没能发生，至少没有大规模地发生。

安布罗斯最大的成就并不在于他对皇权的限制，而在于他对奥古斯丁的影响。当时的奥古斯丁是米兰大学修辞学的教授。有一次，他前来聆听伟大的安布罗斯讲道，本想只听听讲道的大意就行了，没想到却被安布罗斯讲道的内容及口才降服。圣灵借着安布罗斯所讲的道，紧紧地抓住了这位未来教会巨擘的心。基督教的智慧与文学的结合之美，令奥古斯丁如醉如痴。

安布罗斯是一个勤奋好学、被圣灵充满、熟谙政治、了解多种文化的人。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并率先将唱诗赞美引入到天主教的敬拜仪式中，还亲自编写过许多赞美诗。他所著的《论信心》及《论圣灵》这两本书，为天主教神学确定了方向。安布罗斯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事实上，他至今仍被人们列为西方教会的四大学者之一——其他三人是耶柔米（Jerome）、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



15

约翰·克里索斯托 (John Chrysostom)
(公元347~407年)

最伟大的传道人

在伟大的传道人层出不穷的时代，约翰·克里索斯托可算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了（希腊人称他为“金口约翰”）。他出生于一个社交圈很广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安提阿的一名政府官员。作为一个著名的知识中心，安提阿可向人们提供最好的教育。约翰在一名非基督徒演说家利巴尼(Libanius)手下受教，学习了古典文学、法律和修辞学，还师从大数的狄奥多鲁 (Diodorus of Tarsus) 学习神学。

约翰一直以来很喜欢禁欲苦行的生活。他寡居的母亲死后，他一个人跑到山洞里，一住就是两年，并将整卷《新约》背诵下来。虽然严酷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但他的灵性却有所长进。后来他重新回到人群当中，开始在教会中服侍，并最终被任命为安提阿的主教。

在讲道中，他谴责社会上层人士奢靡腐化的生活、濫用权

力的行为，这使得他的讲道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却因为侵犯了达官贵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约翰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这些人的反对中）。尽管约翰表示他不愿涉入政治，但他在讲台上所发出的声音还是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公元397年，皇帝迫使约翰接受了君士坦丁堡主教一职，使他成为新罗马帝国政府的一员。

尽管生活在皇帝的管制之下，约翰仍然不肯低头，在讲道中继续抨击政府滥用权力和教会滥用钱财的行为。他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的家人，把欧多西娅（Eudoxia）皇后比做耶洗别。他对上层社会的声讨，还有他简朴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他用教会的钱为穷人建造医院，导致他于公元403年被定罪并被罢免，且被强行流放到罗马帝国的偏远之地，结果，街上因此而发生了暴乱——说明他在老百姓当中受欢迎的程度有多高。流放期间，约翰死于营养不良和太阳暴晒。

约翰对圣经的认识都源自一个信念——他相信圣经是由神亲自默示的，其中每个字都由神亲口所授，因此每个字都传达着神的旨意。约翰就是这样把神在每节经文中原本的意思传达给他的会众，并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在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中应用这些经文。

约翰的讲章有800多篇流传了下来，比任何教父留下的讲章都多。他通常是将一卷书中的每节经文都加以解释，同时还介绍每卷书的作者、受众、意图、梗概和主题。他这样做主要有

两个目的，其一是帮助会众理解经文的字面意义，其二是鼓励会众在生活中应用这些经文，改变自己的行为。约翰服侍的根基是，不仅让会众学习神的话语，而且让会众活出神的话语。会众都极其喜爱约翰的讲道，以致他不得不时常在讲道中停下来，请求会众不要鼓掌。虽然他的讲道通常都要持续两个小时以上，但会众还是希望他的讲道次数能再多一点、时间再长一点。

约翰·克里索斯托留给后人的属灵产业，也涉及神学范畴。许多东正教会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讲章，特别是那些关于保罗书信的讲章，极大地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路德和加尔文。这位拥有先知恩赐的传道人，在地上所得的赏赐，除了流放就是死亡；但他研究圣经和教导时，忠实于经文原意、不按私意曲解经文的态度，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他并不是一个只满足听众耳朵的传道人，而是一个能满足听者心灵的传道人。



16

耶柔米

(Jerome, 公元345~420年)

学者中的学者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觉得古代文献（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典”）十分重要了。但是，不久之前，懂得希腊文或拉丁文还会被看成一个人受过教育的标志。早期教会的许多思想家，为了能读懂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都接受过古典语言方面的训练。

耶柔米就是这些杰出思想家中的一个，他在古代语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看起古文文献来就像我们今天看报一样容易，因此他也被称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拉丁文作家。到了4世纪末，基督教成了合法的、几乎是强制性的宗教，这促使普通大众蜂拥进教会，想要看看里面到底在教导些什么，于是对圣经学者的需求开始激增，而像耶柔米这样的学者刚好能满足这个需要。

在罗马完成了正规的学习后，耶柔米于公元372年转到叙利

亚学习修院制度，并师从沙漠僧侣学习希伯来语。他后来还曾为罗马主教达玛苏（Damasus）做过两年的助理。与此同时，耶柔米还为好几家声名显赫的罗马家庭做属灵导师。公元386年，他返回东方，在伯利恒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做院长，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死于公元420年9月30日，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一天列为圣耶柔米的纪念日。

在西方，人们对东方通用的希腊语已不再熟悉，因为西方通用的语言为拉丁语。曾有人尝试将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但这些翻译作品的效果均不理想。于是，达玛苏主教请求耶柔米来翻译一本比较准确的拉丁语圣经，他同意了。耶柔米用了2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浩大的翻译工程。他所翻译的这部圣经，称为武加大圣经译本（Vulgate），直到今天仍为罗马天主教官方使用的圣经版本。这个圣经译本的质量非常高，以致1000年后，马丁·路德——一个能读懂圣经原文的人——仍从这个拉丁文译本中引用经文。

耶柔米并未就此止步，他又为圣经经文作了注释，并和许多人一起（其中也包括奥古斯丁）投身到当时神学教义的论战之中。

作为一个学者，耶柔米留给我们的属灵产业是无与伦比的，连奥古斯丁也认为耶柔米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在圣经方面的知识极为丰富，这么多世纪以来仍无人能超越。他所撰写的修院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修院制

度的发展。他对圣经原文极其熟悉，这仍是翻译工作者们力求达到的标准。

耶柔米也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者，他懂得如何从事研究，善于从其他学者以及学派那里取长补短。他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圣经的研究当中，因为他知道只有在圣经中才能找到永活的道，即生命的源头。



17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公元354~430年)

从坏小子到伟人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不会既具备学者的智慧又具备牧者的心，但奥古斯丁这位公元1000年以前最伟大的神学家却二者兼备，而且备受人们喜爱。公元354年，奥古斯丁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Thagaste），他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努米底亚人（Numidian）的后裔，这是一个早就存在却鲜为人知的大族。

奥古斯丁由身为基督徒的母亲莫尼卡抚养成人。小时候，他是一个喜欢偷窃、撒谎、逃学的孩子，经常因为品行不端而遭到惩罚。12岁时，他被送往马多拉（Madaura）附近的一所学校就读，在那里培养了两方面的兴趣——一方面是知识，另一方面是情欲，这充分反映出他拥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16岁时，他的一个出身富裕的朋友，替他支付了在迦太基继续深造的费用。迦太基是一个外邦城市，里面充满了他母亲所反对

的诱惑，但奥古斯丁的情欲却在那里完全地宣泄出来。与此同时，他在学习上的热情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在拉丁文、修辞学、数学、音乐和哲学等领域均有涉猎。

奥古斯丁的求知欲逐渐发展成为对古代宗教中所蕴藏的智慧寻求。后来，他归信了发源于波斯的摩尼教异端（Manichean cult），之后他前往罗马并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不久之后，米兰大学聘请他为修辞学教授。当时米兰的主教是安布罗斯——一位具有圣徒气质的神的仆人，他在讲道上显露出来的卓越才能，甚至连奥古斯丁也感到十分羡慕。在安布罗斯身上，人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竟然也可以是口才超凡的知识分子，这令奥古斯丁非常敬佩，并因此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的立场。

他渐渐相信基督教信仰是真实可信的，但直到公元386年夏天，他才准备好成为基督徒。有一天，他正坐在一棵无花果树的荫下思考，这时，他忽然听见一个孩子唱出一句歌词：“拿起来读。”他从未听过这首歌，也不知道这句歌词的意思是什么，但他还是打开了圣经，看到《罗马书》中这样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章13~14节）这段经文让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于是来到基督面前寻求赦免。

奥古斯丁回到北非，过起了一种以祷告、学习和默想为主

的修道生活。但是公元391年，希波城的基督徒却硬将奥古斯丁按立为希波城的牧师。尽管有些勉强，奥古斯丁还是接受了这个安排，他用一颗爱心在希波教会服侍了4年，并于4年之后被提升为该城的主教。成为主教后，他仍然继续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并拒绝接受任何特殊的礼物或款待。他在主教任期内所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就是在帝国首都罗马被蛮族倾覆，并遭到劫掠时，安慰他所牧养的百姓，劝告他们不要只为自己的性命忧虑，而要向那些逃亡的难民提供帮助。

在主教任期内，奥古斯丁从未停止过教导神的话，即使是在他与伯拉纠——英国的异端鼓吹者——关于救恩教义的论战最激烈时，他也仍在用圣经上的话语教导自己的百姓。在公元430年去世之前，他一直借着神话语的光照，看清生活中各样事件的本质。

奥古斯丁是具有思想的牧者们的榜样，是连接古代神学及中世纪神学的桥梁。他极大地影响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为当代的神学家们带来启迪。他是一个将真理与爱完全集于一身的完美典范。



18

帕特里克

(Patrick, 公元389~461年)

既非天主教徒也非爱尔兰人

虽然人们是以身着绿衣、上街游行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爱尔兰的圣徒圣帕特里克，但他其实既非爱尔兰人也非天主教徒。我们对帕特里克的了解，有一部分属实，也有一部分来自于传说；但从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来看，他确实是一位真心信仰上帝的人。

公元389年，帕特里克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他的父亲是当时还是罗马帝国行省的英国的一名公务员。4世纪末，罗马军团将英国弃置于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入侵者手中。16岁时，帕特里克被劫掠英国西海岸的奴隶贩子捕获，被卖给一个爱尔兰农民，为他养猪。在为奴的6年中，他对自己的生活以及从小就接受的基督教信仰进行了反思，这时他的灵性得以成长并渴望得到自由。

一次，帕特里克在梦中被告知，有一艘船正等着来接他，

于是他逃到海边，在那里登上了一艘往法国运送猎犬的货运船。由于他有养猪的经验，他们允许他免费登船，让他帮忙照料船上的猎犬。在法国上岸后，他找到里维埃拉附近的一座岛屿，进入岛上的一所修道院。

后来，帕特里克返回英国，与家人团聚。在英国时，他做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梦，类似保罗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的异梦（《使徒行传》16章9~10节）。梦中有一个爱尔兰人请求他，将福音带回他年轻时的为奴之地。他顺从了这个异梦的带领，但觉得自己还需要装备，于是便进入高卢的一家修道院学习。

后来，他回到爱尔兰，在一群凯尔特人中间开始了福音工作，却遭到德鲁伊祭司们的反对。但是，他相信神的大能，这信心使他不惧怕这些人向他发出的死亡威胁。魔鬼的工作如此真实，灵里的争战也异常激烈，与此同时，帕特里克的的工作进展却十分缓慢，许多他带领信主的人重又转离归信了异教。他用大部分的时间去说服当地部族首领归向基督，他相信既然能赢得首领的灵魂，就一定能赢得其他土著的灵魂。他在当地传福音的时候，也把对学习的热爱和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带给了他们。那些他引领归主的部族首领的儿子们，大都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士，并成为他所建立的教会中的牧师。他一共在爱尔兰服侍了30年，最后在当地去世。

在帕特里克之前，英伦三岛上的人对基督教可算是一知半解，他们还是从古罗马兵团撤离时留下的一些基督徒口中，听

到关于基督教的一些事情。然而，帕特里克去世时，基督教在爱尔兰已经根深蒂固。历史学家估计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一共建立了200个教会，并为10万人施洗，使他们成为基督徒。是他率先创办了爱尔兰的修院制——使人类文明及大量的古籍得以在“黑暗时期”被保留下来。为了伸张神的公义，帕特里克还终止了爱尔兰的奴隶贸易。帕特里克去世后的两个世纪中，有几百位凯尔特修士效法他的榜样，离开了家乡，把福音传遍了欧洲西部。

这位谦逊的人深爱着他的上帝。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上帝，过着以祷告、读经和服侍为主的生活。他虽然取得了如此的“成功”，看待自己时却仍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他在服侍神、服侍那些曾经奴役过他的人时，彰显出非凡的勇气。



19

迦克敦会议 (公元451年)

基督是谁？

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和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确立了基督的神性，但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基督是神，他怎么能同时又是人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兼具神性和人性呢？他所有的神性是完全的神性，还是部分的神性？他的人性是和我们相同的人性，还是不同的人性，还是混合了神性的人性？如何看待基督又是神又是人的事，他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两个人的混合体？当约翰写下“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1章14节）时，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教会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三种说法得到了最多人的支持。第一种说法是由亚波里拿留（Apollinarius）提出的。他说，神的话语替代并控制着耶稣的头脑和心灵，只有耶稣的身体属于人，但这个外在的躯体受到他里面神话语的引导。亚波里拿留在这个说法中放弃了耶稣的人性，以求

达到耶稣在人性和神性上的合一。第二种说法是由聂斯托利（Nestorius）提出的。他虽然保留了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他过激地认为在耶稣的身上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位格——一个是人，一个是神。故此，聂斯托利完全否定了基督在神性和人性上的合一。第三种说法是由欧迪奇（Eutyches）提出的。他尝试将基督的人性归入到神性中，想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虽然保留了基督的神性及合一性，但却淡化了耶稣的人性。

451年5月，马西安（Marcian）皇帝邀请教会的主教们聚集到他的京城君士坦丁堡附近的迦克敦，希望解决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但是主教们却以智慧的方式回避了对这个奥秘问题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在召开了15次会议之后，500位主教确认了前几次大公会议的声明，此外又新加入了这样一个内容：基督是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的一个人，他既是真实的神，又是真实的人；他的神性和人性并没有混杂；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这个结论，是教会对“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直到今天，我们在谈到基督时仍继续沿用这个说法。在迦克敦会议上，亚波里拿留的说法遭到了主教们的反对，因此，基督完全的人性得到了捍卫；聂斯托利的说法也遭到反对，因此，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合一得到保护；主教们还一致反对欧迪奇的说法，不允许他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

迦克敦会议的决议得到了罗马天主教、基督教和绝大多数东正教的认可，只有少数东正教会表示反对。在叙利亚，支持聂斯托利观点的教会拒绝接受大公会议的解释，从这些教会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对意见。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土著基督教会也因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从东正教中分离出来。“单一性”教会（**Monophysite branch of the church**）的建立是教会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分裂，这次的分裂比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大分裂早了6个世纪。

尼西亚大公会议、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以及迦克敦大公会议没能完全回答我们在三位一体及基督本性上所有的问题，但这3次会议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使教会的正统教义得以从异端中分离出来。迦克敦大公会议是基督教主要派别共同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公会议，它宣告了教父时代的结束，从这时起，教会显示出一些特征，越来越趋向我们所说的“中世纪教会”了。

迦克敦大公会议让我们看见，教父们如何通过思考和学习，在解释那些影响我们的生活、决定我们的命运的圣经教义上，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20

努尔西亚的本笃

(Benedict of Nursia, 公元480~543年)

规定制定者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当权者和教会同谋，阻碍人们在思想上的交流，结果导致欧洲的文化生活几乎陷入死地。但在修道院中，修士们的学习热情仍然十分高涨，他们抄写并保存圣经、早期教父的作品和其他古代文献。此时的蛮族已经推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借着修院制度这个桥梁，人类文明被接续起来——这是一座承接古代圣贤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的桥梁。

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修院成为比教会更能培养人灵性的地方，修院对灵性的要求十分严格，它要求对修士进行严格的训练，训练意味着要有纪律上的约束，而纪律上的约束意味着必须要遵行一定之规。本笃在制定修院制度这方面可谓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本笃生于位于罗马东北部137公里的努尔西亚，曾被送到

罗马接受教育。抵达罗马后，整个社会背离基督教导的败坏状况，令他感到异常震惊，于是这位未来的“西方修士之祖”便跑上山，过起了修道的生活。

有将近3年的时间，他住在一个山洞里，每天读经、祷告，过着一种舍己的生活。附近一所修院的修士都被他这种献身精神所感动，就来请他到修院任院长。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修士们发现他所定的规条太过严厉，就想要毒死他。本笃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就离开修院，重新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本笃苦行式的生活方式吸引了许多人来跟随他。于是，在公元529年，他就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创建了现在非常著名的修道院。他研究了历代属灵之人的智慧，其中也包括创建修院制度的圣安东尼和北非著名的思想家、神学家奥古斯丁，并从一本名为《古代圣贤之规》（*Rule of the Master*）的文献中得到许多启发，然后将自己所拟定的规定写了下来。这些规定成为修院的纪律手册，并作为后世人们制定规定的范本。他所制定的规定最大的优点就是平衡性，他深知人的本性，知道如何借着规定适当地激发人们的修道热情。

本笃的规定受到了普通男女、灵性成熟的圣徒以及苦行僧中的佼佼者的欢迎。他认为，修院应该交由修士们选出来的院长管理。既然修院外的世界对灵性生活不利，那么大家就退回到高墙之内，过灵修式的生活。修院内平安稳妥的生活，让修士们在远离世界喧嚣的地方找到了自由，并借着读经、祷告和

服侍走上了属灵之路。修士们每天都要聚集祷告7次，并要阅读和誊写拉丁文古籍，还要从事体力劳动，以供应修院自身的所需。

随着时间的发展，西方的修院制度已不复存在，但本笃的规定却作为一种标准被保存下来。他在蒙特卡西诺所建立的修院，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之后，幸运地得以保全。在极为残酷的中世纪，修院成为保护古籍的最佳之地，它对西方的宗教生活及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

今天的人经常指出修院制度的存在纯属多余，但它们的确存在过。那个时代的人所犯的错误，绝不会比我们今天的人更糟。如果我们选择过追求极端物质享乐的生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责那些为了追求上帝而选择极端舍己生活的修士呢？我们与其盯着修士们的错误不放，还不如更多地观察一下他们受纪律约束的生活，学会如何过一种更为有序和圣洁的生活。



21

凯尔特人的基督教 (公元6~7世纪)

爱尔兰之光

第5及第6世纪时，蛮族入侵欧洲，只有爱尔兰幸免于难。当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蛮族之手时，凯尔特基督徒的精神及属灵生活却得以延续。加上欧洲当时盛行的修院制度，凯尔特教会在那个黑暗时期就像是一道明光照耀，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就是因着爱尔兰得以被保全。

虽然当时罗马天主教占主导地位，但凯尔特的新教却极其复兴。由于爱尔兰与其他大陆并不相连，那里的基督徒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教会完全不同的道路。福音并不是从罗马传入爱尔兰——凯尔特人根本没打算降服于罗马人的统治。凯尔特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立性，常常令罗马人感到头疼，因为当时罗马的主教已被许多人公认为教皇。

凯尔特基督教的独特之处还包括：主教没有明确的权限、复活节的日期不同、其修士习惯于将头顶前半部的头发剔掉。

尽管如此，凯尔特基督教持守的却是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其神学思想反映出巴西流、约翰·卡先（John Cassian）、耶柔米、奥古斯丁、亚他拿修等人对他们的影响，这些人的著作在爱尔兰各修院的图书馆中均可看到。

当蛮族焚烧掳掠欧洲大陆的时候，爱尔兰人却在专心做着学问。他们热爱学习和读书，为每本书都作了精美的说明，并为所能找到的古籍制作副本，以这样的方式将过去的历史和伟大的思想保存下来。后来欧洲大陆之所以能成为书的世界，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爱尔兰修士的贡献。这些修士在做学问上的热情，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皇家的顾问。

爱尔兰教会对宣教的热情不亚于他们对书籍的热爱，正是爱尔兰的基督徒把福音带到了各地。他们相信，属灵之人最大的标志就是随处传福音。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爱尔兰基督徒成为西欧最主要的宣教力量。他们最早是在苏格兰北部传福音，后来又前往苏格兰南部，深入到康沃尔地区，最终又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甚至还抵达了冰岛。

这些传福音的勇士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科伦巴（Columba，公元521~597年）和科伦巴纳（Columbanus，公元550~615年）这两个人。科伦巴在苏格兰和英国建立了多所修道院，其中包括在苏格兰西海岸的一座小岛上建立的，著名的艾奥纳修道社区（Monastic Community of Iona）。科伦巴去世时已是人们所公

认的诗人、学者和创意型的领袖。科伦巴纳离开爱尔兰前往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修道院，有大约60所修道院是在他最初的工作上建立起来的。他是一个有名的急性子的人，与国王和教皇都发生过冲突，但人们却公认，他是西欧传道者中最具影响力的福音使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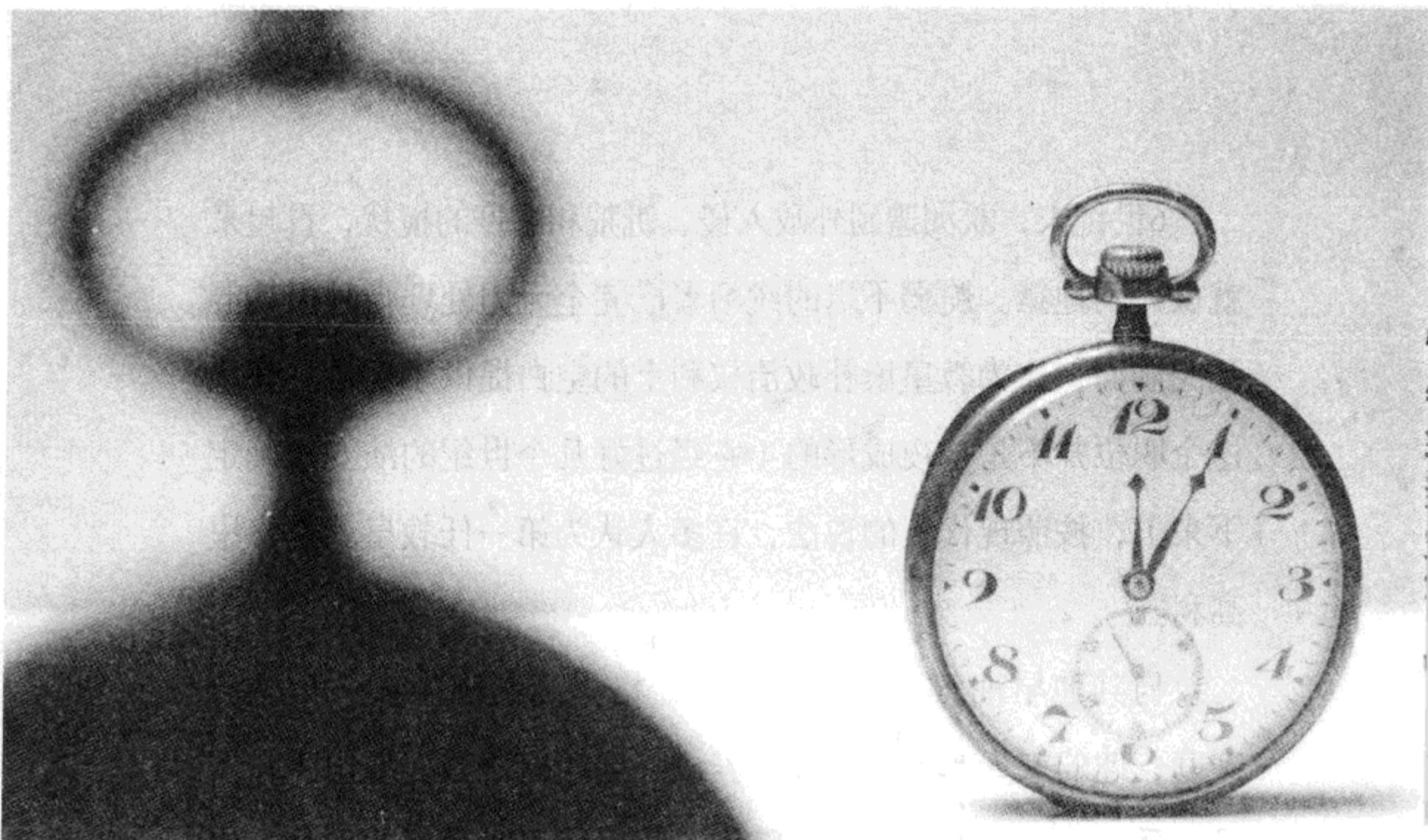
上帝大大地使用了爱尔兰教会，虽然这段时间持续得并不长。维京人记录了他们于公元793年第一次袭击爱尔兰人的情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入侵爱尔兰，后来为了便于劫掠爱尔兰内陆那些更大、更富有的修道院，他们干脆就在这个北部英伦小岛上定居下来。到了9世纪后期，维京人永远定居此地，但是由于他们被当地的爱尔兰人同化了，最终也都皈依了基督教。又过了一个世纪，爱尔兰教会不再与罗马教会划江而治，但它曾经的辉煌至今仍被人们所纪念。



第三部分

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教会

(公元590~1054年)



数字知识
PDG

22

大格里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公元540~604年)

教皇的权力

6世纪末，欧洲遭到外敌入侵、饥荒和瘟疫的搅扰，看起来就像人间地狱。脆弱不堪的统治者已完全无力处理当时极其混乱的局面，这为教皇填补政治权利上的空白提供了契机。教皇这个职位并不是一夜成形的（它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演变才确定下来），按照现代人的说法，许多人认为第一任教皇就是格里高利。

与其他早期教会的领袖一样，格里高利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人都希望把他培养成一名政府职员。他出生在罗马，后来在罗马的一家修道院里，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格里高利的父亲希望儿子可以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公务员，但父亲死后，格里高利却把自己所继承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并将自己名下的产业改建成一所修道院。

格里高利本想过一种以治学和修道为主的简朴生活，但是

33岁时，他却被犹斯丁皇帝（Emperor Justin）任命为罗马市长。公元579年，罗马主教伯拉纠二世（Roman Bishop Pelagius II）将他派往君士坦丁堡，作为驻东罗马帝国的大使。6年后，他离任返回，人们发现他才华出众，便希望他担任主教一职。为了逃避这一任命，他选择了逃跑，但人们最终把他找了回来，并于590年强迫他接受了这项任命。

格里高利的一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年轻时曾想到英国做一名宣教士，却没能成行。但他当上教皇之后，也许是想与爱尔兰教会一争高下，他任命奥古斯丁（并非北非的那位伟大的奥古斯丁）带领40名宣教士前往英国宣教。当伦巴第人入侵的时候，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他亲自参与了集结军队、指挥军队将领以及与入侵者和谈的工作。为了规范教会的管理，他撰写了《牧者纪律手册》（*Book of Pastoral Rule*），还写了几百封个人书信向主教们提供指导。他还将本笃所制定的规定定为西方修道院通用的正式规定。

格里高利是教会所公认的四大学者之一，他得到这个头衔并不是因为他创造出什么新的神学理论，而是因为他将已有的神学理论正式纳入到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之中。此外，他还间接地影响了900年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因为他所确定的部分教义，引发了身为奥古斯丁修会修士的马丁·路德的强烈反对。

这些教义包括：人类可以靠着与上帝合作赢取上帝的恩

典，因为人类并非完全堕落；我们得到赦免的基础是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向天堂中的圣徒祷告，请他们帮助我们；圣物具有神的大能；在进入天堂前，我们还需要通过炼狱；我们在圣餐中所领受的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教会的传统与圣经具有同等重要的权柄。

虽然格里高利很喜欢自谦为“上帝仆人的仆人”，但他却是宗教改革运动前最有影响力的教皇之一。604年他去世后，人们将他称为“上帝的谋士”，不久之后教会也授予他“大格里高利”的称号。受他的影响，罗马教会开始凌驾于政府与社会之上，而罗马教会则由主教进行管理。至此，西方教会开始演变为罗马天主教会，整个欧洲都开始效法这一模式。格里高利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非洲和英国教会，他都拥有属灵权柄，并可以行使以前由当权者行使的权力。他的所作所为，成就了早期基督教向中世纪基督教的转变。



23

怀特比宗教会议 (公元664年)

凯尔特人与罗马人的冲突

4世纪初，凯尔特教会十分兴旺。公元314年，凯尔特教会差派主教参加了在法国南部召开的阿尔勒会议（The Council of Arles）。在罗马天主教会差派宣教士到英国宣教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凯尔特教会一直十分兴旺。但是，在5世纪初，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了英国，将凯尔特教会一直向西驱赶，最后他们到了威尔士、康沃尔和爱尔兰，从而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那么，罗马天主教是如何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呢？

6世纪末，格里高利还只是一名修士的时候，有一次在罗马的奴隶市场，看到有人在出售一群金发碧眼的小孩。别人告诉他这些孩子都是来自英国的异教徒，但他觉得这些孩子看起来好像天使一样。从此，这一幕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公元596年，已经做了教皇的格里高利差派奥古斯丁（罗马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院长，并非北非那位叫做奥古斯丁的主教）带领40名

修士进入英国的不毛之地，帮助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公元597年，奥古斯丁和他的修士们抵达了英国，并成功地带领一些当地人皈依了天主教，其中就包括肯特郡的埃塞尔伯特（Ethelbert）亲王。当时，肯特郡的都城是坎特伯雷（Canterbury）。一年之后，教皇格里高利任命奥古斯丁为坎特伯雷第一任主教。

令奥古斯丁感到惊异的是，他发现英国当地不仅有异教徒，还有基督徒。按着罗马人的习惯，当奥古斯丁听到凯尔特基督徒与罗马人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时候，他就请求这些凯尔特人顺从罗马人的做法。由于凯尔特基督徒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他们拒绝在这方面做出任何改变。后来，当凯尔特的主教去拜访奥古斯丁的时候，他竟然拒绝站起来，这种无理的举动令凯尔特人异常愤怒，致使双方在改变传统问题上的和谈拖延了好几十年才进行。

公元604年，奥古斯丁死后，罗马宣教士开始到英国北部传福音，而凯尔特的宣教士在科伦巴的带领下，一直向南进入到苏格兰地区传福音。这两组宣教士所面向的福音对象都是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冲突似乎已无可避免。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殃及皇室，因为奥斯威（Oswy）——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信奉的是凯尔特基督教，而他出生在南方的王后信奉的却是罗马天主教。

公元664年，奥斯威国王召集了一个会议，凯尔特基督徒和

罗马天主教徒都来参加，他希望能借此会议决定英国今后是信奉凯尔特人的基督教，还是罗马人的天主教。于是，长相体面的罗马主教和长相粗野的凯尔特基督徒，来到怀特比，坐在一起。他们在会上讨论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可笑，但他们当时可不这样认为——双方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方法不同；凯尔特修士可以修剪不同的发型，而且可以结婚，而天主教修士则不可以结婚；凯尔特修道院的管理方式比较松散，由主教来管理，而天主教的修道院则要大主教进行管理；凯尔特教会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柄。

在奥斯威国王召集的这次会议期间，两组参会人员分别诉诸不同的属灵权柄，凯尔特人认为科伦巴拥有属灵权柄，而罗马人则认为彼得拥有最终的属灵权柄。奥斯威询问凯尔特人，他们是否赞同罗马人关于基督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的说法，凯尔特人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奥斯威国王决定支持那位能将他带入天国的人。尽管在后来长达好几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一些凯尔特人的教会始终拒绝接受罗马的权柄，但是英国基督教却越来越趋向于罗马天主教。

英国教会融合了凯尔特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特点，它保留了凯尔特人的一些传统，特别是热爱学习的传统，但在信仰的模式上却越来越趋向于罗马天主教。虽然凯尔特基督教留给我们的独特遗产已经渐渐消没，但它却仍然时常勾起现代人的兴趣。

24

比德

(Bede, 公元672~735年)

可敬的圣徒

有些人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由早期基督教演变出来的教派只有两个，一个是罗马天主教，另一个是东正教。这两大教派的确是从早期基督教演变而来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独立于这两大宗教之外、在英伦三岛上十分复兴的凯尔特基督教，也是从早期基督教演化而来的，可算是由基督教演化而来的第三大宗教。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来自英国北部的罗马天主教修士比德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说明。

关于比德的生平，历史上的记载不多。我们对他仅有的了解都来自他自己的著述。比德7岁时，他的家人把他送给修道院院长本笃·比斯科普 (Abbot Benedict Biscop) 抚养。他在威尔茅斯 (Wearmouth) 和贾罗 (Jarrow) 的两家修道院中接受教育，在那里学习圣经、拉丁文、希腊文、法律、数学和写作。

在比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生活十

分活跃，贾罗的那所修道院更是以学术见长，其图书馆中存有各种圣经经卷，以及早期教父所写的圣经注释。比德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些经卷上，这些资源使贾罗培养出一位日后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大师。比德不仅成为一名神学家，而且成为研究英国基督教历史的专家。

作为一名盎格鲁-撒克逊的罗马天主教徒，比德认为怀特比会议可算是英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他支持这次会议所做的决定，认为罗马天主教的做法比凯尔特基督教的做法更好；但同时，他又对凯尔特宣教士的宣教热情，以及爱尔兰圣徒和学者们非同一般的奉献精神称赞有加，认为他们比英国的基督徒做得好多了。在有意无意之中，早期教会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成为比德效法的榜样，使比德与4个世纪前的优西比乌一样，成为生活在8世纪的一个记录教会历史的人。

比德一共撰写了40部拉丁文著作，其中有圣经注释、语法、科学和圣徒传。他所著的《英国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是最受人瞩目的书籍，也是他留给教会最主要的属灵遗产。他还将历史按照主前(BC)和主后(AD)的方式进行了划分，并将这个划分法普及开来。此外，比德并不只是在复述传说故事，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因此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列。7个世纪之后，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称奥古斯丁为他最喜欢的早期教会的释经者，而比德为他最喜欢的中世纪作家。

贾罗的修院实行的，是由其创始人比斯科普所撰写的修院制度；而比德所遵行的却是本笃所制定的修院制度。他那种奉献的生活令他深受其他修士的尊敬，死后不久他便被人们封为“可敬的比德”，这个称谓一直流传至今。作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比德继承了古罗马时代和教父时代的文化精华，若不是维京人在下一个世纪摧毁了他所在的那所修道院，他对英国和欧洲学术上的贡献肯定更为巨大。没有人知道在这场浩劫中比德有多少著作惨遭流失。



25

波尼菲斯

(Boniface, 公元680~754年)

日耳曼人的使徒

1000年来，罗马人统治着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但是到了公元410年，罗马帝国的实力和权势开始急剧下降，接下来罗马城遭到阿拉里克（Alaric）和西哥特人（Visigoths）的洗劫，于是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一世的帝国崩溃了。后来，到了公元476年，入侵的日耳曼部族领袖，取代了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拉丁人的半开化的奥古斯塔斯人（Augustus，被称为“野蛮人”），开始了横跨莱茵河到多瑙河这整个地区的统治。

这些不请自来的北方来客绝大多数都是异教徒，只有少数人是信奉亚流派教导的信徒。这些难以驯化的野蛮人，怎么可能皈依基督呢？面对如何教化这些人的挑战，教会感到不寒而栗，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这些掠夺成性的游牧民族面前生存下来。更糟糕的是，到了7世纪初，罗马教会在灵性、道德和

文化等方面也陷入衰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面临着如此混乱的属灵光景，虽然爱尔兰和英国的凯尔特基督徒只能在英伦小岛上很小的区域内发展，但他们却得以逃脱这场属灵浩劫。在那里的修道院里，传福音的热情和学术研究的热情同样高涨，不久之后就有宣教士从这些修道院中被差派到北欧传道。

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名叫温弗里（**Winfred**），日后被人们称为波尼菲斯（温弗里的拉丁文名字）。他出生在英国的德文郡（**Devonshire**），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在修道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学业出众，最终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一名神父。公元716年，他坐船前往今天的荷兰，向住在那里的弗里斯兰人（**Frisians**）传福音，但这次的福音工作以失败告终，于是他返回英国成为一所修道院的院长。3年后，他再度启程，先到访罗马，取得教皇的批准，然后带着教皇的授权书前往日耳曼，打算将它纳入教皇的管理区域。

根据传说，波尼菲斯在惊恐万状的日耳曼异教徒面前，砍断了他们用橡木制作的托尔神像——托尔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但托尔并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就有人说基督教的上帝比托尔拥有更大的能力。波尼菲斯的这个举动使他在异教徒中声名鹊起，他和他的英国同道们一起，使一大群人皈依了天主教，并在那里修建起了好几座修道院。公元732年，教皇将他任命为那一地区的大主教，他所管辖的大片区域都完全归教皇管

理。波尼菲斯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日耳曼度过的。公元752年他返回弗里斯兰，就是他第一次传福音失败的地方。两年之后，当他正准备给一群归信者施洗时，遭到一群异教暴徒的袭击而殉道。

这位“日耳曼人的使徒”被人们称为黑暗时代最伟大的宣教士，但非罗马天主教徒对他的评价则褒贬不一。由于他的努力，欧洲人得以脱离异教和亚流派异端，皈依天主教，使整个欧洲的信仰状况发生了永远的变化。但是，由于他认为罗马天主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督教形式，因此他把凯尔特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都看成假信徒。而且，由于他在政治上对高卢的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s in Gaul）的支持，使得教会和政权之间的结合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紧密。

波尼菲斯鼓励妇女参加福音工作，因此今天人们十分赞赏他，但是他群体式的传福音方式却颇受争议。他全身心地忠实于罗马，因此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罗马天主教成为16世纪之前大多数欧洲人的信仰选择。



26

图尔之战 (公元732年)

西方的得胜

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开始瓦解，但是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却一直维系到中世纪。然而这时的东正教却遭受到伊斯兰教的威胁。于是，一场发生在8世纪的宗教战争改变了几个世纪后欧洲的面貌。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入侵的日耳曼人开始和罗马人通婚，两种不同的文化也开始相互交融。到了5世纪末，法国被这些新兴的法兰克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混血后产生的新种族）占领。法兰克人在克洛维斯（Clovis）的带领下，团结一致，崛起于世界。公元496年，克洛维斯皈依了基督教，西欧的教会因此暂时得以保留。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兰克人的势力开始逐渐衰微，一位来自赫里斯塔尔（Heristal）、名叫查理（查理曼大帝的祖父）的勇士，于公元714年取得了政权。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

名字，但是他在西欧历史中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公元570年，在东方的阿拉伯，穆罕默德出生在一个名为麦加（Mecca）的地方。后来，他成为一个宗教改革者。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得到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领受呼召要去传扬一神崇拜的宗教（Monotheism），即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这对当时崇尚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改变。

穆罕默德的传道生涯起始于麦加，当时收效甚微。但是到了公元622年，追随他的人增加得相当快，以致麦加人强迫他们离开。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的信众已增至几千人，于是他们重新返回麦加。等到两年后穆罕默德去世时，他的信徒几乎已经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在后来的20年中，伊斯兰教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等地，并占领了耶路撒冷。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从非洲穿越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 of Gibraltar），并于公元718年占领了西班牙。不久之后他们穿过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 Mountains），开始进入西班牙北部边境地区，然后长驱直入进入了法国。他们从法国北部一直行进到距离巴黎只有160公里的图尔，在那里遭遇到来自赫里斯塔尔的查理所率领的军队的抵抗，结果遭到惨败。查理的胜利为他赢得了“法国铁锤”的称号。

27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公元742~814年)

巨人国王

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政教分离的做法，没有人愿意让政府来告诉我们应该信什么或不该信什么，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统治者、宗教领袖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在基督教里的政教合一才是最适合的做法。

当日耳曼和法兰克部族的首领信奉基督教之后，他们在教会中也被授予了权柄。与此同时，因罗马帝国瓦解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为主教们赢得了谋求政治权力的机会，随着这两种趋势的发展，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分别也变得越来越小。

“法国铁锤”查理的孙子查理曼（又称查理大帝）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同时也是一名勇士，天生具有领袖才能，无论是打猎还是争战，他总是冲在最前线，此外他还是一名优秀的骑手，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吃惊，因为他的个子很高，足有2.13米高。公元768年，他的父亲皮平三世（Pepin III）将自己的王

国在查理曼和他的哥哥卡洛曼（Carloman）之间一分为二。771年卡洛曼去世，将法兰克帝国留给了查理。查理曼参加过50场大大小小的战役，这些战役将他父亲留给他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这使得他成为继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统治欧洲领土面积最多的一个人。

公元799年春天，查理曼得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机会。那一年，教皇里奥三世（Pope Leo III）遭到前教皇支持者的袭击和殴打，虽然这次他被人救了下来，但他知道自己需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于是他请求查理曼成为他的保护者，查理曼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800年圣诞节，查理曼选择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庆祝这个节日，当他正在屈膝祷告的时候，教皇里奥三世把一顶金灿灿的皇冠戴在他的头上，宣布他成为新一任的恺撒，基督教罗马帝国也因此诞生。

查理曼随后接受了这个任命，整顿了3个世纪以来混乱不堪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尽管他本人几乎目不识丁，但他对文化和知识极为重视。他将最好的思想家都聚集到一起，希望能复兴欧洲的文化生活，因为当时除了爱尔兰之外，欧洲其他地区的文化生活都遭受到极重的创伤。他还从英国约克郡将著名的学者阿尔昆（Alcuin，公元735~804年）请来，亲自指导这个工作。

查理曼希望在巴黎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重新挑旺起来，阿尔昆为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学科。这些学科在近400年的时间里，

吸引了许多学者和学生前来巴黎求学，使巴黎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公元1231年，教皇确认了这些学科分类，使之成为巴黎大学的课程内容。

查理曼于814年去世，整个帝国由他的儿子路易接任。但无论是路易还是路易的继任者，都不具备查理大帝的气度或天分，因此只不过100年的时间，帝国就已名存实亡。到了10世纪，帝国剩下的国土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西部成为日后的法国，东部成为日后的德国。

查理大帝带给欧洲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去世之后，日耳曼统治者继续保持着复活罗马帝国的梦想，直到近1000年后，即1806年，拿破仑才彻底粉碎了这个梦想。1000年来，欧洲的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均被基督教同化，尽管它们并不总是遵循基督教的教导。今天，基督教能够在欧洲继续存留，都要归功于1200年前接受教皇加冕的查理大帝的影响。



28

基督教在俄罗斯 (公元988年以后)

第三罗马

斯拉夫信徒持守的是4世纪时的传统，据传说，使徒安得烈将福音传至乌克兰和俄罗斯（后来得名）等地。不过据说早在945年维京基督徒抵达这片土地并在基辅建立教会之前，斯拉夫人中就已经有基督徒存在了。

954年当伊戈亲王（Prince of Igor）的遗孀奥尔加（Olga）归信基督之后，这个新兴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又向前迈了一步。等到奥尔加信异教的孙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登基时，他觉得自己的百姓应该从各大宗教中挑选出一个作为自己的信仰，于是他便差派一名特使前去调查有关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情况。当他的特使返回向他汇报各种宗教的状况时，他却选择了东正教，因为东正教的敬拜活动场面宏大，让人感觉好似进入天堂一般。

988年，弗拉基米尔弃绝了他所信奉的异教神明，并下令首

都基辅的所有百姓都聚集到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畔，在他眼前接受洗礼，凡拒绝此项安排的人均被认为是国家的敌人，于是大批群众聚集到第聂伯河边，顺从地接受了洗礼。1019年，弗拉基米尔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继承了他的王位，并接受了君士坦丁堡教皇所任命的主教，这个举动令他与东正教之间结下了心结。

但真正的麻烦来自东方。13世纪，好似从天而降的蒙古骑兵突袭了整个东欧，并于1237年将基辅洗劫一空。俄罗斯的修士们都撤退到北部的森林地区，好像早期的基督徒为追求属灵生活逃入埃及和叙利亚沙漠地区一般。他们在森林里建立起修道院，像黑暗时期的西方修道院一样，将各种艺术和知识保存了下来。在南部，伊斯兰教扩张迅速，对东正教的威胁持续增加，迫使东正教于1328年，将其属灵及政治中心与帝国的首都，从基辅向北迁至莫斯科。

就在穆斯林军队于1453年前后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蒙古人对莫斯科的辖制有所放松，于是基督教的领导地位便从君士坦丁堡转移至莫斯科，后世的许多宗教领袖都将莫斯科看做第三罗马。1547年，伊凡四世（Ivan IV）将自己册封为沙皇（恺撒的一种称谓），并在第三罗马开始建造大教堂，其中包括一座名为克里姆林的大教堂。沙皇和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民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29

大分裂 (公元1054年)

大家庭的致命纷争

有人说，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其实是孪生姐妹，而基督教则为她们远房的表姐妹。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与天主教和东正教极为繁琐的宗教及敬拜仪式相比，基督教的各种仪式实在过于简单。事实上，早在马丁·路德产生改教的想法之前，中世纪基督教的两大中心：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就已经开始渐行渐远。是什么使这“两姊妹”变得如此疏远呢？

早在教会历史的初期，就有两大差异开始显露出来。首先是东西方教会在参政程度上有所不同。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由于当时东方教会的总部就设在君士坦丁堡，住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它没有得着太多的机会参与政治。但罗马帝国倾覆之后，罗马教会便开始行使政治权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其次

是东西方教会所服从的权柄有所不同。罗马教会服从的是教皇的权柄，东方教会服从的是七大教会公会的权柄，再加上几个世纪以来，双方在知识和文化上的差异，都导致东西方教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双方不仅在整体背景上差异明显，而且在细节问题上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双方对圣餐礼的形式和所使用的面包、禁食日期、复活节日期、神职人员能否结婚以及能否使用圣像等问题的看法均有所不同。而双方最大的分歧还在于，西方教会在尼西亚信经上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确认了圣父圣子同有一灵的说法。东方教会的基督徒认为，罗马教会没有权力改变尼西亚信经的内容，而东方教会的神学家也认为这种说法无异于异端，是对三位一体教导的破坏。

11世纪时，挪威的维京人入侵意大利南部，强迫住在那里的希腊人放弃他们所遵行的东方教会的做法，改行罗马天主教的做法，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东西方教会间的矛盾。作为回应，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要求住在他管辖区域内的天主教教会改用希腊人的做法，遭到拒绝，于是他强制关闭了这些教会。

1054年，红衣主教修伯特（Cardinal Humbert）率领一个罗马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将一封开除对方教籍的信放在教堂的圣坛上。教堂的一名执事估计到信的内容后，拿起信追赶已经离开的罗马代表团，硬要把信塞还给他们，由于对方拒绝接受，这封信便飘落到街上。自此，

双方所有和解的希望都化为泡影。

天主教教皇宣布开除君士坦丁堡主教塞鲁拉里（Patriarch Cerularius）和整个东方教会的教籍；作为回应，一周后，塞鲁拉里也开除了整个天主教会的教籍。这样一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开除了教籍。这件事令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啼笑皆非，但那时的人一点都没觉得它可笑。许多人都认为，找些沉着冷静的使者去，一定能很快收拾好这个乱局，使双方的关系得到恢复。后来双方进行了许多和谈，但最终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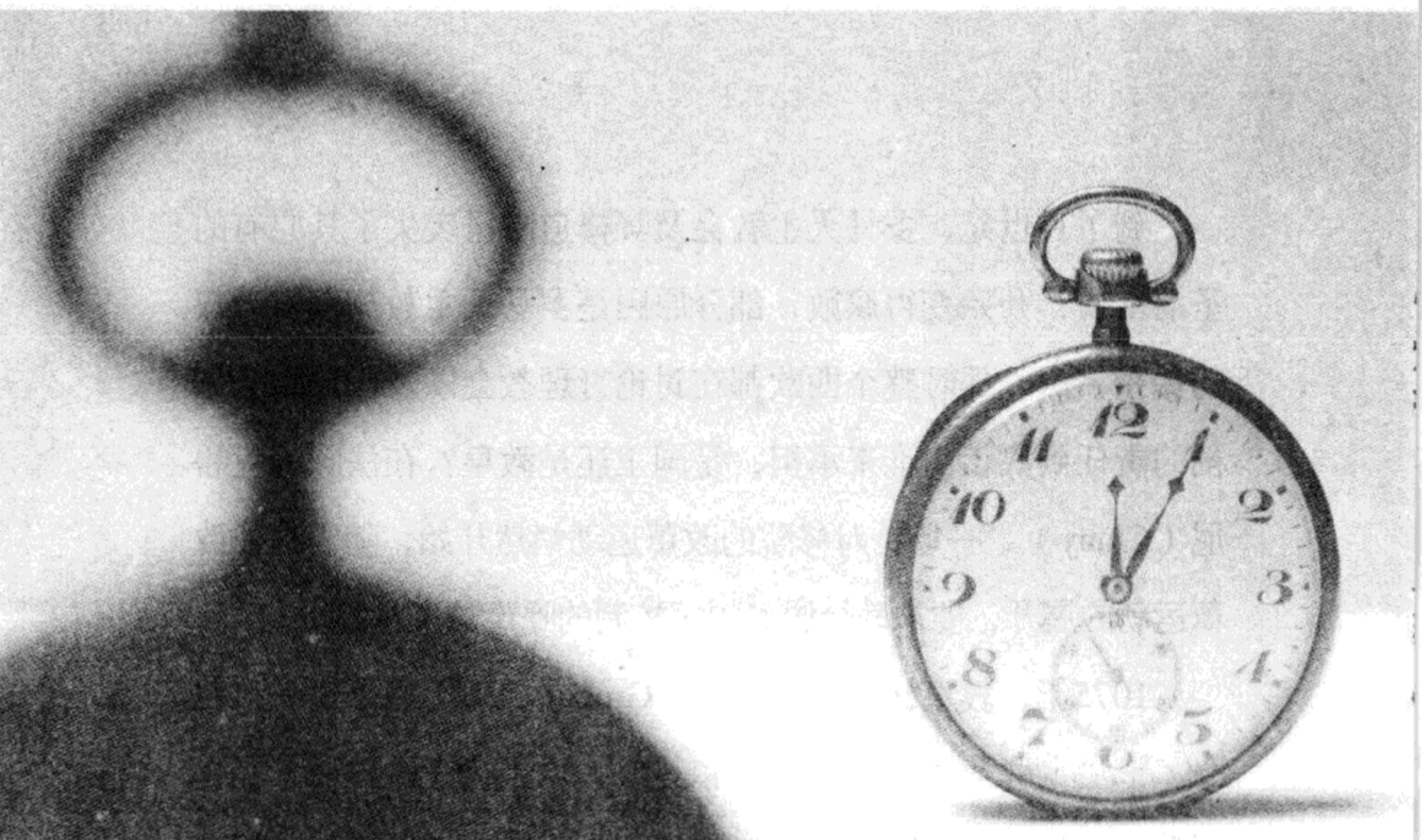
40年后，逐渐强大的穆斯林军队开始威胁东正教会。东正教派人到罗马请求帮助，罗马教皇于是派出十字军抗击穆斯林军队。1182年，与罗马原有的紧张关系导致君士坦丁堡发生反对罗马人的暴乱。1204年十字军从罗马出发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了双方和解的希望。直到今天，东正教仍清楚地记得那三天所发生的浩劫，这场浩劫致使这两大教会至今仍停留在隔绝的状态之中。



第四部分

中世纪教会的分裂

(公元1054~1517年)



30

安瑟伦

(Anselm, 公元1033~1109年)

专心致志

到了11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修道院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圣洁本质，开始变得腐败，部分原因是罗马天主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日深，那时整个西欧都在讨论管理教会以及任命教会领袖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是国王还是教皇？在法国的克鲁尼（Cluny），一场针对修院的改革运动悄然开始，随着这场改革运动的展开，要求教会脱离国王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签署了一个法令。该法令称普通信徒、国王和其他人均无权任命神职人员，而且世俗统治者必须服从教皇的管理。当来自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大帝攻占英国之后，接受了该项法令的要求，在英国实施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1093年威廉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却亲自任命了一位名叫安瑟伦的修士为新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安瑟伦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奥斯塔 (Aosta) 山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信仰虔诚。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有关上帝的事物感兴趣。年轻时他曾和本笃修会的修士们一起学习。23岁时，他离家前往法国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在著名学者朗弗朗 (Lanfranc) 的手下受教。

安瑟伦27岁时成为一名修士，3年后成为修院的副院长。他以思想和写作见长，1078年，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他接任了朗弗朗修院院长的职位。由于他支持改革者的举措，因此当威廉二世于1093年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拒绝了这项任命。但是由于教皇也希望他能承担此任，他就以修士当有的顺服，顺从了教皇的意愿。在担任大主教期间，他仍然拒绝听从英国国王的命令，以致两度被流放。

安瑟伦生活在一个学者辈出的时代，教会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思想家以及各个学科的佼佼者。由于深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学家的影响，安瑟伦和其他的学者们一起，从圣经以及早期教父——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归纳出许多不同的神学理论。从安瑟伦的著述中，我们能看见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他有关本体论的著作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单以逻辑论证的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在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中间引起争议。

但是，安瑟伦并没有将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建立在理性探索的基础上。与奥古斯丁一样，他相信我们必须先相信，然后才

能明白，而非明白了之后再相信。除了写作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之外，他还撰写了许多祷告词和默想词，帮助修士和普通信众在更深的层面上追求属灵的长进。他所写的灵修指南，将人的思绪、头脑和心灵完全专注在主的身上，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

安瑟伦是一名优秀的教会管理者，但是他在解决学术问题上所展露出来的才华更让人受益。事实上，他在弥留之际仍在抓紧时间思考人类灵魂的起源问题。作为第二个千年早期伟大的思想家，安瑟伦为基督教神学思想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31

克莱沃的伯纳德

(Bernard of Clairvaux, 公元1090~1153年)

为了上帝的爱

1090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之父伯纳德出生在法国的第戎（Dijon）附近。他的父亲是一名骑士，母亲出身名门。他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可能是受到信仰虔诚的母亲影响，他最终没有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而是决定做一名修士。

经过一年的准备，伯纳德21岁时开始了修道生活，但他并没选择早已建成的修道院，而是选择了刚建成的、颇具改革意识的法国西道修道院（Abbey of Citeaux）。从那时起，伯纳德就展露出令人惊异的领导才能，他一共带领30名亲友和他一起进入修道院生活。伯纳德在灵性上的长进令人称羨。4年后，西道修道院的院长请他在偏僻的克莱沃谷地又建立起一家修道院，伯纳德在这所修道院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伯纳德的一生成就卓著。他在担任克莱沃的院长期间，一共成立了65所修道院，同时还为另外300座修道院的筹建提供

了帮助。1130年，他应邀在阿纳克里图二世（Anacletus II）和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之间进行调解，因为这两人都宣称自己是具有合法地位的教皇（英诺森后来取胜，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得到了伯纳德的的支持）。1147年，他接受教皇叶夫根尼三世（Pope Eugenius III）的委派，前往法国和德国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做宣传。他之所以接受这项委派，很有可能是出于他对父亲的忠心，因为他的父亲曾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公元1096~1099年）做过骑士。

伯纳德认为彼得·阿比拉教授关于基督赎罪的道德影响论是异端。按照阿比拉的教导，基督受死并不是为了平息上帝对罪的愤怒，而是上帝展示自己爱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促使我们以同样的爱来回馈他。1140年，森斯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Sens）对阿比拉的教导予以谴责，证实了伯纳德对此问题的判断。

在履行其他职责的同时，伯纳德还撰写了许多神学著作和大量的私人信件（我们手里就保存着他所写的五百封信）。他认为，我们在不同的灵性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对上帝的爱也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主题，他写道，我们读经、默想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收集信息，而是为了使里面那个堕落的本性得到改变，从而使我们能更亲近神。他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修士所做的那样，将泛神论的观点混入到上帝的本性当中，而是教导我们，我们的意志必须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

他严格地遵行修道制度，这使得他不再去关注世界的事情，而能过一种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而过于严格的修院制度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长达几十年近乎严酷的舍己生活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1153年，他于克莱沃去世。21年后，罗马天主教会追授他为圣徒，当时的作家也将他列为那个世纪的教父之一。但丁（Dante）于14世纪早期所写的《神曲》，让我们看见伯纳德不仅生活在天堂，更生活在上帝的荣光之中。这位伟大而神秘的修士已经活出了上帝让他活出的荣耀。

宗教改革运动中，对立的双方都认为伯纳德支持的是自己的观点，路德和加尔文甚至认为他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对伯纳德毕生研究圣经的成果《论称义和基督的救赎》（*On Justification and Christ's Saving Work*），他们尤为赞叹。

伯纳德可谓是12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他建立了大量的修道院；曾在两个相互敌对的教皇之间进行调解；曾为十字军东征做过宣传；曾反对过异端邪说的威胁；还写过许多颂赞上帝的赞美诗。因着他的影响，古老的封建骑士和淑女时代得以顺利地过渡到以城市与大学为标志的新兴时代。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流露出来的对上帝的热爱，在当代人身上已极为少见。



32

大学的崛起 (公元12世纪)

学者云集

今天的人说起大学，想到的不外乎两件事：第一，大学是高中毕业生继续深造的地方；第二，大学是他们所喜爱的某个篮球队的母校。很少有人会想到大学还是一个进行学术研究和智力创新的地方。

据我们所知，大学起源于12世纪的欧洲，那时人们发现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些著作作为欧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那时候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哲学（逻辑学）和神学是否能和平共处？中世纪的学者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信仰和理性的问题。

将人的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尝试，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人他们的学生热衷探讨各种思想，也尝试着将这些思想进行融合。从公元9世纪到14世纪，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经院神学家（Scholastics）和学者，像安瑟伦、彼得·阿比

拉、彼得·伦巴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都位列其中。这些人对耶稣和保罗所说的话笃信不疑：“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章37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章2节）。

当学生们聚集到一起聆听他们所喜爱的老师授课时，就出现了学习中心，很像中世纪的手工艺者及工匠们为了使其行业不受损害而成立的行会。人们把这些学习中心称为“大学”，意思是一群人的团体或集合。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天主教堂、城市广场或租来的房屋中聚集。如果那些地方不太方便或引起了周围人的反感，他们就得另找地方。教师在每天的讲授内容结束后，要向学生们收取费用——最早的学费形式，可以说，授课老师是学生们花钱聘来的。

学生们到了16至18岁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极个别的学生14岁就可入学，拉丁文是入学基本要求。那时的大学，只有老师才有课本，学生们必须凭借记忆力才能在考试中顺利过关。当时的授课形式主要以讲解和辩论为主，由两位教师在学生面前就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辩论，坐在下面的学生在聆听教师辩论的过程中，开始培养他们自己的思辨和独立思考能力。

那时的学生要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必须学满4至6年，其课程设置为：语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逻辑（哲学）。在这个基础上再学两年，就可拿到助教的资格，如

果再提交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法律、医学或神学硕士的学位。在巴黎大学（当时的顶尖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再读6年就可以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读3至6年就能获得神学博士后的学位。今天的学位设置和当时相比，就简单多了。

大多数欧洲的顶尖大学都是在这段时间成立的。到了1400年，已有75所大学遍布于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大学的数量和声誉也都有所增长，它给世界带来两方面的改变，首先，它抑制了社会向世俗化方向的转化；其次，它使宗教改革运动成为可能。宗教改革运动的两位伟大先锋就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神学教授，一位是牛津大学的约翰·威克利夫，另一位是布拉格大学的约翰·胡斯，马丁·路德自己也是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

大学的理念，起始于人们探求信仰和理性相结合的愿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大学已经放弃了信仰上的追求，而专注于理性上的追求。这个转变正是西方文化变得越来越世俗化的主要原因。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和机构，其中包括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和明尼苏达大学的麦克劳伦学院，还在呼吁人们注意，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将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因为这才是人们获取完整知识的开始。

33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公元1225~1274年)

沉默的公牛

知识上的挑战既可能威胁我们的信仰，也可能使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固，尤其当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信仰，希望它能适应这个世界的发展时，更是如此。13世纪时，教会就面临着这种知识上的挑战，当时，犹太教及伊斯兰教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解开始涌入欧洲的大学。

托马斯·阿奎那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作为一名与王族有关的贵族家庭的孩子，他从小生活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城堡里。他的启蒙老师都是来自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修士。他14岁时，本笃会的修士们劝说他的父母把他送进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入学后不久他便遭到除名，于是他从那不勒斯前往巴黎，在著名的阿尔伯特手下受教。

阿奎那生性安静，表情严肃，身材魁梧，他的同班同学都戏谑地称他为“安静的公牛”。虽然他的身材好似一头公牛

般魁梧雄壮，但他却十分沉默寡言。阿奎那后来取得了神学学位，获准在各个大学中教授神学，并以反对教会世俗化的斗士而闻名。

阿奎那并不太关注亚里士多德本人，他更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信仰和理性相互作用的观点。一个有信仰的人能否在理性的最新发现上，使自己的信仰仍能站立得住？在这个问题上，阿奎那保持了中立的立场，他并没有像有些神学家那样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是承认古代圣贤也同样在坚持真理。

与其他神学家一样，阿奎那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受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显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大能的基本真理，但是人们若想知道什么是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则需要上帝的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借着耶稣基督及圣经带来的启示。无论上帝是用普遍启示还是用特殊启示，他所启示的真理绝不会相互矛盾，这正是阿奎那尝试归纳的内容，他这样做并不是要以理性取代信仰，而是要帮助人们借助理性更好地认识上帝及其真理。

阿奎那的著述极多，体现了他的许多神学思想，他所撰写的18卷大部头著作，包括他的讲道集、圣经注释集、彼得·伦巴德的格言注释集、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集，此外还包括他所写的两部极为深刻的作品：《神学概论》（*Summa Theologiae*）——书中他对基督教信仰做了总结（但这本书最终

没能完成)和《反对异教徒》(*Summa contra Gentiles*)——他在书中为基督教的合理性做了辩护。

阿奎那的写作速度远不及他的思考速度,而且他的笔迹令人难以辨认,于是他请来几名秘书,同时将他口述的不同主题记录下来。此外,他还编写各种神学教材,这些教材后来成为中世纪所采用的标准神学教材。宗教改革运动中,观点对立的双方都竞相引用他的观点来支持自己。

1273年,阿奎那有过一次超自然的经历,从此以后他便停止了写作。他对此解释说,与他所看见的事物相比,他所写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3个月后,49岁的阿奎那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著作成为罗马天主教在天特大公会议(1545~1563年)上制定各种教令的基础。1879年教皇里奥八世宣布阿奎那的著作成为永久的经典,他本人也被视做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天主教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们也承认他的权威性。

这只沉默的公牛如今被人们称为“天使博士”(Angelic Doctor),他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书和写作中度过。今天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徒,都从他对真理的执著探索中得到极大益处,他让我们学会在面对知识上的挑战时,如何做到既不退缩也不逃避。

34

瓦尔多教徒 (公元12世纪起)

瓦尔多在哪里？

在一张画满密密麻麻不同人物的图片中把瓦尔多找出来，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甚至说起瓦尔多这个名字，都会让他们忍俊不禁。但是这个名字在教会历史上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指的是法国南部里昂地区一个叫瓦尔多的人，他曾聚集了一群跟随他的基督徒（被称为瓦尔多教徒）。这些人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到极为可怖的逼迫，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存下来，使我们能够了解他们非同寻常的信仰经历。

1170年，一位名叫彼得·王尔德（瓦尔多的拉丁名字）的富商决定跟从耶稣的教导：“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章21节）。”瓦尔多花钱请人将圣经的部分内容翻译成当地人能明白的语言，然后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像当年的使徒一样一边过着清贫的生活，一边开始四

处传道。

瓦尔多在当地吸引了一大批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跟随他，这些人和他一样情愿过一种简单的传道生活，这种奉献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并不罕见，只是若有人想传道，必须要获取教会的批准，由教皇和大主教经过商议后，才能最终决定，没有受过培训的人不得传道。瓦尔多教徒并不想危害教会，也不想自成一派，但他们就是不肯服从教会不许他们传道的决定，于是教会决定开除他们的教籍。

瓦尔多教徒的信仰告白，最终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他们相信，只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于是将圣经翻译成普通人能读得懂的语言。瓦尔多教徒强调个人读经、个人奉献跟随耶稣以及火热传道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们拒绝接受罗马天主教关于炼狱、向圣人祷告、只有神父才有代祷的特权以及大多数关于七大圣礼的教导。而造成他们与罗马天主教关系紧张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宣称，人人都有传道和教导圣经的权利，按照他们的观点，人不需要先成为一名神父或修士，或接受正式培训之后，才拥有传道和教导圣经的权力。

但罗马天主教会并没打算和任何人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更不要说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无知小民了。1184年，维罗纳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Verona）宣布开除瓦尔多教徒的教籍，这个决定致使双方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在随后的几百年里，瓦尔多教徒不断成为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目标，数以千计的

瓦尔多教徒因教皇签发的法令而遭到屠杀，许多人被迫逃到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与阿尔卑斯山接壤的边境地区，另外一些人则逃到中欧和东欧等地区。

瓦尔多教徒与其他支持改教的基督徒团体，如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以及英国的约翰·威克利夫的支持者有过接触。瓦尔多教徒的部分教义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所倡导的教义极为相似，但也有一部分与之不同，比如有关救恩的教义，他们所持守的主要观点，均被宗教改革运动采纳。1532年，他们发表了一份信仰告白，其中清楚地将自己称为新教徒。19世纪初，一些瓦尔多教徒移居到乌拉圭、阿根廷和美国（至今仍有大约2000名瓦尔多教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瓦尔多教徒在面临逼迫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圣经的专注以及对跟随主耶稣的执著，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团体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们被人们称为最原始的福音教会，其勇气值得后人效法。



35

约翰·威克利夫

(John Wycliffe, 公元1330~1384年)

宗教改革运动的启明星

约翰·威克利夫是14世纪牛津大学的学者，热爱圣经，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只能找到拉丁文圣经。虽然身为学者的威克利夫能读懂拉丁文，但是出于对神话语的崇敬，他总期盼着圣经被翻译成英文，令普通的民众也能读懂。

威克利夫早年绝大部分生活情况并不为人所知，1330年前后他生于英国北部的拉特沃斯（Lutterworth）。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牛津大学这所14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学府中度过的，他是牛津大学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威克利夫提出的圣经教义，150年后因马丁·路德而闻名：

教会的头不是教皇，而是基督。

神父的主要职责是传讲圣经，而非按照教会的指派成为人神之间的中保。

人需要与上帝而非宗教体制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

上帝所悦纳的是基督所做的，而非我们所做的。

威克利夫认为，只有圣经才是解释真理和生命的最高权威，而不是教会，这可能是他所发表的最为激进的观点了。他认为，人们要想了解基督教信仰，就不能脱离圣经。人们只有阅读了用其母语写成的圣经，才能对它有最清晰的了解，于是他他与朋友一起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普通人能读懂的英文圣经。

威克利夫坚信人人都需要圣经，他对圣经生动活泼的传讲和教导，既吸引了上流社会的支持者，也引来上流社会反对他的声音，1377年，教皇对他的观点予以谴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牛津大学不再支持他，那些得到过他鼎力帮助的学校也不允许他发表任何言论。最后，因着他这些激进的观点，罗马天主教和他在牛津大学的一些同事迫使他离开牛津大学，但这个举动并没有让他停止写作，他不断将跟随者差遣到乡村和教会，让他们手里拿着几页刚译好的圣经，向那里的农夫和商人传讲福音。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在英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使罗马天主教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威胁。1401年，罗马天主教促使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宣称凡传讲威克利夫观点的人就是犯罪，一律处以死刑。

威克利夫晚年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拉特沃斯，他在1384年新年夜主持新年敬拜仪式时突发中风去世。但即使在他去世

后，罗马天主教会也没有放过他。在他死后31年召开的康斯坦斯大公会议上，罗马天主教将他斥为异端，并开除他的教籍，接下来，在1428年，罗马天主教命人从坟墓中将威克利夫的遗骸挖出进行焚烧，然后将他的骨灰抛撒到附近的河中，希望借此使人们忘记他的存在和他所带来的影响。

威克利夫的观点对马丁·路德影响极大。事实上，马丁·路德继续坚持了威克利夫的观点，认为圣经的权威高过罗马天主教的权威。直到今天，威克利夫仍以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而闻名。他的名字也因为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这个机构而流传下来。该协会秉承了威克利夫的意愿，将圣经翻译成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以便于当地人的阅读。



36

约翰·胡斯

(Jan Hus, 公元1369~1415年)

我愿为真理而死

行动比话语更有说服力，殉道使道更加显明。教会历史记录了许多殉道者，有一些殉道者是被教会杀害的，约翰·胡斯就是其中之一。约翰·胡斯生于波希米亚胡西内茨（Husinec，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农夫之家。

胡斯曾在布拉格大学（孕育捷克民族主义的摇篮）攻读神学，并在那里取得了神学学士及神学硕士学位。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人品出众，毕业后便受聘成为布拉格大学的教师。与年长他一辈的威克利夫不同，胡斯并不是个天生的思想家，但他所讲的课却深受捷克学生们的喜爱。

1400年，胡斯被按立为神父，并被派往布拉格的伯利恒教会服侍。1402年，他荣升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胡斯在教会的讲台上以及大学的课堂里，充满激情地向公众宣讲他从学生时代就已领受的威克利夫的那些激进观点，而坐在下面听他讲道

的，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当权者们。

胡斯支持威克利夫的观点，认为人人都当读圣经，圣经应当被翻译成每个人都能读得懂的语言。他将威克利夫的观点纳入到自己的讲道和写作之中，鼓励人们培养对上帝话语的喜好，并在学生和教区民众的心里点燃了对上帝的热爱。由于威克利夫被贬斥为异端，教皇们（当时有两个教皇）明令禁止胡斯传播并教导他的观点，但教皇的禁令并没能使这样的传讲停止下来。

胡斯并没有理会罗马天主教会的禁令，这使他很快变成反对罗马教会的公众人物。胡斯认为教会的头不是教皇而是基督，圣经没有出现的教义，都不应当被视为真理（即使它们被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当做真理），胡斯自己也拒绝教导这样的真理。于是，有关胡斯公然挑战罗马教会权威的事迅速传遍整个欧洲，胡斯认为，这不过是罗马天主教的虚张声势而已。但是最后摊牌的时候到了，胡斯被要求前往康斯坦斯，在教会当权者面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临行前，罗马天主教会向胡斯本人担保，他的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但是当他一抵达目的地，这个担保立刻失效。罗马天主教的人认为，他们完全不必要向一个“异端分子”做出什么保证，于是胡斯遭到监禁，并于1415年7月6日遭到定罪，并被施以火刑。在火刑柱被点燃前，有人问胡斯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面对死亡他这样回答说，能为真理而死实在好得

无比。

胡斯的殉道令他的跟随者更坚定了改教的信念，而他们的工作为日后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胡斯的跟随者随后成立了波希米亚弟兄会（Bohemian Brethren），这个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摩拉维亚教会（Moravian Church），一个以宣教为使命的团体，这个团体曾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的约翰·卫斯理。

有人可能会以为，罗马天主教的当权者们一定会从这次的举动中领悟些什么，然而100年后，他们在路德身上几乎又重演了这一幕。路德继胡斯之后，继续在同样的问题上指出教会的错谬之处，并以“更为激进的观点”令整个欧洲为之疯狂，由于路德与胡斯身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以致有人把路德称为“撒克逊的胡斯”。

今天，约翰·胡斯因着他不肯苟且偷生的气概，赢得了捷克英雄的称号。1999年，罗马天主教为了他们500年前杀害胡斯一事做出道歉。



37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公元1453年)

第二罗马的灭亡

穆斯林的最大战绩之一，是攻占拜占庭王朝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倾覆之后，拜占庭王朝拥有东罗马帝国，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在当地开始盛行起来。为了重现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帝国的捍卫者们在“第二罗马”的四周建造起坚固的围墙，使得围墙之内的区域远离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但是围城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被伊斯兰文明征服。

14世纪末，巴尔干半岛被一个新兴的伊斯兰势力——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沿着君士坦丁堡的方向迅速向东南欧扩张（今天该地区穆斯林与东正教徒之间的摩擦就可追溯到这一时期）。1453年4月，土耳其人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II）率领10万人包围了当时仅有1万名守军的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用火炮不断地轰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用军舰封锁了城四围的海域，但这座高大坚固的城市

在围困中仍坚守了50天，与此同时，土耳其人的步兵则在该城附近的地方，等候着进城的最佳时机。

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最终在5月的一个夜晚被攻破。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土耳其人的第一次进攻被守军击退。不久之后，土耳其人又开始发起第二轮进攻，这一次他们得以顺利入城。城中的守军奋力抵抗，到第二天凌晨几乎杀死了所有入城的敌军，但就在守军准备重整编队的时候，土耳其人的第三轮进攻开始了，这次来犯的都是土耳其人的精锐部队。虽然守军在与敌人面对面的肉搏战中败下阵来，但他们仍然不肯将这座城市交在土耳其人手中，于是，土耳其人下令停靠在港口的海军登陆参战，以加强地面进攻部队的攻势。这一次由于双方参战人数悬殊，守军最终筋疲力尽地败下阵来，君士坦丁堡至此彻底失守。

第二罗马帝国落入到伊斯兰人手中，其首都也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位于该城的东正教大教堂——圣智大教堂（The Church of Holy Wisdom）也被改建为一座清真寺。这是自732年图尔之战以来，穆斯林军队第一次真正对欧洲构成威胁。伊斯兰大军曾两度向西进攻，最远一次已经到了维也纳城下，但这两次的进攻最终都被击溃了。此后，穆斯林军队开始把目光投向别的地区。

38

古腾堡印刷厂 (公元1454年)

信息时代的开始

阅读本书的人应该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吧？人人拥有一本圣经，在今天看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实际上，自3000年前摩西撰写摩西五经以后很长时间，能拥有圣经的人其实寥寥无几。

在以往许多个世纪里，文士和修士都是以手抄的形式将圣经复制下来。大规模复制圣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人们除了手抄以外，还未掌握其他可以复制圣经的方法。复制书籍是一件既费时又费钱的事，因此只有少数富人才买得起书。但是，当德国印刷工人约翰尼·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机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古腾堡既不是修士，也不是神学家，而是一名商人，他1398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的詹斯弗雷希（Gensfleisch in Mainz），他的名字取自其父亲所拥有的一座庄园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金属制造方面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在当地一位大主教开办的造币厂工作。古腾堡将造币工

艺应用到印刷业务上，于是发现了一些新的工艺手法。与大多数的创造发明一样，印刷机并没有一夜间被创造出来。古腾堡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到处借钱以维持这个创新项目的运转。

他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耐心和决心，而且他深知，在将这个机器完善之前，最好不要将这件事透露出去。这台印刷机的突破口并不在印刷本身，而在于它的活字版，因为有了活字版，就能迅速方便地将字母进行反复组合，拼写成不同的词。他设计了一个模板，将形状和尺寸一致的小木块都嵌进去，然后在木块顶部安装大小一致的金属字母。

1454年古腾堡开始印刷圣经，之后不久，罗马、巴黎、威斯敏斯特等地都开始有印刷品出现。到了1480年，欧洲有100多个城镇拥有了印刷机，到了15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00多个。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之后，短短几年之内印刷的书籍数量，已超过印刷机发明前许多世纪书籍的总和，印刷给人们带来了突破性的影响。

如今，所有的人都能够获知新的思想。文艺复兴以及紧随其后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性思想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本圣经，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阅读圣经，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被允许用自己的头脑思想，这还是第一次。知识不再被视为神父和富人独占的财富，人人都可以享有它。当马丁·路德的跟随者将他极富煽动性的言论刊印出来之后，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起来。宗教改革运动所宣扬的教义，在几周之内传遍整个欧洲，并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永久的改变。

39

伊拉斯谟

(Erasmus, 公元1468~1536年)

路德思想的催生者

有些教会的牧师可以阅读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并用从中领受的信息向会众讲道，这些教会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原文经过翻译，文字上会产生细微的差别，而且原文本身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在译文中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而这些因素均会减弱耶稣以及使徒教导中所蕴涵的极大亮光——这样的亮光，可以在主日敬拜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不断地光照信徒。能够直接从原文中领受启示是神给予我们的一种恩典，但也是基督徒常常不能领受的恩典。鹿特丹的德赛得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出现，使人们对圣经原文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威克利夫和胡斯是引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如果有人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那么至少，对下一个说法他们都会同意：伊拉斯谟导致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伊拉斯谟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学识丰富的学者，正是他在路德

的心中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火花，正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伊拉斯谟催生了路德的思想。”

伊拉斯谟是一名荷兰神父的私生子，9岁时他的父母双双去世，于是他被送往同道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所办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那里接受古代经典的训练。后来他很不情愿地加入奥古斯丁修会，成为一名修士。23岁时，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他被按立为牧师。但是伊拉斯谟非常讨厌修院式的生活，认为那里的神学家过于“狭隘”，而且修院制度过于严苛。最终他离开修院，前往欧洲的大学接受深造。在欧洲他阅读了许多耶柔米的著作，并深受这位既热爱古代经典又热爱圣经的早期教会学者及翻译家的影响。

像所有历史上公认的学者一样，伊拉斯谟思想独立，他认为教会应该按照圣经的标准进行改革，这个大胆的想法是他在编辑希腊文新约圣经时产生的。1000年以来，罗马天主教会使用的一直是耶柔米翻译的拉丁文版圣经，那么伊拉斯谟这个重新重视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想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城里的学者各自带着希腊文圣经经卷逃到西方。伊拉斯谟知道，基督教的神学理论都是在圣经原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研读过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那么他所提出的神学理论肯定会令人质疑。鉴于此，伊拉斯谟开始从那些刚刚逃到欧洲的人手中，将部分希腊文圣经收集起来，率先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直到今天我们还

在使用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他将整理出来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付诸印刷，使每个学者人手一份，让他们可以按照圣经原文的内容，来比照当时天主教会所宣告的信条。结果他们发现，罗马天主教的做法已偏离了使徒时代的教导，这个爆炸性的发现最终成为路德手中引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不久之后，整个欧洲都感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巨大冲击波。起初，伊拉斯谟还很支持路德的改教工作，但路德的改革思想已大大超出这位荷兰学者的承受力，促使他后来放弃了对路德改教工作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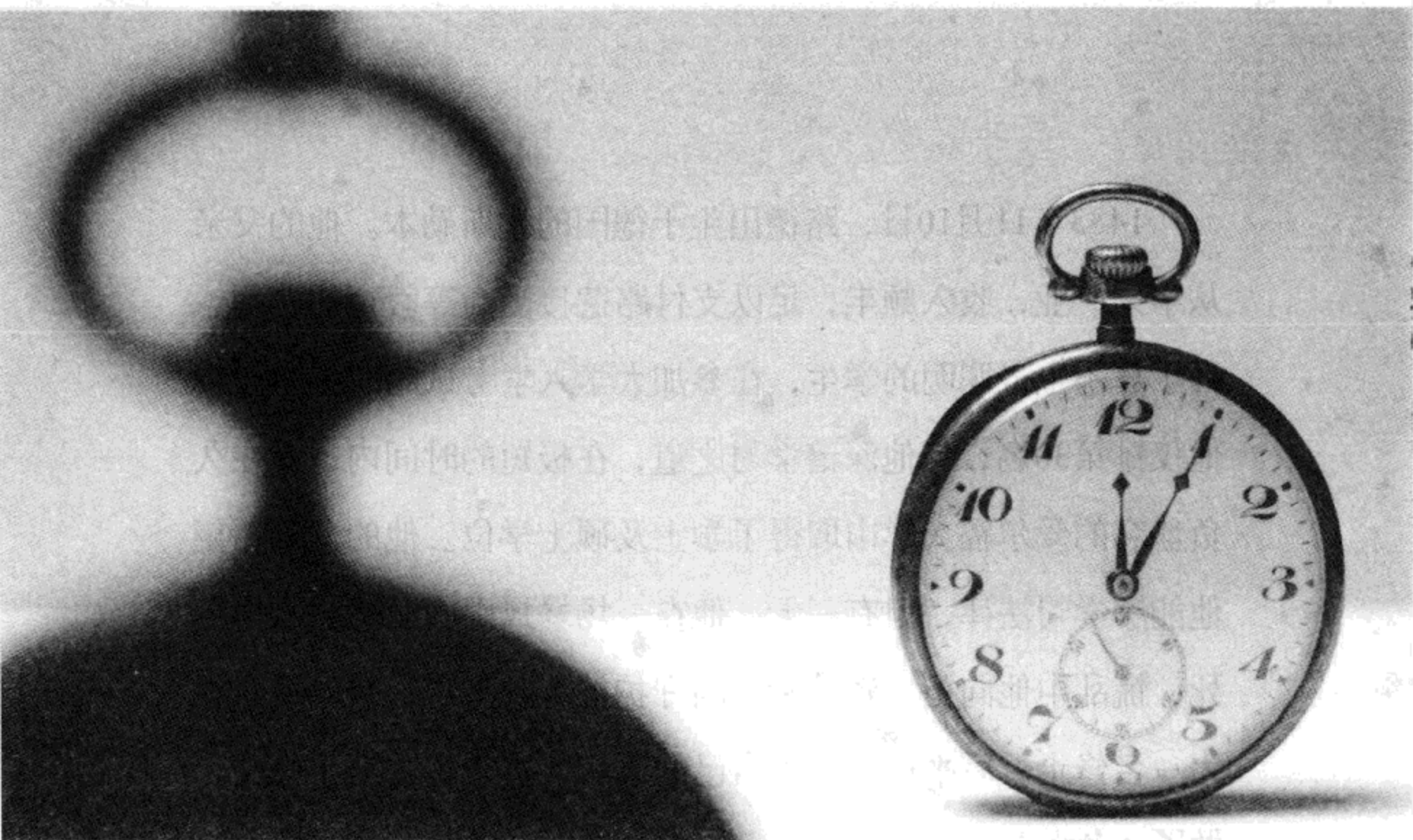
在他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前言中，伊拉斯谟提出，应将圣经翻译成各地通用的语言。1522年，路德对此做出了回应，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威廉·丁道尔也于1525年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不久之后，其他语种的圣经也相继译出。



第五部分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

(公元1517~1563年)



40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公元1483~1546年)

“野猪”

1483年11月10日，路德出生于德国的埃斯勒本。他的父亲从事采矿业，收入颇丰，足以支付路德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马丁算不上最聪明的学生，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57名学生中他仅排第30名，但他深谙学习之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在久负盛名的爱尔福大学中取得了学士及硕士学位。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学习法律，但有一天，他在一场暴风雨中几乎被雷电劈死，慌乱中他向圣安妮（矿工的守护神）起誓说，自己愿意成为一名修士。后来他持守了自己的诺言，进入奥古斯丁修会，做了一名修士。

后来马丁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尽管如此，他总是为自己的罪恶感痛苦不已。那时的他只知上帝之愤怒，还不知道上帝之爱。1510年他去罗马朝圣，这次旅行增强了他脱离罪疚的渴望。就在他准备《罗马书》的

讲章时，他被一个问题纠缠而苦恼不已，那就是：一位公义的上帝，怎么能同时又是一位满有慈爱的上帝呢？这时他忽然看到《罗马书》1章17节，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义人因信得生。”终于，他明白了：义人是靠着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信心，按照上帝的公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而活。因信称义的神学理论就这样诞生了，路德饱受煎熬的心灵获得了重生，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没人能让路德闭口不言，他把“95条论纲”（又称“95条信仰告白”）钉在了威登堡罗马天主教会的大门上，这个大门一直扮演着公众论坛的角色。由于当时发明了新型印刷机，有人将他那些革命性的观点大量印刷出来，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为此教皇发布了一条教令，将路德提出的信条中的41条斥为异端，并说他是“上帝葡萄园中的一头野猪”。

作为回应，路德的学生将罗马天主教的教令付之一炬，路德自己也将教皇的信函投掷到火堆当中。由于罗马教廷与威登堡之间早有冲突，路德敢于更加尖锐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四处宣扬他的教义，并强调只有圣经才是真理与生命的唯一标准。罗马教会深知路德的教导对他们有致命威胁，于是教皇便以宣扬异端为名开除了他的教籍，并命令他前往沃尔姆斯接受问询（参见41篇）。

路德的思想得到了德国农民的热烈支持，他们要求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进行改革。1525年，德国农民发动了起义——这个

举动遭到路德的谴责，路德的本意是找回真理，而非在社会中引发暴乱。他采取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允许神职人员结婚，他自己就结了婚，娶了曾做过修女的卡特琳娜为妻。他们一共生育了6名子女，路德深深地爱着他们。余下的岁月他一直在威登堡大学教授神学，因为承受了太多的试炼和奔波，路德的身体过早垮掉，62岁时便因中风在自己的家乡埃斯勒本去世。

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统治了1000年。其间，他们除了偶尔需要面对像威克利夫、胡斯和瓦尔多人这样的人给他们带来的挑战之外，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威胁。但路德的出现却打破了现状，他揭露出罗马天主教内部的腐败，以及它刚愎自用的神学理念，并借此打破了罗马天主教强加在人类灵魂上的桎梏，路德也因此成为公元1000~2000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路德从未想过要制造麻烦或分裂教会，但他却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改变。他所思所想的，都是如何认识上帝并荣耀他。虽然他的表现有时显得有些粗野，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卑虚己的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希望认识真理、教导真理并活出真理的修士和教师而已。



41

路德的试炼 (公元1521年)

虫宴?

“虫宴”这个词真令人作呕。不过，这里所说的“虫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宴席，而是16世纪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召集的一次会议的名称。这次会议的议题是探讨马丁·路德撰写的异端著述。那时的马丁·路德还是在威登堡大学教授神学的一个小修士。

在1518~1520年的3年里，路德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其他罗马天主教的学者就教皇与教会的权柄问题进行辩论。仅1520年这一年，他就出版了5部专著以及许多篇幅较短的文章，发表不同于罗马天主教教义的观点。教皇里奥十世对他所宣扬的学说终于忍无可忍，那一年6月，他签发了一个教令（又称书面强制令），对路德的观点予以谴责，路德的书籍因此遭到焚毁。作为回应，路德也焚烧了教皇里奥十世的教令。1521年1月，里奥十世宣布路德为异端，并开除了他的教籍。由于查理五世皇帝

负有保护教会及帝国不受异端侵扰的责任，于是，他命令路德参加他在沃尔姆斯召集的会议，等候会议对他那些观点激进的书籍进行判决。

这次会议从1521年的1月27日一直开到了5月25日，路德仅参加了4月17、18日两天的会议。教皇的特派代表主持了会议的日程，他们要求路德放弃他所宣称的“异端思想”。路德表示，若有人能拿出圣经的观点证明他的思想有误，并且其解释令人信服，他愿意接受指正。他甚至表示，若有人能指出他的观点有违背圣经的地方，他会亲手焚毁自己的书籍。这些人继续强迫他承认自己的观点为异端，对此，路德回答说：“我的良心只对上帝的话语负责，我不能也不会妥协，因为违背良心既不正确又不能带来平安。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上帝亲自坚固我。”

路德被给予21天时间进行考虑，等候会议对他的议案做出最终的裁定。但他没有等待那么久，4月26日就离开了会场。皇帝宣布路德为非法者，将他称为“混进修士中的魔鬼”，宣布帝国所有的公民都有权逮捕他并将他送交到当局接受惩处，甚至阅读路德的书籍也被称为非法。在撒克逊公爵、智者弗德里克（Wise Frederick）的授意下，路德的一些朋友在他返回威登堡的途中“绑架”了他，并将他护送到瓦特堡。第二年他将新约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使普通百姓也可以阅读圣经。

沃尔姆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最高权柄的问题，即在

罗马教会和上帝的话语之间，哪一个才具有最高的权柄？路德声称上帝的话语才具有最高的权柄，他的这个说法不仅挑战了罗马教会在宗教上的权威，也质疑着罗马教会对帝国政治施加影响的合理性。路德的说法也改变了普通基督徒每一天的信仰生活。与神职人员的话语相比，圣经被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地位上。路德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为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使威克利夫和胡斯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现实。

他的勇气改变了世界。



42

乌尔里希·慈运理

(Ulrich Zwingli, 公元1484~1531年)

军牧改革家

今天，当我们想到瑞士，就会想到一个远离冲突、在战争中持守中立的和平国家。然而在16世纪初，瑞士却为欧洲列国以及教皇提供雇佣军。这种做法遭到了乌尔里希·慈运理的反，他是当时瑞士军队的一名随军牧师。

1484年新年，乌尔里希出生在苏黎世附近一个小镇的镇长家里。他父亲的收入完全可以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年轻的慈运理前往维也纳读书。1504年，他在巴塞尔获得了学士学位，1506年他又获得了硕士学位。和他所效法的伊拉斯谟（他心目中的英雄）一样，他学习的是人文科学及各种语言，包括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神学并不是他所喜欢的科目。

后来他被人们称为苏黎世的教父，这之后他便和市政府的官员们一起，致力于消除罗马教会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他并没有像路德一样，将自己的思想贴在教会的大门上，而是将自己

的思想借着讲台宣扬出去。有人认为他使瑞士的教会受到了局限，成为只知道讲道的方寸之地。

他极喜爱希腊文新约圣经，曾将伊拉斯谟整理出来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手抄了一份保留下来，他还能背诵保罗所有的希腊文书信。他讲道的方式就是直接宣讲圣经经文。他一节一节地讲解神的话，并教导会众如何应用这些话，使神的话在会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讲道方式深受众人的喜爱，因此苏黎世城的官员下令，所有的讲道都必须依照圣经进行。

然而新观念和解经讲道总会引发一些冲突。即使都是改革者，他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会有分歧。比如路德和慈运理对圣餐的解释就有所不同。1529年，他们两人在德国西南部的马尔堡（Marburg Castle）会晤，探讨他们各自在教理上的新发现。一共有15个问题，他们在14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圣餐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路德认为圣餐中的饼和杯真的是耶稣的血和身体，而慈运理则认为那只是象征性的表达。

1531年10月，苏黎世改革宗人士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日趋紧张，因此，苏黎世周边归属罗马天主教的统治者们决定向该城宣战。苏黎世仓促应战。卡珀尔一战中，苏黎世共有500人被杀，当时身为军牧的慈运理也在其中。敌人发现慈运理的时候，他已身负重伤，在杀害他之前，他们听见他这样说：“这些人只能杀死人的身体，却不能杀死人的灵魂。”

路德从未能将自己的神学理论系统化，这个工作就落在

了其他人身上，特别是慈运理和加尔文。加尔文整合了路德及慈运理的思想，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润色，因此享有更高的知名度。宗教改革者不断强调的重点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只能凭着信心才能得到；二、只有圣经才是评判真理最高的权威，而非教会的传统；三、每个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与其他的改革者一样，慈运理也通过著书和撰写小册子的方式传播他的思想。他写的《论真假宗教》（*Commentar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一书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第一本系统神学的专著，被视为新教的宣言，极大地影响了宗教改革的方向。在加尔文、英国清教徒以及移居新大陆的清教徒（这些人正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美国）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的思想。



43

重洗派运动 (公元1525年起)

激进的宗教改革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到杀害，在我们看来，只因为别人有某种信仰就杀了他，这真是人类最野蛮的暴行了。而重洗派从一开始出现便面临逼迫和死亡。你可能只听说过浸信会（**Baptist**），从未听说过重洗派（**Anabaptist**）。重洗派因信徒接受两次洗礼而得名。16世纪的天主教和新教都提倡为婴儿施洗，因此才出现了所谓“重洗”的危险教导。

宗教改革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众所周知的主流改教者（**Magisterial Reformers**，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改教者），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为激进改教者（**Radical Reformers**），他们认为第一类人的宗教改革还进行得不够彻底，于是从慈运理的改教运动中脱离出来，将宗教改革运动推向了一个极端，甚至走得更远。

慈运理的跟随者以及苏黎世市议会曾试图推行部分宗教改革的理念，但遭到一些人的抵制，他们认为“政府不得干涉教会事务”，改革的进程因此受到阻碍。面对这种局面，慈运理表示愿意耐心等待，但他的那些更为急切的门徒却等不及了，他们在家里成立了圣经学习小组，并拒绝为家里的婴儿施洗。市议会命令他们停止这种做法，但他们仍坚持认为只有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成年人才能接受洗礼。1525年1月21日，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施洗，并断绝了与慈运理以及当地政府的一切关系。

他们认为每个基督徒都享有解释圣经的权利，因此既不愿接受正规的训练，也不愿进行深入的思考，结果在教义上引起了许多混乱与偏差。这些人虽然没有系统化的神学理论，但他们的信条却十分清晰，其主要内容如下：只为相信耶稣的成年人施洗，不为婴儿施洗；与教会和政府彻底脱离，因此他们具有反战主义的倾向；强调个人得救及过门徒生活的重要性；在教会及政府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发言权。重洗派的这些言论给16世纪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发展。

1534~1535年之间，重洗派的一个分支在明斯特建立了一个社区，在那里等候基督“千年国度”的到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声称领受了从天而来的启示，于是不加分辨地将旧约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甚至还加冕了一位“大卫王”，并实行一

夫多妻制，引发了一场荒唐的闹剧！

新教和天主教对这些极端重洗派的态度就是屠杀，而这些人也一反其一贯坚持的反战主义原则，开始予以回击。他们遭到追捕和杀戮，其子女也被送给其他家庭抚养。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四散在欧洲各地，把重洗派的观念带往所到各地，在当时的社会底层得到很大的发展。早期重洗派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的门诺派（Mennonites）、胡特派（Hutterites）、阿米什派（Amish）、贵格会（Quakers）、兄弟会（Brethren）和浸信会（Baptists）中仍可看到。

重洗派在当时被人们憎恶，但他们的一些观念在今天看却也无可厚非，比如他们提出政教分离，这个说法在今天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当然，也有一些重洗派的观念遭到人们的误解，比如有人说重洗派不允许信徒在家庭和教会以外持守信仰，而事实上这个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44

威廉·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公元1494~1536年)

英文圣经之父

上帝的话语并不是用英文启示出来的，但他兴起了那些将他的话翻译成英文的人，为此我们这些说英文的人实在要感谢他。约翰·威克利夫可算做翻译英文圣经的第一人，但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是从拉丁文圣经翻译过来的，而拉丁文圣经又是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因此人们想到应当将圣经直接从原文翻译成英文。

威廉·丁道尔天生具有翻译家的禀赋，他智力超群，为人严谨，18岁就取得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3年后，又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剑桥时他开始展露出语言天赋，除了熟练掌握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学习了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

丁道尔知道罗马教会用寓意解经的方式将自己高高地置于普通民众之上，因为如果民众没有读过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

经，他们就无从知道圣经中那些喻道故事所包含的真理，这样一来，罗马教会的统治就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丁道尔决定着手进行英文圣经的翻译，他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打击。

丁道尔接受按立成为神父之后，惊讶地发现许多神父对圣经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位热心的英国学者曾对一个反对他的人这样说：“如果上帝存留我的性命，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让一位年少的农夫比你更懂圣经。”然而英国国王严禁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丁道尔不遵守这条法令，于是被流放到欧洲。

1525年，丁道尔在德国的沃尔姆斯发表了他从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直译过来的英文新约圣经。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些支持他的商人就把英文圣经装在面粉桶里或卷在布匹中，偷偷地运回了英国。反对者将他们所能发现的所有英文圣经全都买下来，并将它们付之一炬，丁道尔则用销售圣经所得的收入又印制了更多的圣经。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

在将近9年的时间里，丁道尔四处躲避统治者的追捕，在欧洲继续他的翻译工作。英国的便衣并不肯放弃对他的追踪，因为英国国王不希望再遭遇到类似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给他们带来的类似麻烦。终于，1536年，丁道尔因遭人出卖，在安特卫普附近被捕，并以异端的罪名被投入狱。

经过了17个月的寒冷和孤独之后，他们在丁道尔的脖子上

绑上一根绳索，把他拉到公共广场处以火刑。行刑者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拒绝了这个要求，并祷告说：“主啊，求你开启英国国王的眼睛。”刽子手拉紧了他脖子上的绳索并点燃了火堆，丁道尔为了他的信仰殉道了，死时年仅42岁。但是他的祷告得到了上帝的回应，他去世后还不到一年，英王亨利八世就认可了英文圣经，只是他并不知道英文圣经70%的内容都是由丁道尔翻译的。

因着丁道尔的努力，其他更好的译本也陆续面世，其中英王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在此后三个半世纪中成为英文圣经的范本，这本圣经90%都是直接引用丁道尔的译文。此外，20世纪以前所有的英译本都参考了丁道尔的译文。



45

托马斯·克兰默

(Thomas Cranmer, 公元1489~1556年)

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的宗教改革总是和大名鼎鼎的路德或加尔文联系在一起，很少有人听说过另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人士：托马斯·克兰默。虽然这位沉静、书生气十足的克兰默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时，时常会表现得优柔寡断，但最终是他带领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因此改变了历史。

克兰默的父亲拥有一小片土地，这片土地只能维持一个儿子的生活，因此托马斯·克兰默（家中第二个儿子）和他的弟弟就选择做神职人员。14岁时家人送他去剑桥大学读书，他毕业时在全班42名学生中排名32。尽管学习成绩平平，托马斯还是在1510年拿到了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奖学金，但这笔奖学金在他与酒馆老板的女儿结婚后被撤销了。他的妻子后来死于难产，之后他又重新进入耶稣学院学习，一生追求治学之道，并接受按立成为一名天主教的神父。

英王亨利八世希望教会批准他与凯瑟琳离婚，因为他想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并让这个女人为他生下继承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亨利八世，克兰默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政治上的因素使克兰默不久之后便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历经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王后三任英国国王的统治。

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部分起因是亨利八世想拥有一名男性继承人。当罗马教会拒绝了他的离婚请求后，亨利八世直接下令，宣布英国的教会不再服从教皇的权柄，而是接受他自己的直接管理。在英国并没有出现路德那样的人物，为着不同的神学观点进行一番较量，而是国王直接出面掌控了局面。英国国内那些反对国王脱离罗马教会统治的人均遭到处决。终于，亨利八世不仅拥有了一位新妻子安娜·博林（Anne Boeyln），还将英国的教会（The Church of England）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并任命了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

英国民众及国会都支持国王的行动。路德的文章在英国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威克利夫从前对英国民众造成的影响。国会因为不喜欢罗马教会向英国征税并拥有英国的土地所有权，也表示支持亨利八世的行动。当国王、国会以及民众都表示希望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会的管制后，克兰默便开始着手英国教会的改革工作。

克兰默的晚年，英国国内政治上的争斗达到了顶峰。1553年爱德华六世去世之后，“血腥玛丽”开始了她令人胆战心惊

的统治。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试图将英国重新恢复到改教前的光景，为此她开始大肆杀戮那些改教的领袖们。克兰默也因此被关进伦敦塔的单人牢房，遭到数月监禁，并被强迫放弃改教的观点。在接受关押的最后几个星期，克兰默有点动摇，但在行刑的当天，他明确表示自己弃绝天主教教义，并声称教皇乃是基督的敌人，是敌基督者，说完他就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克兰默完成了丁道尔的梦想。他说服亨利八世接受了英文圣经并着手安排了钦定版圣经的翻译工作。克兰默还为钦定版圣经作了序，并鼓励每个人不仅要读经、背诵经文，还要活出圣经的教导。他所写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流传久远，其中有许多对教义的概括朗朗上口，几百年来为基督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灵魂。



46

伊格那丢（Ignatius）及其反宗教改革的举措 （公元1491~1556年）

卷土重来

罗马教会并没有对宗教改革运动掉以轻心，而是竭力反对改革者，在罗马教会的腐败问题上与改革者抗衡，并指控他们为异端，以此进行反击。宗教改革者们取得了成功，所以罗马教会不得不面对其内部存在的各样问题，他们也开始筹划各样反对宗教改革的举措。有许多人和事件都卷进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中，其中就有伊格那丢·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在这场反对浪潮中，他应该算是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物。

伊格那丢出生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座城堡里，这座城堡归属于富有的巴斯克家族，而他正是这家族中的一员。年轻时他玩世不恭，后来参军，在1521年与法国人的战斗中负了重伤。在漫长的养病期间，他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生活。那时他读了两本书，一本介绍基督的生平，另一本介绍其他圣徒的生平。他所持的观点与路德截然不同，路德认为人类的意志因为受到

罪的玷污而堕落了，而伊格那丢则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经过这次反思，他决定离开军队，投身于教会中，成为基督的精兵。

第二年（1522年），伊格那丢进入门罗撒修道院（**Manresa Monastery**），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基督。此后10年，他做了许多朝圣之旅，并进入不同的大学进行学习，为自己的服侍做预备。在门罗撒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名为《属灵操练》的书，内容是对人类的罪以及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的默想。他根据自己的属灵经历写成了这本书，希望它能对其他人的灵命成长有所帮助。有一段时间，对那些希望加入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 or the Jesuits**）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之书。

1539年，伊格那丢请求教皇保罗三世允许他在教会中建立新的宗教秩序。这个请求一年之后得到了批准，于是他开始在耶稣会实行军队式的管理。这些修士被伊格那丢视为基督的精兵，他们甘心乐意地遵行教皇的每一个命令，希望恢复罗马教会昔日在宗教及政治上的权柄。这些精选出来的修士接受特殊的训练，既能教导儿童，又能提供属灵指导，还能接受差派到海外宣教。无论走到哪里，他们总会在保护当地人利益的问题上不遗余力，但有时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罗马教会的支持者们对他们赞赏有加，批评者们则咒诅他们，将他们视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突击队。

在为耶稣会成立祝圣的同时，罗马教会又建立了反对宗教

改革运动的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起始于三个世纪前的西班牙，主要是为了保护教会不受异端侵蚀而设立的。1542年，红衣主教卡拉法（Cardinal Caraffa）敦促教皇再次恢复宗教裁判所的职能，教皇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任命卡拉法为宗教裁判所的六大裁判官（Inquisitor Generals）之一。卡拉法后来自己也成为教皇。被宗教裁判所审判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常常在严刑拷打下被迫招认自己的罪行。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有罪，这些人都会被要求承认自己有罪，并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就要被监禁，甚至被处死。宗教裁判所的存在阻碍了宗教改革运动的进一步扩展。

伊格那丢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622年，他被教皇皮乌斯追授为圣徒。直到今天，对伊格那丢的评价仍然是毁誉参半，但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从他《属灵操练》一书中得到很大的益处。



47

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公元1509~1564年)

宗教改革运动的规划者

伟人常常会面对这样的境况，有些人爱他们，有些人恨他们——人们可以因为同一个原因选择爱他们或恨他们。和路德一样，加尔文是历史上最受人爱戴也最遭人憎恨的人之一。路德是修士、教授，是宗教改革运动第一代改教者中极富激情的革命者；而加尔文是律师、学者，是宗教改革运动第二代改教者中极为冷静的规划者。他们两人素未谋面，但加尔文对路德这位德国的改教家极为敬重，路德的改教思想也正是经过加尔文的整合，才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

加尔文生于位于巴黎东北角90多公里处的诺扬。他本打算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律师，因此14岁时便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在大学里，加尔文与其他同学不同，他非常努力地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1528年，他取得了硕士学位，在逻辑思辨及写作上均显露出极高的天

赋。后来他正是因为在这两方面表现卓越而闻名于世。在巴黎时，他接触到宗教改革思想，于是决定弃绝罗马教会的“迷信信条”，同时也放弃了法律和古代经典的学习，转而攻读圣经及新教神学。

对改教人士的逼迫迫使加尔文逃到瑞士的巴塞尔，在那里，他过起了平静的生活，每天阅读、写作。也正是在那里，27岁的加尔文写出了第一版《基督教教义》，用简单的语言，条理清晰地阐明了改教者所提出的信仰核心。这本书使他成为全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第二年，他在前往斯特拉斯堡的途中停留在日内瓦过夜，遇到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威廉·法拉尔（William Farel），法拉尔劝说他继续留在日内瓦参与新教教会的建造，加尔文勉强同意了请求。

日内瓦城议会授予他“圣经教授”的职衔，他也开始按照改革宗的信条在日内瓦城内着手进行改革。但是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并不符合日内瓦政客们的期待，于是他和法拉尔被强制离开了这座城市。3年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再次回到日内瓦，回来后不久，欧洲各地具有改教思想的基督徒也都蜂拥到这个城市，那时日内瓦拥有“新教的罗马”（The Protestant of Rome）这样的美誉。

加尔文把他的余生都放在了讲解圣经的工作上。他不仅逐节讲解圣经中每卷书的经文，而且还教导会众将每节圣经的真理都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他把自己那些深奥的神学思

想都转化为可以实际操练的行动。临死时，他请求他的学生把自己埋葬在一块普通的墓地里，只要放上一块朴素的墓碑就好了，以免民众把他的墓地变成众人敬仰的圣地。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去世后，他的学生就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到一块无人知晓的墓地，至今人们仍不知他到底身埋何处。

加尔文将改教者（特别是慈运理）的思想作了清晰的阐述，主题是上帝的主权。他对《基督教教义》一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扩充，使这本书成为对改革宗神学最经典的表达。由于他的思想体系整合了世界观的所有因素，因此他的影响遍布欧洲全地以及早期的美国，并深入到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艺术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他的思想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改革宗、长老会、公理会、英国国教、浸信会等宗派传统的形成。此外，美国清教徒创建“神治联邦”（*Godly Commonwealth*）的想法也来自加尔文治理日内瓦的一些理念。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公元1~1000年间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那么约翰·加尔文则被认为是公元1000~2000年间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无论他是受到人们的爱戴，还是受到人们的憎恨，他毕竟给人们带来了影响。无论是否赞同加尔文的神学理论，我们都能学习他严谨、条理清晰的思维方法，并将这种思维方法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48

天特会议

(公元1545~1563年)

确立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罗马教会实在受够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它不得不面对新教不断增长带来的威胁。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计划召集一次审核教会状况的会议。然而政局的变化使他的计划不得不往后拖延，直到1544年他才签发了教皇令，准备在意大利北部的天特召集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分三次召开，第一次是1545~1547年，第二次是1551~1552年，第三次是1562~1563年。参会者有的参加了一次会议，有的参加了两次，有的参加了三次，但效忠教皇的意大利人派代表参加了全部三次会议，他们也因此操控了会议的日程及表决结果。查理五世皇帝想出奇招，迫使罗马教会准许德国的新教领袖参加了此次会议。罗马教会为了取悦查理，邀请了几名新教领袖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但是由于会议不允许他们发言，也不允许他们参加表决，致使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变得毫

无意义。

教皇请求会议就三大问题进行讨论：教义问题、神职人员的腐败问题、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问题，但参加天特会议的代表却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议题。西班牙和法国的主教们希望讨论西班牙和法国的教会如何脱离罗马教会自立的问题；耶稣会的代表们希望讨论如何保护教皇的权柄不受侵害的问题；教皇选派的代表们则拒绝任何形式的宗教改革，希望继续保留他们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一名政治家，查理五世皇帝则希望在天主教及新教之间寻求某种妥协的形式（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

此次会议推翻了所有改教者提出的改革措施，确立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天特会议否定了新教的核心教义——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只能凭借信心才能得到，提出人要赢得神的恩典必须加上自己的努力。此外，天特会议削弱了圣经才是解经最高权威的说法，提出要正确解经，除了尊重圣经的权威之外，还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天特会议再次确定了罗马天主教七大圣礼的重要性，宣称这七大圣礼是救恩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天特会议之后，分领圣餐的仪式仍然被认为是代表基督为了满足天父而献上的活祭。此外，天特会议宣布，包括次经在内的拉丁文版圣经才是罗马教会官方使用的圣经。会议推翻了信徒皆祭司的说法，明确了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最后，与会

者共同签署了一份禁书名单，拒绝所有新教书籍，只接受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值得肯定的是，天特会议的确指出了一些教会内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如神职人员必须接受培训、不得滥用职权等。

1564年，教皇签署了一项法令，对天特会议的决议进行了总结，并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及教师必须接受法令的要求。凡拒绝天特会议决议的人均被认为是异端分子，并被开除教籍。试图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寻求合一的努力彻底破灭，这项法令给“两教合一”判了死刑。出于对教皇的效忠，耶稣会的人带着天特会议的决议，在他们所到之处阻止新教的发展。

天特会议之后，欧洲的宗教格局业已形成。罗马教会无法彻底根除新教，新教也无法对罗马教会进行改革，其最终的结果是，欧洲人民永远分成了两大宗教派别。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和1962~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间，天特会议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促使罗马教会对宗教改革运动做出回应；此外，它还确定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这些教义存在了4个世纪之久。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并没能改变天特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也没能使天主教和新教对彼此的态度有所缓和。直到今天，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开始有了一些有意义的对话交流，两教之间不再是势不两立，而是开始互通有无。

第六部分

宗教改革运动的继续

(公元1563~1648年)



新
学
社
知
道
就
能
学
会

PDG

49

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公元1513~1572年)

脾气暴烈的苏格兰人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与法国的王室联姻之后，民众开始担心她会将苏格兰拱手送给法国。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有一个毫无畏惧的人勇敢地站出来。这个人就是约翰·诺克斯，一个浑身是刺、脾气暴烈、令人敬而远之的人物。然而，神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在苏格兰进行改革。那时，天主教会掌控着苏格兰一半的土地，获取的金钱相当于王室收入的18倍。

诺克斯出生在爱丁堡南部哈丁顿（Haddington）的一个普通家庭，曾在圣安德鲁大学及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神学和法律，但从未毕业。他在最普通的老百姓当中长大，所以他很容易和草根平民打成一片。1536年，他接受按立成为一名天主教神父。但是，当他听到托马斯·纪廉(Thomas Guilliame)宣讲的改革宗教义，他决定改信新教。

新教深深地吸引着他的心灵，所以他决定做乔治·威沙特

(George Wishart) (另一位巡回布道家) 的保镖。后来, 红衣主教比顿 (Beaton) 派人杀害了威沙特, 但恶有恶报, 他自己不久也被威沙特的支持者杀害。虽然诺克斯并未参与谋杀, 但他却默许了谋杀者的行动, 因此与他们一起被关进圣安德鲁城堡。

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法国海军将诺克斯及其同伴从城堡中强行带走。此后19个月, 他被强制安置在一艘军舰上做摇桨的苦力。有一次, 他被命令亲吻一尊童贞女马利亚的塑像。为了不犯“拜偶像”的罪, 他趁人不备, 将这尊塑像投到海中。后来, 在一次战俘交换的交易中, 他被释放了。玛丽·都铎 (血腥玛丽) 即位时他逃往欧洲, 投奔了加尔文。

1559年, 诺克斯返回苏格兰并在当地兴起了一场加尔文味十足的宗教改革运动, 向一切与天主教有关的事物宣战。他的讲道通常是先以平静的语调讲解30分钟圣经, 然后, 便开始用拳头重重地击打讲台, 号召苏格兰人民起来反抗罗马教会的统治。他激情洋溢的讲道有一次甚至在会众中引发了骚乱。后来, 他成了爱丁堡教会的牧师, 继续激发着人们对新教的热情。苏格兰议会请求他与其他五个与他同名 (都叫约翰) 的同伴撰写出一份新教的信仰告白, 这个信仰告白不久之后便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于是天主教在苏格兰被废止了。

诺克斯去世时, 苏格兰已成为世界上信奉加尔文教义人数最多的国家。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曾说: “约翰·诺克斯的祷告

比整个欧洲军队的祷告更令我感到恐惧。”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18世纪初，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移居到美洲新大陆，把诺克斯的影响也一同带上了这片土地。因着他的影响，美国人渴望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得以成真。如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长老会信徒，在回顾其属灵传承的脉络时，都可以追溯到这位脾气暴烈的苏格兰人。

诺克斯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无论是女王、教皇，还是普通民众都不能吓倒他。他粗犷的行事风格和旧约圣经中的先知很像，虽然这并不让人感到温暖舒畅，但在传达上帝的真理时却大有果效。他从不顾及个人的财富、地位或自身的安全，心里惦记的只有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



50

胡格诺派 (公元16世纪)

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

上帝为什么会允许悲剧发生在那些无辜者身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但我们知道，这个堕落的世界正在不断地将苦难加到神百姓的身上。法国胡格诺教派的信徒一定问过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苦难经历可谓是教会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胡格诺这个名字的由来尚未有定论，但自从1560年以来，法国新教徒就一直被人们称为胡格诺派教徒。1546年，说法语的瑞士加尔文派信徒将宗教改革的观念带入法国。9年后，第一个胡格诺教会在巴黎成立。尽管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国遭到逼迫，但其发展势头却不断扩大，有将近200万法国人加入了新教，其中包括著名的海军上将科利尼（Admiral Coligny）。胡格诺派信徒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16世纪60年代，法国一共爆发了三次宗教战争，其间，

新教徒抢掠天主教徒的财产。为了报复，天主教徒便杀害新教徒。人与人之间彼此不信任、互相仇恨，因此16世纪60年代的法国变得异常丑恶。

1572年，发生在圣巴塞洛缪（St. Bartholomew）纪念日的大屠杀致使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仇恨达到了顶峰。这次大屠杀起始于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与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在巴黎举办的婚礼。亨利是一位重要的新教领袖。新娘的母亲，梅迪西斯的凯瑟琳（Catherine de Médicis）和其他有权有势的天主教徒都嫉妒海军上将科利尼，因为他影响力很大，而且受到法国国王的青睐。于是，他们策划了刺杀科利尼的行动。科利尼是胡格诺教派的领袖。婚礼结束后4天，一名刺客两次开枪射击科利尼，但他侥幸活了下来。然而，在养伤过程中，他却再次遭到行刺，最终身亡。科利尼的死亡激起了全巴黎的胡格诺派信徒的愤怒。面对这种局面，查理六世听信了策划这次刺杀行动的人的说法，认为新教徒会采取报复行动，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下令大肆屠杀新教徒。

8月23、24日是大屠杀开始的头两天，有将近2000名胡格诺派信徒被杀。随后，屠杀行动完全失去了控制。接下来的6个星期，在天主教会的授意下，在巴黎和其他十几个法国城市，共有3万名男女及儿童被杀，他们的财产被侵吞。接下来，大屠杀愈演愈烈，甚至有些天主教徒也看不下去了，开始将新教徒藏匿在自己家中。与此同时，罗马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却为这次

大屠杀竞相庆贺，教皇甚至下令特为此事制造一枚硬币以示纪念。这次大屠杀使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元气大伤，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此起彼伏的宗教战争最终使所有人都感到精疲力竭，于是双方开始寻求妥协之道。1589年，机会来了。那一年，纳瓦拉的亨利即位。他一登上王位，法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就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改信天主教，他们将会制造更多的流血事件。1593年，亨利表示愿意让步。但是到了1598年，他签发了《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宣告了新教的合法地位，并允许他们在法国的部分地区享有宗教信仰的权利。

《南特敕令》的颁布使法国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和平。100年后，路易十六废除了《南特敕令》，这种表面的和平被打破了，法国新教徒又开始面临新一轮的逼迫。许多胡格诺派信徒逃离法国，移居到南非、美洲或欧洲的其他地方，他们当中有许多是中产阶级的能工巧匠，因此这些人的离开给法国经济带来重创。

法国的宗教战争和圣巴塞洛缪纪念日大屠杀，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顽梗与强暴，这些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改变了法国的宗教及政治格局。时至今日，宣教士们仍无法在法国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刀剑延缓了真理的传播，它却无法消灭真理本身。逃往各处的胡格诺派信徒把新教信仰带到了世界各地。

51

浸信会 (公元1609年)

又一个新教会？

在美国大多数城市的黄页上，浸信会的数量都比其他派别的教会多得多，而那些教会可能分属于十几个或者更多不同的派别及团体。为什么会这样？浸信会是怎么来的，又是怎样发展的？

浸信会起始于17世纪，当时英国的宗教界十分动荡。一些清教徒尝试对英国的教会进行改革，但遭遇了挫折，他们便选择了离开，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分离主义者”。后来，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派别，其中两支被称为浸信会。

为了逃避逼迫，一些分离主义者逃到了荷兰，在那里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这个团体的领袖是从剑桥毕业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yth）。他在仔细研究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之后，发现其中并没有关于婴儿洗礼的内容。于是，1609年，他为自己和一个名叫托马斯·贺尔威（Thomas Helwys）的朋友施

了洗，接下来，又为教会中所有的成年信徒施洗。后来，当史密斯听说门诺派教会也同意他关于洗礼的观点之后，他就想到把自己的团体与门诺派教会进行合并，但这个想法遭到贺尔威的反对。1612年，他与团体中其他10名成员返回伦敦，成立了英国第一家浸信会。

后来，留在荷兰的成员接受了阿米尼乌斯教派（**Arminian**）的学说（阿米尼乌斯学说是一个神学体系，以神学家雅各·阿米尼乌斯的名字命名，该学说强调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他们这个派别就是我们说的普通浸信会（**General Baptists**）。另外一边，一个更趋向加尔文教义的团体在约翰·斯皮尔斯伯里（**John Spilsbury**）的领导下，于1633年在伦敦又成立了一间教会，后来被称为归正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s**）。这间教会并没有强调信徒之间的分歧，而是向所有的信徒敞开大门，甚至那些没有任何浸信会背景的信徒，在没受洗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入这间教会。

英国的政治形势对浸信会的早期发展有积极影响。1640~1660年，英国议会一直反对英国国内的君主专制及政教合一。这个时期，浸信会坚信教会应当摆脱政府的管制，因此他们得以迅速发展。截止到1660年，英国已成立了300家浸信会的教会。

除此之外，浸信会还坚持，只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只有认罪悔改的基督徒才能被视为教会信徒；只有“成年”信徒

（那些有能力清楚认信的信徒）才能接受洗礼；所有信徒均可以参加教会的服侍并参与教会的决定。

浸信会信条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只为成年人施行全浸礼，而不再为婴儿施行点水礼。在17世纪（在今天的某些地方仍是如此），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带有挑衅性的激进行为，已偏离了基督教奉行了1000多年的传统。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把婴儿洗礼看成是一个人融入教会与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浸信会只为成人施洗、不为婴儿施洗时，有些基督徒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已对教会的根基以及文明社会构成了威胁。

浸信会特立独行的作风时常会给教会带来压力。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由于人人都享有同样的发言权（至少原则上如此），每个人的意见都不能被忽视，致使浸信会内部时常会有争斗和分裂。但这样的分裂使浸信会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浸信会固有的独立精神，也促使他们不断向外传福音，并向世界各地差派宣教士，其结果就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成千上万浸信会背景的教会。



52

英王钦定版圣经 (公元1611年)

保罗会为之叫好吗？

你可能听过有人这样说：“如果英王钦定版圣经能让保罗叫好，那么也一定能让我叫好。”当然，这种说法不过是玩笑而已，使徒保罗怎么会读过英王钦定版圣经呢。那么，“英王钦定版圣经”这名字里提到的英王是谁呢？为什么圣经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呢？

詹姆士（James）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也就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1603年，他继承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的王位，成为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王国第一次合二为一。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清教徒正在尝试清除教会中残余的天主教势力。1604年，他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会见清教徒领袖，他们请求他为改教提供帮助。他拒绝了这个请求，但答应重译圣经，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当时通用的圣经版本与希伯来及希腊原文有着很大的出入。

当时最流行的圣经为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但詹姆士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版本，他认为它听起来加尔文味十足。另一个流行的圣经版本称为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但大多数普通民众对这个版本的圣经都不太重视。因此英国需要一个新的圣经译本，译文要更加准确并且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詹姆士国王并未参与钦定版圣经的编写、翻译或其他工作，只是任命并分派了50名学者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将全本圣经分成了六大部分，分别交给六个小组进行翻译，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拿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与以往各种版本的英文圣经进行比照，若发现英文圣经有与之不一致的地方，就加以修订或更正。因此，与其说钦定版圣经是一个新译本，还不如说它是在已有的圣经版本上进行的重译。

最后翻译出来的圣经译本比以往的译本有了改进，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从原文翻译过来的直译本。再加上当时可用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经卷以及译者的水平都十分有限，因此，虽然钦定版圣经被视为权威版本（Authorized Version），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译本的质量更高。事实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将这个版本的圣经命名为“钦定版”并不确切，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詹姆士国王曾对这个译本的最终定稿做过正式的授权。

经过半个多世纪，钦定版圣经才超过日内瓦圣经，在当

时的民众中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在19世纪80年代新的圣经版本问世之前，钦定版圣经一直是英语国家的新教徒普遍使用的圣经。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发现了更多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经卷，人们又发现了许多钦定版中的翻译错误，于是更多更准确的译本被翻译出来。此外，钦定版圣经使用的语言已变得有些过时，当然，少数习惯或偏好这种语言风格的人们仍然很喜欢它。

钦定版圣经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比其他译本的语言更属灵，它体现的只是17世纪早期的英语风格。一些人觉得钦定版圣经的措辞具有某种神秘性，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喜爱这种语言风格。钦定版圣经在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



53

英国清教徒 (公元16~17世纪)

美国人的先祖

大多数美国人一提起清教徒，就会以轻蔑的口吻回应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道德说教者，沉闷无趣、自以为义、既不懂得享受性爱又不懂得享受娱乐，难道不正是他们把今天的美国搞得一团糟吗？”事实上，清教徒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糟，他们对清教徒的错误认识根本站不住脚。清教徒也穿着颜色鲜艳、带有蕾丝边和蝴蝶结的衣服，他们懂得如何享受优美的音乐和书籍，知道如何品味朗姆酒和啤酒，他们热爱滑冰、游泳和狩猎，也知道在寒冷的冬季如何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安排娱乐生活。

然而，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遭受人们的恶语中伤。由于他们在16世纪60年代试图清除英国教会中残余的天主教势力，而被反对其信仰的人轻蔑地称为“清教徒”。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英国的新教徒**，试图按照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实施的改革措

施，对英国的圣公会及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强制加入圣公会的法令之后，新教徒所遭受的逼迫也达到了顶点。面对监禁的威胁，仍有许多清教徒拒绝加入他们认为已遭到天主教玷污的教会。詹姆士一世登基后，发誓要迫使这些人就范，或者直接将他们驱逐出境——再不然就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自国内的逼迫，最终迫使许多清教徒逃到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荷兰。

清教徒的神学理念带有很强的加尔文主义倾向，首先强调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清教徒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学习并实践神的话。讲道是他们一周中最重视的事，他们要求牧师的讲道必须根植于圣经真理，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可实践性。他们对教会的改革充满了热情，这种热情来源于他们所领受的圣经真理。因为这样的热情，他们不仅用心学习圣经，而且付上生命的代价谨守遵行，所以周围的人觉得他们很可怕，因为那些人热爱宗教传统胜于热爱圣经上的话。

清教徒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而是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思想的人。他们在剑桥大学里影响很大，而且这种影响力透过剑桥传递了出去，早期最重要的科学家也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尽管那时清教徒在英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十分微小，但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赞助人中有70%是清教徒。

今天的英国并没有清教徒教会，清教徒主义差不多只复兴

了100年时间就支离破碎了。随后，一些清教徒选择留在了圣公会，更多的清教徒则选择加入了其他持有与圣公会观点相左的教派，如公理会、长老会和浸信会等。清教徒最大的壮举发生在1620年，他们当中的大约一百人登上了一艘要横渡大西洋的小船，前往一个新的未知世界。那些没有与他们同行的人永远也不能想象，这一小群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怎样蓬勃发展。当时的人对这件事的普遍反应是：“终于甩掉这些麻烦的人了！”

那个时候，有一批欧洲人也在寻找新大陆，梦想着能通过贸易发大财。但清教徒寻找新大陆的目的，则是希望在新的土地上能自由自在地敬拜神、不受约束地传讲福音，并能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以荣耀神为中心的新世界。这些人在北大西洋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边与肆虐的秋风搏斗，一边祷告希望自己能活下来。这些人的经历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随后我们会再次讲到他们。

清教徒所留给我们的教训真是数不胜数。如果我们能放下自己的偏见，仔细审视这些人，就会发现他们身上许多的优秀品格：在神面前能谦卑虚己，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总是尽心竭力地荣耀神，服侍他人时总能深思熟虑。



54

威斯敏斯特信条 (公元1646年)

完美的概括

基督徒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这些话足以让他们认识神，并知道如何活出神的荣耀，他们也在圣经里找到了自己信仰的基本原则。然而，圣经并不是一部短小易懂的书籍，因此大多数教会归纳了自己的核心信条（或称信仰告白）。其中最著名的信仰告白，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段以英文归纳的文字可称为是对改革宗神学思想的经典概括。人们可能会以为威斯敏斯特信条是出自加尔文或其日内瓦的追随者之手，但事实上，该信条是在加尔文去世100年之后，由英国和苏格兰的基督徒起草的。

17世纪中叶，英国议会完全掌控在清教徒手中，他们废黜了英王查理一世，建立了由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共和国。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英国议会召集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宗教事务的建议。那次会议被称为

威斯敏斯特会议，其主要任务是对议会上个世纪批准的39条信仰告白进行修订。

1643年，共有151名英国清教徒及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齐聚到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希望将英国教会改革成像苏格兰长老会那样的新教教会。英国议会同意苏格兰教会的改革，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为交换条件，获取苏格兰军事上的支持，共同反对查理一世。但这次会议的目标并未达成，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与会者都赞同这样的改革，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甚至拒绝出席。

从1643年到1648年，威斯敏斯特会议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是与会者并没有任何决定权，只拥有向议会提出建议的权力。1646年11月，与会者共同完成了此次会议最主要的工作，即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起草工作。随后，为了帮助教会在最基本的神学知识上装备信徒，他们还编写了两个辅助材料，分别称为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Longer and shorter catechisms*）。很快，英国和苏格兰议会就批准了会议起草的这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后来成为长老会信徒、清教徒和其他教派信徒通用的标准教理指南。

威斯敏斯特信条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久之后，它就成为其他教派信仰告白的基础，特别是公理会和部分浸信会。20世纪初，在自由主义神学与基要派神学（*Modernist/Fundamentalist Debate*）的论战中，保守派学者格雷欣·梅琴

(Gresham Machen) 就根据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内容指出, 自由主义神学根本算不上基督教诸多派别中的一种, 而是一个全新的宗教。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经过细微的改动之后, 就形成了大小教理问答及信条, 今天的许多教会都把这些作为核心真理。

威斯敏斯特信条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标志, 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钦定版圣经出版后, 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它就被制定出来。初稿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很容易理解, 于是人们在保留了该信条所声明的信仰基础上, 对其语言又进行了改写, 使其能够适应更多现代读者及学子们的阅读习惯。

许多基督徒都听说过小教理问答的第一条内容: “‘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答案是: ‘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他为乐。’” 基督教各派别的信徒都对这条教理问答持肯定态度。许多教会现在仍采用小教理问答, 作为他们培训新教友以及父母教养孩童的教材。



55

30年战争 (公元1618~1648年)

旷日持久的战争

宗教改革运动之初，不过是不同神学观点之间的对话，后来却逐渐演变成武装冲突。宗教改革运动后期，欧洲中部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一打就是30年。这场战争一共包括4次连续的冲突。

错综复杂的宗教、政治、经济因素，加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心中埋藏的仇恨与恐惧，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随着双方关系的日趋紧张，战争已一触即发。1618年，信奉天主教的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成为波希米亚（早期为新教信仰殉道的约翰·胡斯的祖国）的国王。费迪南二世登基后，试图在波希米亚重新恢复天主教的地位，此举引发了波希米亚贵族的反抗，决定向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德国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效忠。德皇接受了这些人的效忠，战争随即爆发。

这场战争一共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波希米亚战争（公元1618~1623年），费迪南二世在这场战争中战胜了波希米亚人及弗雷德里克的军队。第二阶段称为丹麦战争（公元1625~1629年），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试图保护德国北部脱离波希米亚人的控制，好将它据为己有，但这个企图并未能实现，他自己也被赶回了丹麦。第三阶段称为瑞典战争（1630~1635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德国，挑起了这场战争。古斯塔夫率领手下训练有素的军队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但他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此后，他的军队开始节节败退。最后一个阶段的战争（公元1635~1648年），起因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进攻相对弱小的德国，前者试图借着这次入侵，扩大自己的版图。

这样看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像是由政治因素而非宗教因素引起的战争。战争中德法军队互不相让，最终双方都精疲力竭。德国受到重创，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大片领土饱受蹂躏，到处血流成河。在此后将近300年的时间里，欧洲再也没有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643~1648年，疲惫不堪的德法双方在经过一系列磋商之后，草拟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条约名称取自他们会晤的地点。此后，各国不再强制国民必须统一其宗教信仰，也不再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进行强制性的融合，而是允许他们按照各自的意愿选择和决定。同时，统治者

禁止教皇干预政治。

一个新世界就这样诞生了，教皇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政治核心。当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对此表示反对时，他的意见不再有人理会。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如英国，开始大规模发展舰队，在海外建立了多个殖民地。作为海外贸易的基地，他们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逐渐发展成下一个世纪的霸主。与此同时，他们周边那些饱受战争摧残和蹂躏的邻国仍在欧洲战场上鏖战。

宗教间的分歧无论有多少，彼此杀戮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参与杀戮的人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好在今天大多数人从这场持续了30年之久的战争中得到了一个严肃的教训：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56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 (公元1620年起)

山上之城

渴望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的清教徒们，在海上一共漂泊了两个月。他们离开英国时本打算在弗吉尼亚上岸，结果却是在更北的普利茅斯岩石城登陆。在随后的几十年，又有几千名遭到英国教会逼迫的清教徒来到这片土地。1630年，在一艘装满新移民的船上，前往新大陆的人们听到了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一篇预言性的讲道，他将他们称为一座在世人面前建造的山上之城。

逃离英国的清教徒终于得到了信奉新教的自由，但他们并不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另一个英国，让大家各自选择信仰。抵达新大陆的头两代人希望大家的信仰能像在英国本土时一样保持一致。但是清教徒并不会逼迫异教者，而是允许他们离开。新大陆幅员辽阔，所有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在这里都找到了足够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信仰，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各自的生

活。

驱使美国清教徒不断向前的动力就是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首先建立起一个学习、写作及神学刊物出版的中心，还成立了一所神学院，培养更多的牧师。他们热爱生活在周围的印第安人。在抵达新大陆的第一个冬天，由于天气条件极其严酷，他们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死亡。若不是印第安人提供了帮助，他们很可能无法挨过这个冬天。

清教徒极其崇尚知识，当马萨诸塞州还是一片处女地的时候，就拥有一百多名牛津及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为此深感自豪，后来一名历史学家甚至把它称为历史上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州。清教徒的孩童，其启蒙教育是从家里开始的，由母亲教导他们读、写方面的知识。孩子们第二阶段的教育主要放在经典著作的学习上，为他们将来上大学做准备。那时的牧师都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清教徒认为神的恩典需要通过人的头脑，才能进入到心灵，因此凡不读经或不教导圣经的牧师，都会被认为是失职。

牧师的证道每次需要两小时，讲章条理清晰、以圣经真理为主，其中还包括一些复杂的神学思想，这是那些灵性昏昧的人不能领受的。大多数讲章都有同样的模式：先讲解某段经文，接下来对这段经文所包含的神学思想进行扩展，然后再讲解这段经文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清教徒的牧师都接受过良好的培训，极其看重个人灵修。他们一天当中大多数清醒的时

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们在那里准备讲章，并将之逐字逐句地写下来。清教徒认为那些既没有接受过培训、又不认真准备讲章的人，并不适合讲道，他们把这些人称为“愚蠢之辈”（Dumme Dogs）。

为了防止这些人走上讲台，同时避免过度依赖英国本土的牧师，在抵达新大陆后第7年，清教徒在这片新土地上建立了一座神学院，准备培养自己的牧师。由于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将自己的图书馆以及一半的土地捐献出来用于建院，这所学院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牧师们在这所学院里不仅要学习圣经及各种古典语言，还要学习哲学和物理学。哈佛大学建成后不久，威廉大学、玛丽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大学也相继成立。

如果说美国就是清教徒留下的遗产，也不为过。1776年，新移民赶走了英国人，那时他们当中75%是清教徒。美国人身上那种对卓越、教育、政治制度、伦理及道德的追求，都源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还有为了荣耀上帝去改变世界的使命感。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大多数善举，都来自清教徒，而大多数恶行，都是因为人们拒绝了清教徒的世界观。

清教徒并不是一群完美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轻看安逸和享乐，追求灵性成熟、自律和美德，这使他们的灵魂有深度、有分量。而且他们从不随便地对待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态度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第七部分

理性主义统治时期

(公元1648~1789年)



57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公元1608~1674年)

第二个盲人诗人

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所写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存在了3000年之久，是人们心中不朽的经典。莎士比亚时代结束后不久，具有清教徒信仰的英国盲人诗人约翰·弥尔顿，也同样以史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神学思想。这首史诗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虽然和具有3000年历史的荷马史诗相比，它流传的时间还十分短暂，但有一天它一定会和荷马史诗一样，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

弥尔顿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富裕家庭。小时候，他经常和家庭教师比赛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很快，他的文学才华便展现出来。虽然他从小就患有眼疾，但他却如痴如醉地热爱书籍。他的哥哥后来回忆说，约翰经常熬夜读书，小时候写的诗歌就已经流露出远超过他实际年龄的成熟。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约翰继续用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创作诗歌。早在他认

真考虑要做一个专业诗人之前，他的一部分作品就已经被发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返回家中。此后5年，他靠着家产过活，一边学习音乐，一边创作出更多的诗歌作品。

在一次去往欧洲旅行的途中，写作长篇史诗的念头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但英国爆发内战的传闻使他回到伦敦，并在那里经营起一所只接收有钱人孩子的私立学校。当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王查理一世之间的内战爆发时，他正打算写一篇以亚瑟王为原型的长篇史诗。但这场战争迫使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自己的写作才华奉献给克伦威尔，撰写出许多政治性的宣传手册，为其清教徒的信仰进行辩护。他还为民众的权利进行了辩护，甚至呼吁赋予民众铲除并严惩暴君的权利。查理一世被斩首之后，弥尔顿被任命为克伦威尔政府的外文秘书，这个职位使他常常需要接触各国官员，特别是说拉丁文的官员。

后来他的眼疾不断恶化，1652年时完全失明，但他并未因此失去工作，而是将工作口授给一位秘书完成。不久之后，克伦威尔政府宣告解体，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为了逃避追捕，弥尔顿开始四处躲藏，但后来还是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以反对国王的罪名被处以罚金。在狱中，弥尔顿并没有遭到严罚拷打，因为新王想借着善待这位年老的盲人诗人（那时他的作品已是众人皆知）取悦英国民众。

弥尔顿一直梦想着能以荷马史诗的形式，将天堂里撒旦的

反叛以及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描述出来。1658年，他开始了这项历时5年才完工的浩大工程。《失乐园》最终于1667年得以发表，共含10卷。1674年再版时，又增加到12卷。4年后，《复乐园》也得以完成。

弥尔顿的鸿篇巨制令他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虽然他的声名不能与威廉·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弥尔顿只有7岁），但他的作品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作家，其中就包括《魔戒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 Trilogy*）一书的作者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有人说，正是弥尔顿的失明激发了他的创作才能，令他的想象力更为丰富。也许荷马也正是因此才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

弥尔顿的长篇史诗是继荷马史诗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它生动地描绘了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伟大场景，值得每一位基督徒阅读。



58

约翰·欧文

(John Owen, 公元1616~1683年)

清教徒中的伟人

有些基督徒错误地认为，伟大的学者是不可能爱神的。然而约翰·欧文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他是英国清教徒中的一位伟人。作为一个信仰虔诚的学者、领袖和作家，欧文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在提倡改革宗神学。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内心对这位永活之神的热情，以及他们之间活泼相交的关系。

欧文具有凯尔特血统，他的父亲是斯特拉翰（Stradham）的一位清教徒牧师。欧文12岁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6岁时取得了学士学位，19岁时取得了硕士学位。在求学的日子里，为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获取更多的知识，他每晚只睡4个小时，这种生活方式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欧文心中总怀有一种使命感，希望自己能投身到有意义的事业中。1637年，欧文因与牛津大学校长发生分歧而离开了那里，一切对美好前程的盼望、

对学有所成的憧憬，顷刻间化为泡影。然而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并未停止。

欧文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别人的两三倍。他是伦敦好几家教会的牧师；他是长老会与公理会之间的协调员；他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竞选时的牧师；他是英国议会的常任讲员，英王查理一世被处决的那一天，他在议会发表了演讲；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议会派驻牛津大学的代表；他是牛津大学的系主任和副校长；他是一位多产的神学作家；他是11个孩子的父亲，其中10个幼年夭折；他曾拒绝波士顿第一教堂请他担任牧师的邀请，也曾拒绝哈佛大学及荷兰几所大学请他担任校长的邀请。牛津大学后来认可了欧文一生的著作，授予他神学荣誉博士的学位。在遭受了好几年哮喘及胆结石的病痛之后，欧文于1682年去世。

欧文拥有卓越的头脑，具有掌握大量信息、将之整合并诉诸笔端的能力。他一生笔耕不辍，发表了80部作品，其中一些是大部头的的神学专著。他大多数的作品至今仍被再版，成为今天基督徒的学习材料。他用了16年时间辛苦写成《希伯来书》注释，这是一部多卷集的专著，是17世纪学术界最优秀的解经书。

欧文带给我们的属灵财富并不在于他外在的服侍，而在于他内心对上帝的热情。他与上帝之间活泼的个人关系使他得着喂养、力量和扶持。欧文每天都要坚持祷告和默想，这成为他

得以生存下去的源泉。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清教徒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比大多数清教徒做得更好。他对学习的热爱使他认识神，并与这位他所挚爱的神相交。学习只是工具，可以滋养他的头脑、心灵和生命，但绝不是目的。今天许多基督教的领袖都会尊敬他，因为欧文带给他们生活巨大的影响。如果基督徒知道欧文带给他们教会的牧师和带领人多大的影响，他们也一定会尊敬他。



59

布莱斯·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公元1623~1662年)

见解独到的思想家

人类历史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两个天才，大多数这样的天才仅在某一领域具有超人的才能，而布莱斯·帕斯卡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他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启蒙运动兴起之时），在理性思考方面，他的才能旁人无法企及；此外，他还享有数学家、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护教学家的美誉，并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帕斯卡尔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是法国克莱蒙—费朗地区的一名公务员。3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父亲经常带他参加科学院的会议，这给他日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帕斯卡尔小小年纪就在数学上展露出独特的才华。但是，在他15岁前，父亲一直不肯让他阅读有关数学方面的书籍，甚至把它们都藏了起来，希望借此迫使他兼顾语言方面的学习。帕斯卡

尔不肯放弃，坚持解出32项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欧几里得数学命题，因此其父亲不得不做出让步。

帕斯卡尔后来放弃了挂名天主教徒的身份，成为一名詹森教派（Jansenism）的信徒。詹森教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信奉加尔文主义信条，这些信条也是奥古斯丁曾教导的。帕斯卡尔获悉生活的奥秘及苦难的问题，都能在神奇妙的恩典中找到答案。于是他开始仔细研读圣经，希望从中找着令人深感困惑的生命问题之解，结果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这使他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深刻的反思。帕斯卡尔去世后，他的仆人在他的衣服衬里上发现了一些潦草的笔迹，记录着他8年前的一段神奇的经历。他把这个经历称为“烈焰之夜”（The Night of Fire）。帕斯卡尔从未将这段经历示人，因为他认为这个经历永远也不能替代圣经所带来的启示。

帕斯卡尔的一生已足够写成一卷《名人录》（*Who's Who*）的内容了。他是全世界物理、数学领域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概率论》。他研究概率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朋友赢得赌局的胜利。至于他写的《几何学》一书，数学家们一致认为，其内容的深奥程度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少年人之手，而这本书的确是在他十几岁时写成的。帕斯卡尔19岁时发明了第一台计算器，为当时做税务员的父亲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他还制定出大气压力和液压系统所需的流体平衡原则，甚至发明了吸尘器和手表，并设计了一幅巴黎市区交

通图，这张图出现了几个世纪之后，巴黎才开始有公交车的运营。

帕斯卡尔39岁时去世，那时他已开始撰写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督教护教学专著。令人庆幸的是，他的朋友们收集了这部书的草稿，并在8年后以《思想录》的名义予以公开发表。这本书大体上类似帕斯卡尔所崇敬的奥古斯丁所写的《忏悔录》，其中充满了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刻洞察。这本书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书籍之一。他认为悲惨的人类可以因着信并借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得着改变。上帝的见证数不胜数，但若非借着上帝所赐的信心，这些见证就全无意义。

帕斯卡尔在护教学、物理学和数学方面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列。虽然已经过了300多年，但这位特立独行的天才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属灵之旅。在一些人眼里，帕斯卡尔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拥有十分深邃的思想，甚至他那些潦草的笔记也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



60

约翰·班扬

(John Bunyan, 公元1628~1688年)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

杜撰的故事永远也不能代替神的话，但是基于圣经真理写成的故事，则可以使神的话语深入人心，加强人们的信心。约翰·班扬是英国的一个清教徒牧师，他就以圣经真理为基础，写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流传甚广。他生于埃尔斯托(Elstow)，是一个锡匠的长子。锡匠在英国是一个不受人尊重的职业。班扬的教育情况也很一般。作为一个贫穷的锡匠的儿子，他根本不可能上大学。年轻时，他过着一种粗野、散漫的生活，他所拥有的极大天赋尚未显露出来。

1653年，因受到路德所写的《加拉太书注释》以及贝德福德浸信会的约翰·吉尔福德(John Gillford)牧师的影响，班扬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此后几年，当新登基的英国王室禁止新教徒(持非圣公会信仰的信徒)讲道时，他得到了一些讲道的机会，他的恩赐也逐渐显露出来。民众很喜欢听他讲道，但

他的讲道却令当权者极其恐慌。他们将他投入监狱。在他被捕前以及在被拘押的那段时间，当权者答应，只要他同意不再讲道，就可重新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 this 建议，他的刑期也因此从三个月被延长至11年。

狱中的班扬承受着孤独的痛苦，但神正是利用这样的痛苦熬炼着他的心灵，令他创作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品。17世纪60年代的英国，所有清教徒学者和作家都遭到大学的拒绝，教会也禁止清教徒传道人讲道，写作从而成为这些人抒发内心属灵热情的唯一通道。他们无论是在逃亡中，还是在监狱的牢房里，都没有停止写作，我们也因此从他们的作品中蒙受了极大的祝福。1672年班扬刑满释放前，贝德福德教会邀请他担任该教会的牧师。为了能够留在贝德福德，他后来拒绝了来自伦敦的邀请。1688年，他在骑马前往伦敦的途中遭遇到大雨，浑身湿透，罹患风寒去世。

班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作品（60多卷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路历程》。这是一本讲述属灵历程的寓言式故事。借助圣经本身的一些说法，他创作了“基督徒”这个人物，书中讲述了“基督徒”从毁灭之城启程、最终穿越死亡的冷河进入天国的艰难历程。凡是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一次又一次地在书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天路历程》在英国也成为继圣经之后最受欢迎的书籍，并在1678年第一次出版后的12年中再版了12次。

一次，英王查理二世询问约翰·欧文（参看58篇），他怎么会喜欢听一个没文化的锡匠讲道。欧文回答说，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换取班扬的讲道才能。近一个世纪后，大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也为1767年再版的《天路历程》作了序。当19世纪的英国宣教士积极火热地前往世界各国宣教的时候，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圣经，接下来就是《天路历程》。

如今这本书已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在长期畅销图书的榜单上，它仅次于圣经，名列第二。这本书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败坏的世界生活、如何为我们的喜乐而战、如何从容地面对死亡。



61

敬虔主义者 (公元17~18世纪)

心灵的宗教

教会经常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帮助人们将知识与灵感有效地结合起来。综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经常会像钟摆一样，在认知与感觉之间来回摇摆。人的感觉及过激反应，经常会导致人们在追求知识或神秘经验的时候走向极端。宗教改革运动后期出现的敬虔主义者，在人群中就引起了这样的反应（也有人称之为过激反应）。

敬虔主义运动起始于德国。100年来，路德宗所宣称的正统神学教义已失去生命力，该运动应运而生。敬虔主义者支持路德的观点和做法，认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路德所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他们觉得路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并非重生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教义层面的问题，而是心灵层面的问题）。敬虔主义者从未形成一个宗派或独立的团体，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跨越宗派的观点、看法和生活方

式，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大多数的基督教派别中找到它的踪迹。

17世纪末，在一些宗教改革团体中，人们为了荣耀神而从事的思想活动，逐渐被那些没有生气、死气沉沉、精雕细琢的神学教义所取代。随着人们对宗教改革的热情逐渐减弱，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教人士带来的生命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僵化的教条以及教会的宗教仪文。敬虔主义者试图重新恢复人们实践基督教信仰的热情，钟摆已经开始摆向另一端——回归到人的心灵。

他们希望，基督徒的生活能够重新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堂为中心。他们重视个人得救，强调个体读经以及小组查经、过圣洁生活、传福音以及宣教的重要性（其中大多数内容仍被具有清教徒思想的人所重视）。与此同时，他们降低了教义的重要性，并在教义之外添加了以人为本的主观因素，这是清教徒以神为本的思想中从未有过的。如此一来，人对神话语的经历被赋予了与圣经真理同样重要的地位（有些20世纪新正统神学的味道。参看第84篇）。

敬虔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教派因此得到振兴。但敬虔主义者最大的贡献主要在于，它率先启动了现代的宣教运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第一批穿越大西洋对外宣教的摩拉维亚信徒（我们在第63篇时会提到他们）。此外，敬虔主义者也松动了英国及美国的属灵土壤，为他们迎接日后

的属灵大复兴做好了准备。

像其他运动一样，敬虔主义者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它高抬人的“经历”过于人的“理性”，结果导致人们过于看重自身的感受，因此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案例。有些人开始追求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神秘主义经验。19世纪出现的现代自由神学，就继承了某些敬虔主义者的观点。如今，敬虔主义者的观点充斥着现代基督教，尤其是在美国，它主要是以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对理性的不信任和忽视。

人人都同意保持平衡至关重要，但每个人对平衡的看法都截然不同。敬虔主义者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纠正了一个不平衡，却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新的不平衡。由于缺乏教义上的指导，人们过于看重自己的情绪感受，滋生出“以我为本”（Me-ism）的倾向。对圣经真理的追求的确离不开一颗火热的心，但头脑上对真理的认知也很重要，同样应当予以重视。



62

艾萨克·牛顿爵士

(Sir Issac Newton, 公元1642~1727年)

科学革命

艾萨克·牛顿爵士并没有发明“牛顿无花果饼干”，也没有发明地心引力——他只是对地心引力的原理进行了阐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信仰的科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威廉·哈维（医学家）、罗伯特·波依耳（化学家）和安东尼·范·莱文霍克（微生物学家）都信仰上帝。这张“星光熠熠”的科学家名人录，刚好拆穿了基督教与科学势不两立的谎言。

牛顿出生于英国的林肯郡附近，他出生的那一天刚好是圣诞节。他出生的同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是遗腹子，年幼时就由祖父母抚养。虽然他是在农场里长大的孩子，却极其热爱读书。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神学，但物理学和数学吸引了他的兴趣，他卓越的思考能力开始得到展现。

牛顿认为整个宇宙就好像是一台精密仪器，这仪器按照预

先设定的规则运行。他看到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就想到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设计者，而这个设计者将数学定律运用在自己的创造之中。牛顿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将数学应用到物理学领域，从而解开了这个世界运行的奥秘。他的“万有引力”学说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他还解释了行星运行的方式。牛顿还利用光学知识发现了彩虹的成因。此外，他还发明了能够聚光的望远镜，并对光学原理做出了解释。

牛顿富有创意的头脑甚至开始思考上帝的属性问题。与他所有的科学发现相比，他认为圣经的启示更为重要，他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上帝。他所写的关于圣经以及神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超过了100万字，远比他所写的科学论文多得多。但他一直对“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存有疑问。

1687年，他撰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学原理》一书，将运动物理学与“万有引力定律”结合了起来。但这本书一经出版就饱受诟病，因为其内容实在艰涩难懂。在这本书再版的结论部分，他加入了一段清楚的信仰声明，大概意思是：透过设计得极其完美的太阳系就可以看出，万物都在一位上帝的掌管之中，他是无限，也是永恒。

牛顿和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共同发起了启蒙运动，并影响了20世纪之前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后来加入到无神论者的阵营中，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位没有人情味的上帝创造的，他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又无情地抛弃了它；另外一些人则完全放弃了信仰；但牛顿继续持守着自己的信仰。

16~17世纪，世界上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宗教革命，另一场是科学革命。尽管学者在界定两者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一系列的证据证实，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始于新教的诞生。人们若不相信这个有序的宇宙是由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创造的，那么一切科学上的探索就会显得毫无意义。那个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所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正在按照统一的规律运行着，而这些定律是可以被人们发现的。

虽然说“科学起始于基督教”有点言过其实，但那种声称基督教与科学势不两立的说法简直就是谎言。好几个世纪以来，艾萨克·牛顿爵士都是人们公认科学家、数学家，他就是一位既信仰上帝又相信科学的人。



63

摩拉维亚教派 (公元1732年)

现代宣教运动的诞生

大多数18世纪的基督徒都以为“大使命”只是使徒时代的事情，但摩拉维亚人对此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全球性的宣教运动就是从他们开始的。现代宣教运动起始于1732年10月8日，一艘载有摩拉维亚宣教士的荷兰商船驶离哥本哈根，前往西印度群岛。

这些摩拉维亚人都是敬虔主义者，有着很强的路德宗背景，其信仰根基可追溯到约翰·胡斯。胡斯殉道后，他所成立的“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成员被迫转入地下，躲过了统治者的迫害。宗教改革时期，他们在欧洲爆发30年战争之前就分散到欧洲列国，逃过了被彻底剪除的命运。后来，他们在摩拉维亚定居，德国人称他们为摩拉维亚人，这个称呼一直流传至今。

1722年，当他们准备寻找一块新的安居之地时，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德国伯爵——尼古拉斯·路德维希·冯·亲岑多夫，

他邀请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定居下来。伯爵还同时收容了另外一些寻求政治避难的敬虔主义团体居住在他的领地上。他和自己收容的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主护所”（Herrnhut）的团体，由他亲自领导。这位年轻的伯爵性格有点古怪，也有人说他性格乖僻。他是欧洲某名门望族的后裔，家庭背景十分显赫，因此举止中总流露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傲慢之气。

1731年，亲岑多夫前往哥本哈根参加克里斯蒂安六世（Christian VI）的加冕礼。在加冕礼上，他遇到了两个来自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以及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他们都是新教徒。他们恳求他差派宣教士前往西印度群岛，将福音传给那里的奴隶。回来后，他与摩拉维亚团体分享了这个请求。第二年，他们就差派了两个人前往圣托马斯岛宣教。

此后30年中，摩拉维亚人在爱沙尼亚、格陵兰、拉布拉多、苏里南、南美、非洲的几处地方，以及美国的印第安部落，都成立了宣教站。摩拉维亚的宣教士们明白，宣教最重要的两个原则，一是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二是要帮助当地的信徒在基督里找到满足，而非只是依靠宣教士。今天的一些宣教士并没有掌握这两个宣教原则。

一次，约翰·卫斯理从英国前往美国的佐治亚州，当时那里还是英属殖民地。途中，他遇见了一些摩拉维亚人，这些人在旅途中的表现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时，他们的船在行驶过程中连续遭遇暴风雨的袭击，他因怕死而深感恐惧，而那些摩拉

维亚人却平静地唱起了赞美诗。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他前去拜访“主护所”，在那里看到的大多数情景都令他欣喜，但他也发现了伯爵的自义以及伯爵身边的人对他的个人崇拜，这些所见都令他不安。

60年后，这些曾经的宗教难民已差派了300名宣教士。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主护所”于1727年成立了24小时祷告会，这个祷告会一直持续了100多年没有间断，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摩拉维亚人在宣教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个祷告会了。当然，摩拉维亚人也有不足之处，但如果上帝在天上要组织一个宣教士的“全明星”队伍，其中肯定少不了摩拉维亚人。



64

约拿单·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公元1703~1758年)

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

约拿单·爱德华兹是一名清教徒牧师，是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及重要的思想家。1703年他生于康涅狄格州，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牧师。父亲在爱德华兹很小的时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希望能在他十二三岁时送他进耶鲁大学学习。17岁时他取得了学士学位，19岁又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他一直在耶鲁大学教书，直到1727年，他蒙召到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教会牧会。当时，他的祖父，著名的所罗门·斯托达德，就在北安普敦教会牧会。两年后，斯托达德去世，年仅26岁的爱德华兹接续了祖父的职位，成为这间颇具影响力的教会的牧师。

爱德华兹的讲道铿锵有力，会众敦促他将这些讲章发表出来。圣灵借着他在1734~1735年及1740~1742年间的讲道带来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属灵大复兴。然而从1743年起，爱德华兹与

教会的关系开始出现摩擦，最终导致他于1750年被教会免职。人们对他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不允许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缺乏真实悔改见证的人成为教会的管理人员。此外，他在讲道中呼吁人们善待印第安人，这并未得到会众的普遍认同。

被迫离开北安普敦之后，爱德华兹来到马萨诸塞州一个名为斯托克布里奇的边境村落，牧养胡萨托尼克部族的印第安人。在那种相对隔绝的生活状况中，他写出了自己最伟大的作品。1757年，他接受任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但上任后不久即患病，最终因为接种了一支天花疫苗而死。

爱德华兹的讲道清晰地阐明了神的话，并用理性的方法对其进行论证。他坚持认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活在神的话语中。他的那些逻辑严谨的讲章深深地吸引着会众。虽然有时他只是用单调的语气读讲章，但由于其中充满富有智慧及挑战性的观点，所以凡听到他讲章的人都会禁不住大声呼喊，或紧紧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有时爱德华兹不得不在讲道中停下来，等着会众所发的响声平息下来。

今天，人们心目中爱德华兹的形象多少有些扭曲，觉得他是那种看起来既严厉又乏味的人。实际上，比起美国的其他基督徒，他给我们带来的真理是最多的。他是一个造诣极深的学者，心中燃烧着圣灵之火，他的知识和灵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强调信心与知识的融合，这后来成为美洲新大陆基督徒的世界观，有人甚至将他视为北美的奥古斯丁。

爱德华兹与他的会众并不像他们外表上看起来那么乏味。他的头四个孩子都出生在礼拜天，而民间有一种说法——孩子在哪一天受孕就会在哪一天出生，所以会众都拿这件事来取笑他。你能想象吗？在一个清教徒的教会中，一大群看似乏味的会众，竟会为这样的事取笑他们的牧师——伟大的约拿单·爱德华兹！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教导并活出圣经真理，爱德华兹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相信学习上帝的真理能改变人的性情，并让人拥有好行为。他思想深邃、言语简单易懂，对上帝的、上帝的话以及上帝的工作总是满怀激情。



65

属灵大觉醒 (公元1740年)

预备独立

经过一系列的革命之后，作为殖民地的美国拒绝接受英国的统治，这场属灵革命又被称为“属灵大觉醒”。从1720年开始到“属灵大觉醒”之前，属灵复兴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并于1740年达到顶峰。那个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听到神的话归信了基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18世纪初，美国人不再为了生计发愁，对灵性的追求也开始冷淡下来。随着商业的繁荣和财富的膨胀，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欲也开始增加。参加教会活动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转为一种社会责任，大多数人甚至连教会的门也不登。牧师们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讲道内容，却更注重讲道技巧。

然而，1720年，上帝借着荷兰改革宗布道家西奥多·弗里林海森（Theodore Frelinghuysen）的讲道点燃了圣灵的火焰。当 he 从德国来到美国时，他对这个国家冷淡的属灵光景深感震

惊。他在新泽西的讲道获得了巨大成功，圣灵之火迅速蔓延到中部地区，接着又扩展至南部地区，长老会、卫理会和浸信会均受到其影响。圣灵之火最终又烧到了新英格兰的公理会，并借着乔治·怀特菲尔德和约拿单·爱德华兹的讲道震惊了整个世界。

这里需要提到一位十分著名的人物——怀特菲尔德。他是一名巡回布道家，可以同时向3万人讲道，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美国从未有过任何人能与这位年轻的英国布道家相提并论。为了聆听神的话、接受基督为罪人的代赎，人们骑着马跋涉几英里路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怀特菲尔德在全美各处的讲道带动了一场遍布全国的属灵运动，后被人们统称为“属灵大觉醒”。

但这场运动也在教会中激发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当一些牧师为自己听到的信息欢欣鼓舞时，另一些人却颇为担心，因为有报告说，有些信徒在情绪上表现得过于狂热，还有些平信徒开始指责牧师的属灵生命已经死亡。爱德华兹为此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为这次的“属灵大觉醒”运动进行辩解，试图让读者明白人们心灵深处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警告人们不要对那些辞藻华丽但内容空洞的讲章表现出过度的情绪反应。他提醒说，当人的亢奋情绪过去之后，那些讲章并不会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持续不断地活在神的话语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悔改成为真实的见证。

在“属灵大觉醒”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归信了基督，仅在新英格兰就成立了150间教会。教派之间的隔阂开始削弱，福音布道及宣教工作开始增加。人道主义的援助行动也从这时开始兴起。越来越多培养教牧人才的神学院被建立起来。文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带有个人主义色彩，为美国谋求政治上的独立开辟了道路。爱德华兹关于“因信称义”的讲道和他撰写的关于真实悔改的书籍，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公认他是美国“属灵大觉醒”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很多人为其后兴起的两次属灵复兴运动提供了帮助。



66

大卫·布莱纳德

(David Brainerd, 公元1718~1747年)

印第安人的使徒

早期登上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关系很不稳定，有时相安无事、有时互相屠杀。有时，人们会把印第安人描述成毫无人性的蛮子，另一些时候又把白人描述成邪恶的魔鬼。我相信有些印第安人和白人的确很可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至于如此凶狠邪恶。为了将福音传给印第安人，大卫·布莱纳德受长老会差遣前往印第安部落宣教，用他的全部生命去服侍印第安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是自我牺牲的典范人物。

以前曾有几个英国人在印第安人中服侍，比如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和托马斯·梅修父子(Thomas Mayhew Jr. and Sr.)。17世纪时，他们在马萨诸塞州只带领了几个印第安人信主。后来由于有些白人定居者不同意向印第安人宣教，这项工作就逐渐停顿下来。直到美国爆发了“属灵大觉醒”，才恢

复了对印第安人的宣教活动。当时只有少数几位牧师向印第安人讲过道，如约拿单·爱德华兹。布莱纳德也是在那时做出决定，前往印第安人部落宣教。“属灵大觉醒”激发了美国上百家教会的福音布道和宣教工作。

布莱纳德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德姆，14岁时父母双亡。父母去世后，他继续经营父母留给他的农场。21岁时，他悔改信主，然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为今后的服侍做准备。然而，他在立志成为宣教士一事上表现出过度的热情，最终因此被学校除名。情况是这样的：他可能被“属灵大觉醒”运动的激情冲昏了头脑，对学校里的一名老师颇感失望，而且公开指责他全无恩典可言，学校因此开除了他的学籍。

接下来，他跟着一名私人教师继续学习。1742年，他获得了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牧师协会颁发的讲道资格证。不久之后，一家宣教团体差派他到马塞诸塞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印第安部落传福音。由于他不再需要经营父母留给他的那个农场，他就把它送给了一个朋友，用以资助对方完成学业。在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大部分时间里，布莱纳德都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他生活在他们中间，睡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帐篷，吃的是和他们一样的食物。起初，传福音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后来圣灵开始动工。一年之后，77名印第安人归信了基督并在信仰上扎下了根。

布莱纳德在印第安人中只服侍了4年。1746年，在萨斯奎

哈纳河流域的巡回布道中，他的肺结核病复发并恶化。但是他不肯因此停止布道，因此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连续几个月无法正常工作。养病期间，他在自己的良师益友约拿单·爱德华兹的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由爱德华兹的女儿耶露莎（Yerusha）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他们两人因此坠入爱河并宣布订婚，但布莱纳德并未等到结婚就去世了。

布莱纳德留下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录着他的宣教生活。这本日记由爱德华兹编辑整理后，于1749年出版。布莱纳德的一生极其短暂，但他的那本日记却经久不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宣教士们，其中也包括人称“现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凯里。上帝只赐给布莱纳德29岁的生命（与20世纪的殉道者吉姆·艾略特一样），但他利用这短短的时日创造了永恒的辉煌。



67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公元1703~1791年)

追求完美

1703年，大西洋两岸各出生了一个名叫约翰的男孩子，他们长大后均成为举世震惊的人物。这两人虽然素未谋面，但彼此都很欣赏神借着对方成就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新英格兰的约拿单·爱德华兹（约翰是约拿单的呢称），“美国大觉醒”时期的代表人物；另一个就是约翰·卫斯理，英国复兴运动（与“大觉醒”同期发生）的关键人物。

卫斯理的家庭有着清教徒传统。他的父亲撒母耳（Samuel）是爱普沃思圣公会的一名牧师，母亲苏珊娜（Susanna）则是一个“超人妈妈”，她一共生了19个孩子（卫斯理排行15），有几个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约翰6岁时，家里房屋着火，有人把他从二楼的窗户里扔了出去，隔壁的邻居用双手接住了他，于是他逃过一劫。但他们所住的房子却完全烧毁了。苏珊娜经常给孩子们读经并教导他们圣经真理，所以孩子们从小就养成

了良好的习惯。此外，她每周都对每一个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训练。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心读经祷告，她有时要把长裙的下摆蒙在头上，因为孩子们的吵闹声太大了。

后来，约翰和他的哥哥查尔斯（Charles Wesley）一起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在大学里，约翰博览群书，阅读了许多属灵经典以及早期教父的传记。他和日后成为著名布道家的怀特菲尔德都曾是有名的淘气包，但是后来他们逐渐静下心来，和查尔斯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圣洁俱乐部”（Holy Club）的小团体。其他学生都取笑这个团体，戏谑地称它为“循道会”，因为他们追求属灵的生活。他们一边培养读经、祷告、禁食的习惯，一边在社会底层服侍那些被压迫的民众，这些习惯和事工为他们日后兴起更大的属灵复兴运动打下了根基。

1738年，在阅读路德为《罗马书》所作的序言时，卫斯理被圣灵光照，承认了自己的罪，从而得到了基督的救赎。后来他开始帮助怀特菲尔德的事工，与此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讲道事工。有几千人在听完他的讲道后，表示愿意寻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他也安排了适当的同工满足他们的需求。卫斯理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凌晨4点起床后，他没有一刻闲着。他的生活极其规律，所以，当他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巡回布道的时候，可以一天几次向会众讲道，此外还要在马背上奔波，每天大约都要跑90多公里的路。一直到70多岁时，他还坚持过这样的生活。

到卫斯理88岁去世时为止，他总共的行程有40万公里，讲道4万次。公理会已成长为一个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教派，不久之后它在美国也发挥出同样的影响力。卫斯理发表了自己的讲章，撰写了第一批福音单张，还创办发行了一份月刊。他的哥哥查尔斯（1708~1788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创作了6500首赞美诗，其中有许多都脍炙人口，今天人们仍在传唱，比如《唯愿所求》（*Can it be*）及《听啊天使高声唱》（*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尽管卫斯理在清教徒的家庭中长大，但他的神学思想更倾向于阿米尼乌斯教派，焦点是他所提出的“完全圣洁”教义。每个时期他的观点都有点不同，但他在这个教义中主要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人在这一生就能达到完全的圣洁（至少这个圣洁并不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圣洁），而是他相信上帝的爱能改变人的灵魂，使人能拥有一颗无罪的良心。

今天我们仍能在福音布道的工作中发现卫斯理和爱德华兹的影响。据称，公理会已拥有大约7000万信徒，而卫斯理的思想不仅影响着公理会，也影响着圣洁派、五旬节派、灵恩派以及具有卫斯理传统的大学和神学院。



68

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公元1714~1770年)

最伟大的布道家?

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是葛培理（Billy Graham），还是德怀特·慕迪（Dwight Moody）？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还是让我们把乔治·怀特菲尔德也加在候选名单里吧。生活在18世纪的怀特菲尔德像今天的摇滚巨星一样，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远在高科技的大众传媒介质发明之前，他就可以面对面地向80%的美国民众说话。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出现之前，乔治·怀特菲尔德一直是美国最著名的人——尽管他是个英国人。他最后一次布道会在波士顿，一共吸引了23000人前来参加，比波士顿当时的总人口还多。在此之前，美国人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场面。

怀特菲尔德出生于格罗斯特一个名叫贝尔的小客栈里，由他寡居的母亲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上学后，他的成绩相当出色，但15岁时不得不辍学去工作。19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

学习，在那里遇见了卫斯理兄弟，并加入他们的“圣洁俱乐部”。他相当聪明，但没有学究气，在讲道方面的才能无人能及。

安立甘宗曾将他按立为神父，但不久之后他们当中就有人开始后悔做出这个决定。他们的传道人都是很僵硬、拘谨，而怀特菲尔德却是一个感情热烈、激情洋溢的人，有时甚至会表现得有些戏剧化。尽管如此，他讲道的语言却十分清晰明了，会众都可以听得明白，但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他这样的风格。后来安立甘宗不再允许他登上讲台，怀特菲尔德就跑到田间地头向普通的民众讲道。一传十、十传百，前来听他讲道的人变得越来越多。这令高高在上的安立甘宗教会感到相当害怕，生怕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会在平民百姓中引发骚乱。

有人开始反对怀特菲尔德在露天向普通民众讲道（许多英国人认为他这是在蛊惑民心），也不准他在讲道中提到罪和审判等字眼，因为以前从未有人在讲道中提到过这些词。多次有人威胁说要杀死他，他也曾遭过枪击和暴徒的殴打，甚至被人用石头打得半死。有一次他在讲道时，底下的人竟然将石块、鸡蛋和死猫如雨点般向他投来。但这一切均没有让他停止讲道。他不断地在英国、爱尔兰、苏格兰、荷兰和百慕大做巡回布道，甚至七次到访美国，在全美各州进行演讲，点燃了美国“属灵大复兴”的导火索。此外，他还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并4次登上约拿单·爱德华兹的讲台。

怀特菲尔德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讲道，以此作为这一天的开始。通常情况下，他一周讲道12次，也就是说，他一周总共要讲道40个小时。他经常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讲道次数非常频繁，有时累得他讲完道就开始吐血。长期高强度的工作最终导致他56岁就去世了。他一生布道18000多次，讲章都以圣经真理为核心，听过他讲道的人总共有1000万。他的老友约翰·卫斯理在他的葬礼布道上说：除了使徒们以外，只有怀特菲尔德呼召了这么多罪人悔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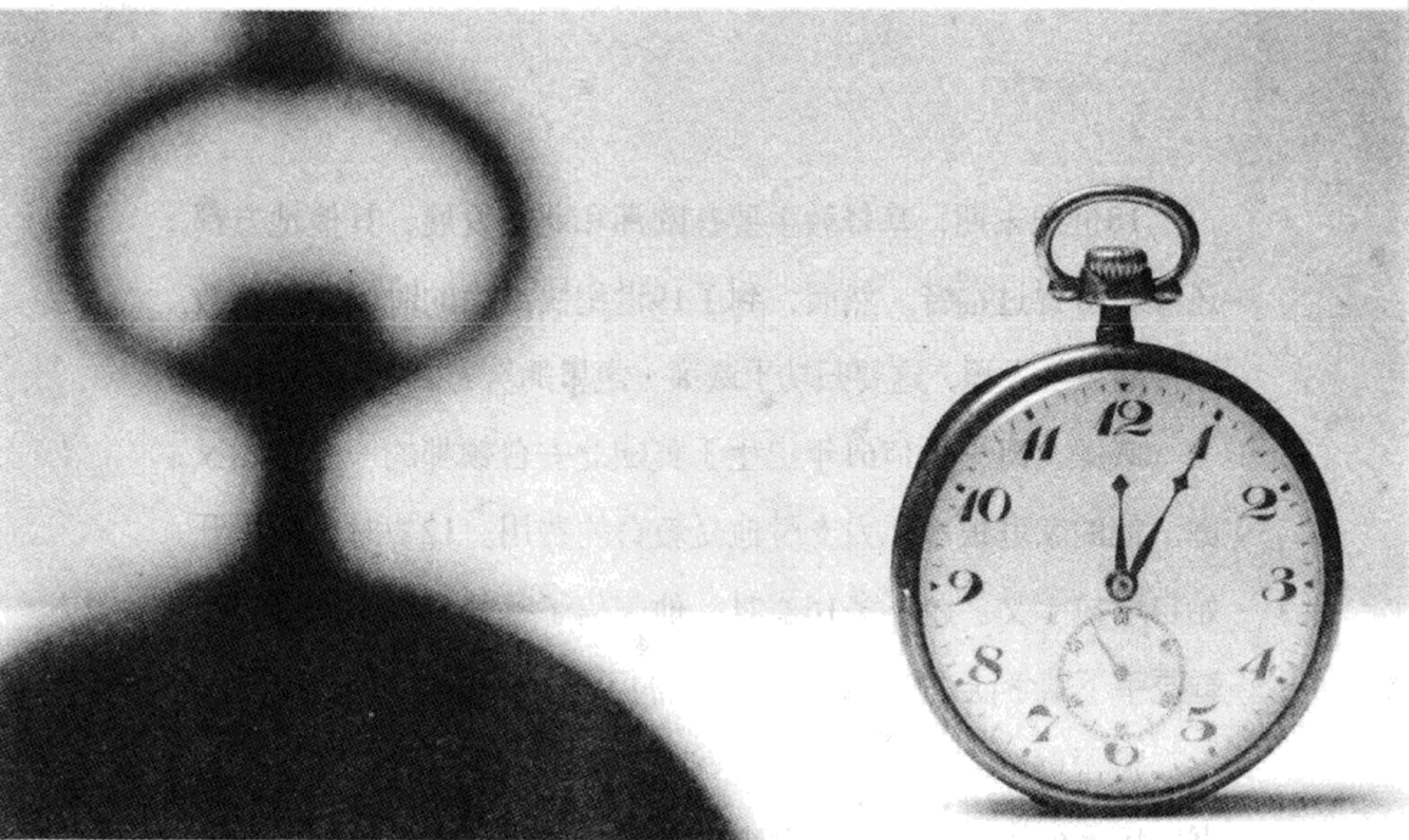
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方法在后几次的属灵大复兴中都派上了用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露天布道法。100年后，美国公理会和浸信会均采用了露天布道法，使圣灵之火迅速传遍了福音所到之地。此外，他与卫斯理和爱德华兹共同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巨大的属灵产业，就是福音教义。福音教义融合了清教徒和敬虔主义的思想，是这三个伟人所传讲的信仰核心——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每个人都需要因信称义，每个人都要奉献自己，并委身传福音的大使命。

葛培理和慕迪都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人们尊敬他们；然而，“历史上最伟大布道家”的头衔也许应当给予怀特菲尔德。

第八部分

宣教运动风起云涌

(公元1789~1900年)



69

威廉·凯里

(William Carey, 公元1761~1834年)

现代宣教之父

18世纪末期，基督教主要在欧洲和北美发展，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听说过福音。然而，到了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基督教已传播至各大洲，这要归功于威廉·凯里的努力。

威廉·凯里于1761年出生于英国北安普顿郡的一个贫困家庭。他的家庭根本无力支付他受教育的费用。12岁时，凯里开始自学拉丁文。差不多16岁时，他归信了基督。当时他在一个鞋匠手下做学徒，他一边学习鞋匠的手艺，一边学习圣经。

凯里对学习充满了热情，他经常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后来他接受了一家浸信会的邀请，成为那里的牧师，与此同时他仍然继续做鞋匠贴补家用，因为他的薪水十分微薄。他认为教会有责任将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实在太过疯狂。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大使命”只是属于使徒时代的事情，所以当凯里要去印度传教时，他的父亲、妻子以及

教会里的人都认为他疯了。

临行前，凯里做了两件有巨大影响的事。第一件是他在讲道中说：“要敢为上帝想大事，愿为上帝做大事。”他这次讲道被认为是历来最具影响力的讲道之一。第二件是他写了一本小书，只有87页，但却给它冠以一个很大的标题——《基督徒带领异教徒信主的责任调查》（这里选用了比较短的标题）。这本书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与路德的“95条论纲”不相上下。

凯里带着他的妻子（她对此行极其抵触）一起前往印度。一开始在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孟加拉分公司工作，但是，由于这家贸易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赢利，而不是拯救灵魂，这份工作最终成为凯里传福音的障碍。于是他决定移居到荷兰人监管的塞兰布尔，与他同工的有一名教师及一名印刷工人，他们和他是一起来到印度的。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同工组，他们一边建立教会，一边学习当地的语言，一边翻译并印刷圣经，还成立了好几所大学，给当地的文化带来极大的改变。

凯里掌握了好几种当地语言，并将这些语言的语法和词汇都刊印出来。此外，他还安排人把整本圣经翻译成6种不同的语言，并将圣经的部分经卷翻译成另外20多种语言。他拥有极高的语言天分，后来成为加尔各答福特威廉大学梵语、孟加拉语及马拉地语系的教授。

凯里为福音工作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他不仅要适应当地极其恶劣的气候、极差的物质条件，还要不断地和当地政

府的官僚周旋。此外，他还亲手埋葬了他的两任妻子和七名子女。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患难，但在41年的时间里，他从未返回过英国。

凯里开创了现代宣教理念（而我们以为宣教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的）。经过他的努力，当地人不再保留杀害婴儿和寡妇殉葬（将妻子与死去丈夫的尸体一起火化）的陋习。凯里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世界基督徒眼中宣教士的楷模。在他的生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苦难。上帝经常用苦难预备他的仆人。凯里并没有在困难中退却，所以他大大被神使用，甚至让人们惊奇。在属灵的道路上，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所拥有的信心、决心和恒心。



70

威廉·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公元1759~1833年)

社会改革家

今天，奴隶制仍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存在着。19世纪初，在威廉·威伯福斯和他的一小群朋友的带领下，奴隶制遭到了重创。这一小群人因为经常在伦敦北部的克拉朋一起祷告、读经、撰写政治宣传册而被人称为“克拉朋联盟”。他们知道奴隶制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于是决心废止奴隶制。

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每年从非洲卖出的10万名奴隶中，有一半是由英国的商船运输的。英国在这件极为丑恶的贸易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并在政治上支持奴隶贩卖。一小群人怎么能改变这一切呢？答案是靠着祷告。有一个人，他祷告，然后发表演说，而他对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机构——英国议会。

威廉·威伯福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8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姑姑将他抚养成人。那时，伟大的布道家乔

治·怀特菲尔德和《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都是姑姑家里的常客，而约翰·牛顿悔改信主前曾是一个奴隶贩子。14岁时，威伯福斯预感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就给当地报纸的编辑写了一封信，抨击奴隶制。

20岁时，威伯福斯从剑桥大学毕业，第二年通过选举进入英国议会。25岁时，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转折。那一年，他读了菲利普·多德里奇写的名为《灵魂在宗教里的重生和成长》（*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的书，从而悔改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本书激励他将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他的老朋友约翰·牛顿，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曾经有过从事奴隶贸易的经历，极力劝说威伯福斯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改变英国的奴隶制度，以此作为服侍上帝的一种方式。

1789年，威伯福斯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对奴隶制的演说，但这次演说并未引起任何反响。于是，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和“克拉朋联盟”的朋友们决定实施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开始影响公众的意见，让他们接受废奴的立场，然后将公众的意见提交到议会。终于，1807年，威伯福斯成功地说服议会在英国境内废除了奴隶制。然后他又开始游说欧洲列国，要求他们也废止奴隶制。在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大多数欧洲国家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废除奴隶制。1825年，他亲手培养提拔的接班人托马斯·巴克斯顿接替了他的职位，之后他宣布退休。巴克斯顿于1833年敦促议会通过了一项法

案，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威伯福斯在这项法案颁布后4天去世，他一生的梦想终于得以完全实现。

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还成立了许多协会，主要工作是促进海外宣教、保护英国国内传福音的工作、翻译圣经以及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威伯福斯亲身参与了其中69家协会的工作。他深知自己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托付，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智慧、魅力和演说才能影响那些政治人物，其中包括他的朋友、曾为英国首相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英国人极其敬重威廉·威伯福斯的工作，他们把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并在墓地上修筑了一块纪念碑以示对他的尊重。直到今天，由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开创的慈善机构仍在发展壮大，数目多得数不胜数。



71

查尔斯·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公元1834~1892年)

讲道王子

查尔斯·司布真出生于英国的凯尔维登。不像威伯福斯，他没有贵族血统，他的家庭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清贫的传道人，母亲一共生养了17个儿女，其中9个年幼时夭折。司布真儿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偏远的英国乡村度过的。当他已经在大城市伦敦向成千上万的人讲过道之后，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他发觉那些偏远的乡村更让他感到温暖。

司布真并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拥有过人的头脑，特别喜爱读书。6岁时他就读过《天路历程》，并且对这本书钟爱有加，一共读了100多遍。他的图书馆中收藏着12000本书，每周他都要读6本书。清教徒是他的良师益友，他从十几岁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人的作品，他们深邃的神学思想、充满热诚的灵性生活及对信

仰的实践，都深深地影响着他和他的服侍。

司布真十几岁起就开始讲道，展露出他在讲道上的才能。17岁时，他成为一家乡村浸信会的牧师。两年后，又成为伦敦新公园街教会的牧师，之后便在这家教会服侍了38年，其间他们的信徒人数从200人增加到6000人。皇室成员、议员、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后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以及其他显赫的达官贵人都在这间教会听他讲道。

司布真从未称自己是一名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都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他笃信加尔文教义，却无法将神主权的拣选与人应尽的责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他同时接受这两种教导，因为它们都是圣经所教导的。在他生活和服侍的年代，德国的大学倡导的自由主义神学开始侵袭欧洲的讲台。他觉得浸信会的保守派牧者们正在放弃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于是他决定撤出浸信会联盟。

司布真一周讲道10次，他的讲章主要以教导和福音内容为主，生动、直接、引人入胜且有很强的实用性，让老信徒们能够将传统教义与教义的最新阐述结合起来。司布真的一生共向1000万人讲过道，光是他的讲章就集结成63卷书，是历史上最高产的基督徒作家。慕迪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司布真的《完全恩典》（*All of Grace*）一书，这本书历世历代都排在畅销书之列，和他的另外两本书一样，都售出了100万册。

司布真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但其实他一直被抑郁症困扰，对丧失灵魂的负担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和其他上帝的先知一样，也有很多人批评他，这无疑加重了他内心的重担。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年，他开始发胖，饱受痛风和风湿病的痛苦。他去世之后，人们将他的尸体在城市会幕教会停放了3天，其间共有6万人前来悼念。一个长达3公里的送葬队伍护送着司布真的灵柩，10万民众站在街道两旁向他告别。送葬当天商店停业，人们降半旗以示哀悼。

司布真带给人们的并不只限于他的讲道。他所在的教会利用信徒捐献的善款，开始了一个救助城市贫民的新事工；司布真还开办了一家名为斯托克韦尔的孤儿院（**Stockwell Orphanage**）并对它深爱有加；此外，他还成立了一家牧者学院，一生共培养了900名牧师；不仅如此，他每周的讲道集被编辑成25个版本，用20种不同的语言出版发行，他去世25年之后，这些讲道集仍在出版发行。



72

约翰·巴顿

(John Paton, 公元1824~1907年)

逃离食人族

电视直播节目《生存者》有一集是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拍摄的。瓦努阿图以前被称为新赫布里底群岛，距离新西兰北部1600公里。今天那里生活的许多土著民族都摆脱了吃人的风俗，成为了基督徒。他们是怎样从食人族变为基督徒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他借着一位刚毅勇敢的宣教士——约翰·巴顿——成就了这一个神迹。

巴顿出生于苏格兰邓弗里斯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家人都是长老会的信徒。他父亲以织袜子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他11岁时也辍学帮助父亲补袜子以补贴家用。巴顿后来记录了父亲每天早晚两次带领全家灵修、督促11个子女周日上教会的情形。巴顿从小在家中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做好了为主献身的准备。

最初巴顿是在格拉斯哥的城市宣教团工作，他们去贫民窟

挨家挨户敲门，与人分享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遭到别人的威胁与攻击，这些经历对他日后向食人族传福音很有帮助。在贫民窟工作了10年之后，他听说南太平洋岛上的居民从未听说过基督并因此在无知中灭亡，于是他决定前往那里传福音。别人向他发出警告，因为20年前，约翰·威廉和詹姆斯·哈里斯这两名宣教士在那里传福音时被食人族吃掉，但巴顿并没有退缩。

1858年4月，巴顿和他的新娘马丽·安（Mary Ann）坐船前往南太平洋，11月在坦纳岛登陆。第二年2月12日，他们的儿子降生。3月3日，他妻子去世。17天后，他们刚降生的儿子（他用自己最亲爱的父亲的名字为孩子命名）也离开了人世。巴顿满含着眼泪，一边求神给他加添力量，一边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两个亲人。后来他在自传中坦承，在那样的患难中若不是神亲自加添给他力量，他一定会疯，或者因哀伤过度而死。

巴顿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了岛上，走过一村又一村，与人分享神在基督里的爱。他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躲过了别人的谋害；当岛上疾病肆虐甚至夺走了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时，他仍幸免于难；当岛上的土著偷走他的食物时，他就逃到岛对面的宣教士基地活了下来；追踪他的人放火焚烧他的小屋、试图杀死他，他却坐船逃脱。

后来，巴顿巡访了澳大利亚和英国，在那里收集善款，召集更多的宣教士。他还娶了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怀特克罗斯

(Margaret Whitecross)，之后重返新赫布里底。这次他们选择在阿尼瓦岛登陆，这个岛上的人对福音的反应很积极，于是巴顿夫妇就留在岛上，一住就是十几年。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一间教会，建起多所学校和孤儿院，并着手翻译圣经。

当巴顿年纪渐长，无法继续在丛林里生活时，他又开始了在澳大利亚、英国和北美的巡回布道之旅，试图唤醒更多人宣教的热情。到了巴顿的晚年，他所建立的学校已经培养出300名当地的传道人，这些人后来将福音传遍了新赫布里底的各个岛屿。除了巴顿夫妇的3个孩子（巴顿夫妇共生育了10个孩子），还有24对宣教士夫妇在岛上与他们同工。



73

德怀特·慕迪

(Dwight Moody, 公元1837~1899年)

“疯狂的慕迪”

上帝不仅使用伟大的学者，也使用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孩子。一百年前，神就使用了这样一个孩子，他后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葛培理。

德怀特·慕迪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附近的一个家庭，他们相信的上帝只有一个位格。他的家中一共有9个孩子。父亲死时，慕迪只有4岁。父亲的去世令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因此，慕迪只上到小学5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

17岁时，慕迪住在波士顿的舅舅让慕迪到自己的鞋店工作，条件是慕迪必须参加教会的活动。后来教会中主日学的老师带领慕迪接受了基督，但教会拒绝接纳他为教会的正式成员，因为他对基督教的教义还知之甚少。由于慕迪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又加上他本身来自乡村，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傻瓜。不过，他总是不断产生新的想法，而且他总能把它们

付诸实施。

1856年，慕迪移居到芝加哥，成为一名成功的鞋子推销员。与此同时，他为贫民窟的孩子开设了主日学，打算用卖袜子的钱支持这个事工的日常开销。这个计划成功了，不久之后，就吸引了100多名孩子。两年后，慕迪辞去了鞋店的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事工中。1863年，26岁的慕迪成为芝加哥青年基督教协会（YMCA）的主席，他将自己开设的主日学移交给一家功能完善的教会继续管理，这家教会日后更名为“纪念慕迪教堂”。慕迪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脑子里总有一些创新的想法，这使他成为当时芝加哥尽人皆知的人物，并被人们称为“疯狂的慕迪”。

慕迪所管理的芝加哥青年基督教协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使他有可能会接受邀请到英国演讲。当他向2万人讲道之后，他的名声一下子就传播开来。在为时5个月的英国巡回之旅中，共有250万人聆听了他的讲道。他返回美国时，像英雄一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并在美国召集了与英国一样的复兴大会，而且取得了成功。之后，他第二次访问英国，快结束的时候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做了一次告别演讲。这次的讲道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前来聆听，连水晶宫外（因为里面的座位已全部坐满）也挤了4万人。在1893年举办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他一天就向13万人讲道。

与自己同时代许多复兴布道家不同的是，慕迪在讲道中

并不只是传讲福音信息，他还加入了许多其他内容。慕迪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可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受教育，因此而创办了3所学校，其中一所在他死后更名为慕迪圣经学院；另有两家出版社，雷维尔和慕迪出版社，是为了发表他的作品而成立的。此外，慕迪还设立了一年一次召开的“诺斯菲尔德大会”，面向世界传福音的学生志愿者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就是该大会上宣布成立的。截止到1920年，该组织已向海外差派了8000名宣教士。

慕迪的神学理念非常简单明了，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人类的堕落带来死亡，救主流宝血施行救赎，接受圣灵使人重生。慕迪的讲道非常朴素平实，没有一点夸张及华丽之处，草根阶级的他总能用感人至深的寻常故事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慕迪死于19世纪即将结束的前几天，这时神已经使用他向1亿人宣讲了福音真理。

德怀特·慕迪是上帝的一位令人称奇的仆人。令慕迪没想到的是，他的工作使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从以神学教义为核心的信仰逐渐转变成为以情绪为主的活动。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长期演变带来的结果，教义不再是美国人信仰的核心，感觉才是。



74

戴德生

(Hudson Taylor, 公元1832~1905年)

入乡随俗的传道人

我们都喜欢性情热情温柔的人，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人格魅力比优秀的品格更重要。戴德生没有这种魅力，但品格却很优秀。

戴德生出生前，他的父母就祷告求主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希望他长大后到中国为主传福音。4岁时，戴德生就告诉别人他将来会做什么。但17岁时，他充满了少年人的叛逆之心，这完全打消了他前往中国传福音的热情。但是有一次，他在阅读一本小册子的时候接受了福音，前往中国传道的异象又重新回到他的心中。第二年他开始接受医学方面的训练。

1853年，戴德生加入了中华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坐船前往上海。抵达上海后，他发现许多宣教士都像贵族一样，生活在装饰华丽的西式院落中，根本与当地的中国人没有接触。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入乡随俗。他卖了自己的西

装，买来一套当地人穿的服装，甚至把头顶四围的头发都刮干净，只留了一条和中国人一样的辫子。当他穿着中国人的衣服深入到中国内陆，走过一村又一村去分发圣经时，其他住在沿海城市的宣教士们都批评他，认为这样太危险。

戴德生所在的宣教机构在中国做得不是很好。1857年，他决定辞职，自己单干，他坚信神一定会供应他所需用的一切。第二年，他与另一位与他有着相同传道热情的宣教士教师玛丽亚·戴尔（**Maria Dyer**）结婚。1860年，他们在宁波建立了一间教会，后来教会的人数逐渐发展到21个人。但是疾病的困扰使戴德生夫妇不得不在第二年返回英国。

回到英国后，他一边准备完成医学方面的培训，一边筹备着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事情，打算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内陆各省。他还决定不再向任何人开口要钱，而是直接祷告求主，相信他定会供应。接下来，他又马不停蹄地以惊人的速度翻译圣经，并在各大教会招募更多的宣教士，他告诉他们：“每个月都有100万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去。”尽管人们对戴德生的批评不断，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也不够柔和，但他招募宣教士的工作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将招募到的宣教士差派到中国的18个省份。

1866年，他和玛丽亚以及另外16名宣教士从伦敦起航，决定深入中国的内陆城市传道。这个决定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玛丽亚33岁时就去世了，他们所生育的孩子中有4个不

到10岁就夭折了。后来戴德生又与珍妮·福尔丁（Jennie Faulding）结婚，珍妮在戴德生剩下的年日中尽心竭力地服侍他。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当时戴德生正在瑞士。这次运动导致一些宣教士遇难，其中许多都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当时戴德生已经有70岁，病得很重，虽然此后他又多活了几年，但他再也没能彻底恢复过来。

戴德生在招募宣教士的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虽然他在言语态度上给人的感觉不够柔和，但正因如此，他招募到最能适应艰苦环境的宣教士。他所到之处，只要他开口说话，就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要求前往中国传道，于是内地会成了在中国的最大的宣教机构。戴德生成为给中国的福音工作带来极大影响的第一人。虽然戴德生会时常流露出抑郁的倾向、个性古怪、难以相处、对别人总有过多的要求，但这些性格上的缺陷并没有妨碍上帝以极为奇妙的方式使用了他。

虽然拥有个人魅力和感召力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但一个人的品格比他外在的魅力和感召力更能影响别人。戴德生坚忍不拔的专注力使他成为上帝的器皿。



75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 (公元1869~1870年)

权柄属于谁?

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争论最多的就是权柄问题。权柄到底属于谁？是属于圣经本身，还是属于传统及教皇？许多天主教徒认为教皇是绝对无误的（这是保守派基督徒在说到圣经时才会使用的一个词）。天主教关于教皇绝对无误的教义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许多基督徒以为“教皇绝对无误说”是天主教徒一直以来的看法，但事实上，这个说法在1870年7月13日才得到正式确认。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使欧洲陷入一片混乱。一些天主教徒认为，要想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教皇的统治。“教皇绝对无误说”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天主教徒的承认，他们想，要是这个说法能够被正式确立下来，他们就可以在教皇的保护下免遭社会动乱及暴君专政的命运了。部分天主教徒满心渴望建立

起一个更加强大的罗马教会，于是他们写下大量称颂教皇皮乌斯九世（Pope Pius IX）的赞美诗并将他称为上帝的代言人。

皮乌斯于1846~1854年在任，比他之前历任教皇在位的时间都要长。1854年，在既没有征得主教的意见，也没有征得教会众议会意见的情况下，他宣布说马利亚受孕时并没有原罪（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条教义的意思是指马利亚是童贞女，但其实它的意思是说马利亚本身并无罪性）。对此，部分天主教徒对教皇是否有权建立自己教义提出了质疑。

1864年，皮乌斯签发了一份《判决摘要》（*Syllabus of Errors*），谴责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民主主义、良心自由、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等思想中所包含的现代自由主义倾向。有些天主教徒并不同意教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教皇却坚持认为这些事物是威胁罗马教会的恶魔。皮乌斯九世在任期间，罗马教会丧失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加强教宗的权柄。

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皮乌斯召集了自16世纪特伦特会议召开以来第一次大公会议，共有793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来自服从教皇管理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这些代表在1869年12月8日起至1870年9月1日期间召开了好几次分会。会上安排了6项讨论议题，但最终讨论的议题只有2项，第一个是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比较麻烦的议题是关于教皇权柄的问题。

这次会议肯定了特伦特会议的决议以及教皇所签发的《判决摘要》的内容。会议宣称启示要优于理性，而启示只能从罗马天主教会中才能得到。接下来，会议又宣布说，教皇作为彼得的继任者，当他以教皇的身份说话时，在所有关涉信仰及实践的问题上都拥有最终的解释权。教皇的正式宣告既不能被改变或推翻，也不需要征得主教们的同意，而且所有信徒必须忠实地遵行。1954年，教皇皮乌斯十一世就动用了此项特权，正式宣布马利亚的肉身已升入天堂。



76

慕拉

(Lottie Moon, 公元1840~1912年)

浸信会宣教团的圣徒

慕拉去世时，海外宣教杂志（Foreign Missions Journal）将她称为“最伟大的宣教士”。今天的人对这样的称呼可能并不以为然，但在1912年，这却是对一个人极高的称赞。她一生在中国传道，是一位传奇人物，可以说是她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她的作为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这个世界。

1840年，慕拉出生于弗吉尼亚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在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总统家附近的一个种植园长大。小时候，她的性格桀骜不驯，人们都管她叫“小讨厌鬼”。后来她被培养成一个受过教育和文化熏陶的南方淑女。慕拉的母亲是一位寡居、个性独立的妇女，在她13岁的时候，她母亲就开始塑造她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可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宣教士。

慕拉上大学时对自己浸信会的成长背景特别反感，但她的生命在一次校园复兴会中改变了，她也在那次的复兴会上将自

已奉献给上帝。1861年，她获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前往佐治亚州的卡特斯维尔大学任教，那时美国的内战刚刚结束。然而，慕拉的梦想却是冒险，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到中国传道的宣教士。

1873年，慕拉到达中国东北地区，并在那里的一所女子学校教书。她发现自己的工作十分枯燥无味，于是要求地区宣教主任让她做一些传教和植堂的工作。她的这个想法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她决定只身前往平度，在那里建立一间教会。在平度的传道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和艰难，但是当地人愿意学习新事物，于是她继续坚持了下去。

后来，她开始培养当地一个名叫李寿廷的信徒做牧养工作，此人在后来20多年的时间里一共为1000多人施了洗，平度也成为美南浸信会在中国最大的宣教中心。1890~1912年，慕拉交替着做两项工作，一个是挨村挨户地传福音，另一个是在滕州培训宣教士。她还写信给美国浸信会，请求他们对海外的宣教工作提供支持。

20世纪的头12年，中国东北遭遇疾病和饥荒的侵袭。慕拉虽然组织了各种救助工作，仍然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受灾人口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饥民有饭吃，她甚至花光了自己在银行中的存款，因着极度的匮乏，她自己也停止了进食并于1912年圣诞节死于饥饿。

慕拉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像许多宣教士一样，她

的服侍并不为人所知，她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她死后才显露出来。她写信给美国美南浸信会请求对海外宣教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这个举动后来导致了美南浸信会女宣教士联合会的成立。1888年慕拉率先倡导的圣诞节募捐活动，如今每年都能筹集到上千万美元，累计捐款已超过了10亿美元。

今天，许多妇女都开始从事宣教工作，她们在做出这个选择时不再犹豫不决。然而在19世纪，妇女选择做宣教士简直就是革命，有些人觉得这有点出格。当慕拉选择做宣教士的时候，没有人能拦阻她，她选择去了中国，并用尽自己的一生向中国人传道。



77

玛丽·斯莱瑟

(Mary Slessor, 公元1848~1915年)

卡拉巴的女王

上帝总能透过艰难的生活环境成就自己卓越的计划。玛丽·斯莱瑟于1848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贫困家庭，家里只有一个房间，没有水、电，也没有下水管道。她嗜酒如命的父亲每天都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晚上还经常把她踢出家门。为了贴补家用，她11岁就开始在工厂工作，到了14岁，她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这些收入用于家里大部分的开销。

当斯莱瑟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在一个邻居的带领下信了基督，并开始参加附近一个长老会教会的活动。她20岁出头就已经在那间教会服侍了几年的时间，所以教会允许她到敦提的贫民窟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她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遭到在街头寻衅滋事的小痞子们的拦阻，这些遭遇对她日后的传道事工大有裨益。

因受到大卫·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的生平及殉

道事迹的感召，斯莱瑟加入了卡拉巴宣教团，前往非洲宣教。1876年，她抵达尼日利亚海岸，那时候奴隶贸易还十分猖獗。然后她开始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并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那时的非洲是个非常危险的地区，大多数男宣教士都选择在比较安全的、有围栏的居民区里工作，但她却选择进入非洲内陆，成为宣教团的一名传道先锋。3年后，她因为患疟疾不得不返回苏格兰休假。

当斯莱瑟再度返回非洲的时候，她进入到更深入的内陆地区，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衣食习惯，像非洲人一样住在土屋中。在那里，她一边教导他们学习，一边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一边还要照顾被他们抛弃的婴孩。与此同时，她不顾当地巫师的反对，进入各个村落向人传福音。不久之后，她再次患病，这次她又不得不返回苏格兰接受治疗。

第三次返回非洲的时候，她走得更远，这些地方甚至被那些男宣教士视为死亡之地。当她得知母亲和另外两个姊妹去世的消息之后，她更加放胆无惧地进入非洲丛林的腹地，因为家里再也没有人会为她的安全担心了。在将近25年的时间里，她生活在到处滋生着老鼠和臭虫的土屋中，忍受着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她的脸上、头上到处都长了疖子。55岁时，斯莱瑟和7个她所收留的弃儿搬到一个更加偏远的地区，开始了另一项工作，在那里，她除了要完成日常的传道工作，还要反对当地一个极为丑陋凶残的风俗——按照当地人的传统，男人可以随意

杀死妇女。

1915年，在非洲服侍了40年之后，斯莱瑟在她的小土屋中去世，她留下的工作由她收留的孩子们继续完成。斯莱瑟不仅赢得了英国人的尊重，也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喜爱，将她称为“众生之母”。她儿时所遭受的贫困与艰难，使她日后能忍受非洲的艰苦生活，那是绝大多数欧洲人不能忍受的痛苦。



78

亚伯拉罕·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公元1837~1920年)

一切所有都归基督

“在人类生存的空间中，没有一寸地土不属于基督这位至高无上的君王！”这是荷兰的改革宗牧师、神学家、教育学家、新闻记者、政治家亚伯拉罕·凯波尔曾说过的一句话。他出生于荷兰的马斯流，父亲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位牧师。在莱顿大学取得了神学学士和神学博士学位后，他自己也成为改革宗教会的牧师。

凯波尔深知教会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中作殊死的斗争，这两种世界观，一个强调的是人类的知识与能力的重要性，另一个强调的是人类的一切都应当归服于基督。这两种世界观，即世俗主义及基督教，都强调只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在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凯波尔提出了他的观点——如果基督是统管宇宙万物的君王，那么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层

面都应当从属于他并归他掌管。他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

凯波尔拥有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上帝的虔诚之心。他参与到这两种世界观的剧烈冲突之中，并号召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来加入这场战斗，这使他成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运动（Neo-Calvinist Movement）的推动力量。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将荷兰重新塑造成以基督教真理为根本的国家。在凯波尔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他在许多方面都显露出杰出的才能，不仅成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创立了一家新闻机构、建立了一家工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第一基督教民主党），而且在1901~1905年期间成功当选为荷兰首相。

凯波尔认为，每种世界观的形成都有一个假设的前提，这些假设的前提都需要经过信仰的检验。每一种文化、观点和运动的出现，其背后都有人们所要表达的世界观，而人们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不是揭示出其中的合理性，就是暴露出其中的谬误。

凯波尔在神学、教育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带来了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复兴。1898年，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举办的斯通演讲会（Stone Lectures）使他的影响力扩展到北美。20世纪时，欧洲的赫尔曼·杜依维尔德（Herman Dooyeweerd）和美国的哥尼流·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受凯波尔的思想影响最深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可能就要算弗朗西斯·谢弗（Francis Schaeffer）了，是他让千百万的基督徒

意识到世界观的问题，并知道了什么是文化分析。

凯波尔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他的思想方法直到今天仍带给我们极为巨大的影响。他知道当一个世界观被另一个世界观所替代，如世俗主义代替基督教，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许多基督徒都为美国和欧洲的现状感到悲哀，而凯波尔早在100年前就预见到这样的事，并试图努力阻止它的发生。

尽管美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而且是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不再是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国家，丧失基督教世界观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九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 20世纪

(公元1900~1945年)



电子书
PDF

79

世界宣教大会 (公元1910年)

从西方到全世界

19世纪，全世界的宣教事工发展迅速。在这100年间，全世界基督徒的人口从全球人口总数的不到25%上升至将近35%。教会也经历了4世纪以来最迅猛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全球一共有45000名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的禾场上工作，“只用一代人就**把福音传遍世界**”的理想似乎可以实现了。

然而世界上还有一多半人口尚未听说过福音，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虽然全球宣教工作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宣教士的主要输出地——欧洲和美国——又出现了新的反教会势力。教会不仅需要面对世俗化的影响，还要处理教会内部出现的自由主义倾向，有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受到世俗化及自由主义的影响离开了教会。

1910年，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目的是审时度势、合作宣教。虽然基督教在短时间内就影响深

广，但是世界各地的教会仍掌控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手中。虽然教会已遍满全球，但是教会并没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共有160个宣教机构的13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甚至还有殖民地）的代表。亚洲参会代表的人数不多，拉丁美洲并未派代表参加。

在这次为期10天的大会上，有许多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会议洋溢着合一的气氛，代表们对未来的宣教前景充满了信心。许多代表谈到了教会本土化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与会代表都同意这些建议。一些与会代表提出，教会不本土化会让人觉得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成为西方人。会议最终取得了两个主要成果：①合一的意识有所提高，这最终导致泛基督教主义的诞生和1948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成立；②大多数与会代表认识到基督教是全球性的宗教，因此教会应当更多地实现本土化。此次会议成为跨时代的标志，它不仅标志着殖民式宣教时代的结束，而且宣告了全球宣教合作时代的开始。进入20世纪后，各地的教会在这100年中越来越多地摆脱了西方教会的影响，拥有了更多更为本土化的教会。

此外，大会还对德国大学盛行的部分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探讨，比如，基督教是否是上帝的最终启示或最高启示。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引起了基督教各主要宗派领袖的兴趣，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也接受了这些思想。然而，他们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越多，对外宣教的热情就下降得越快。只用了一代人的工

夫，自由主义神学就彻底扼杀了欧洲以圣经真理为核心的基督教，并对美国的教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从1910年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及其成果中人们可以学到许多功课。首先，不同宗派和背景的基督徒可以在宣教工场上合作，但是如果牺牲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和一般的宗教就没什么两样了。其次，必须培养当地的教会领袖，而不是在非西方国家建立殖民式的教会。欧美宗教改革的神学深度是不可超越的，然而，当基督信仰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区域时，永恒不变的真理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大多数宣教士学到了这些教训，所以本土化的基督教得到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教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众传播史(1920-1945)
(公元1900~1945年)

80

比利·桑戴

(Billy Sunday, 公元1862~1935年)

棒球手布道家

19世纪20~30年代，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为教会引入了许多方法以带来新的复兴，但他对人的依靠似乎胜于对神的依靠。他深知良好的组织和戏剧性效果可以有效地得到更多人的回应。差不多100年之后，比利·桑戴成为熟谙此道的高手。

桑戴生于爱荷华州爱姆斯附近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仅有的神学知识还是从基督教青年会的查经班学到的。1883年，他开始参加“大联盟杯”职业棒球赛，先后为芝加哥队、匹兹堡队和费城队效力，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在比赛和旅行的间隙，他经常光顾城市酒吧和剧院，对那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用语非常熟悉。

1886年，在为芝加哥“白袜”队效力期间，他曾到访过太平洋花园宣教教会，在那里听到了福音并获得重生。在随后的

几年，他一边打球，一边在基督教青年会发表励志演说。1891年起，他彻底离开了球队，开始全职传教。为了传道，他放弃了每年5000美元的薪金（这笔钱在今天人的眼里看来似乎算不得什么），而基督教青年会每月仅支付给他75美元。

1893年，桑戴成为福音布道家瓦尔特·查普曼(Walter Chapman)的传道助手。两年后，当查普曼成为牧师时，桑戴也开始了自己的传道生涯。他先从中西部的一些小镇上开始做起。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得不卷起布道用的帐篷，开始了在芝加哥、波士顿和纽约的福音布道之旅。他深谙街头智慧，心里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些对战时的大城市民众有很强的吸引力。

桑戴富有表演天赋，是一个具有演员气质的布道者。他那种活灵活现的表现方式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位歌舞演员。他拿自己的成长背景打趣，称自己为乡巴佬。听众都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表现方式。他无拘无束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描述、杂耍艺人般的动作表情经常引来观众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桑戴成了镇上的一大看点，他的名字开始常常见诸报端。

接下来，喧嚣纷乱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对桑戴反对嗜酒的题目不再感兴趣，他对宗教的调侃也不再引人关注。桑戴接到的讲道邀请日渐稀少，最后再也没有了。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桑戴又重新回到了他刚开始传道时停留过的中西部小镇。

桑戴曾在近200场布道会上向近1000万人讲过道。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仅在1917年这一年中，他就为基督赢得了10万个灵魂。一些人声称自己所居住的小镇有20%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就算当时人们普遍把外在的强烈情绪反应当做悔改信主的标志，仍有人质疑桑戴的听众是否真正重生得救。上帝的确使用桑戴将福音传播给众人，但是，有许多人来听他讲道，其实只是为了参加他所举行的爱国大游行或反嗜酒游行，有些人则是希望穿过拥挤的人群和他握握手。当曲终人散、人们的情绪重归平静之后，愿意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依然寥若晨星，生命真正得到改变的人屈指可数。



81

基要派与自由派的论战 (公元20世纪20年代)

走向极端

20世纪初，自由主义人士对基督教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至少看起来是如此。基督的神性及其由童贞女所生的事实，人类堕落的本性及其对救恩的需要，耶稣的代人受死及其后来的复活，特别是圣经的启示性及其可信性，这一切均受到攻击。基督教的神学理念被一种人类可以自赎的乐观论调所取代，这个观点的出现是宗教演变的结果。

自由主义神学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的德国大学校园，后来由在欧洲学习的美国人带回到美国。根据自由主义神学的观点，真实的宗教并不存在于书籍当中，而是存在于我们对上帝的感知中。这样，神学不再以圣经真理为基础，而开始强调个人对上帝的 subjective 经历。自由主义神学理论最完美的应用就是提倡人人行善的社会伦理，即博爱，这样“上帝的国”就能在地上实现了。自由主义神学对传统信仰的冲击日趋严重，因此，

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在1910~1915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小册子，名为《基督教基要真理》（*Fundamentals*），以此捍卫基督教的核心真理。

1925年，田纳西州代顿市发生的“斯科普猴子实验事件”使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峰。约翰·斯科普（John Scopes）是高中的一名自然科学老师，他因为公开挑战田纳西州禁止教导进化论的法律而被定罪。充满敌意的东部媒体大肆炒作这个事件，他们将信奉创造论和基督教的信徒称为冥顽不化的乡巴佬。后来，百老汇还根据这个事件排演了《挑战上帝》（*Inherit the Wind*）及另外两部片子，基督徒的负面形象因此散播到全国，对基督徒的坏印象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

受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一些大学、神学院和教会开始偏离他们原来的信仰。基督教基要派人士则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并采取了与现代文化划清界限的方式抵制自由主义神学的侵蚀。当自由主义神学开始侵占神学院和讲台的时候，基要派人士的回应是以激进的、分裂主义的观点看待整个生活——尤其是思想领域。他们消极避世的态度使得“反智主义”在他们当中一度盛行。他们把人们（甚至包括基督徒）接受教育并拥有知识看做危险之事，并把人的情感和经历高举到比思想更重要的地位上。

“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自由主义饱受打击。如果“人之初，性本善”是正确的，如果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

进步发展，那么这些深重的灾难是从何而来呢？自由主义人士在面对人类这些极其邪恶的暴行时也变得哑口无言。人类堕落的本性以及我们对自身之外救恩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仍然会听到一些自由主义神学的理论，但它们已不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了。

基督教基要派虽然存活了下来，却也是遍体鳞伤。自“斯科普事件”以来，公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一直很消极，基要派信徒也仍然持守着自己自杀式的、反对一切的分裂主义立场。终于，20世纪40年代，卡尔·亨利（Carl Henry）和葛培理出现了。他们向人们展示出保守派基督教的一种更成熟的形式，它并没有在基督教的核心真理上妥协，这标志着现代福音派的诞生。

现代福音派重视人的思想，他们相信上帝呼召基督徒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而不是消极地逃避它。因此，现代福音派在社会上得到了比基督教基要派更广泛的认同，但同时它也面临着挑战，那就是，在维持社会认知度的同时，它是否需要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上有所妥协，或者是在文化无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情况下，放弃基督徒警戒世人的责任？基督徒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传递真理、影响社会是自己的责任。

82

格雷欣·梅琴

(J. Gresham Machen, 公元1881~1937年)

不是基要派的基要派

在自由主义神学与基督教基要派的论战刚开始时，格雷欣·梅琴曾说：“错误的思想是人们接受福音最大的障碍。”他敦促基督徒不要撤出这场思想之战，但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还是退出了。当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停止学习和思考的时候，自由主义势力一下就席卷了美国所有的大学和讲台。梅琴虽然是基要派的重要代言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一名基要派信徒。虽然他接受了基要派的大多数神学观点，但作为一名学者，他却无法接受基要派狭隘的反智主义及律法主义倾向。

梅琴出生于巴尔的摩一个声名显赫的律师家庭，家里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他的父亲不仅喜欢阅读经典著作，还喜欢阅读那些绝版书。他的母亲则喜爱阅读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1901年，梅琴获得了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文学

系的学士学位。接下来他又在这所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课程，与此同时，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哲学研究生学位，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了神学学士学位。大学教授看到他实在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就力劝他前往欧洲继续求学。后来他去到德国，一个学期在马尔堡大学，另一个学期则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处在对圣经进行高等批判的学术中心。

从欧洲回国后，梅琴成为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教导新约圣经。1921年，该院的发言人、学者沃菲尔德（B. B. Warfield）去世后，普林斯顿基督教保守派的领导权便交到了梅琴手中。10年后，自由主义神学的阵营占据上风，梅琴受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及自己教会（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PCUSA）的双重攻击。1929年，他和支持自己的教职员工离开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前往费城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后来梅琴成立了一个新的宣教机构，想借此抵制自由主义神学对长老会宣教士的影响，但他这个举动却导致长老会于1935年停止了他的服侍。他和朋友们离开了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成立了美国长老会（PCA），随后又将其更名为正统长老会（OPC，今天的美国长老会是在它成立十几年之后成立的）。1937年新年夜，梅琴前往北达科他州俾斯麦市为他新成立的教派寻求支持，半路死于肺炎。

梅琴的作品深受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欢迎。那些持自由主

义神学观点的人根本无法辩得过他，他的那些深思熟虑、论证严谨的观点令对手们望而却步。他对自由主义的驳斥也深入人心，他说自由主义神学根本不是基督教的一个新教派，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宗教。它把其信仰的核心放在人类自己的身上，并借用了基督教术语，试图推广自己的神学理念。它不过是一个伪装得极其粗劣的“独一神”宗教（即反对“三一论”并否认基督神性的宗教），梅琴还挑战这些自由主义神学的倡导者们，叫他们最好诚实地承认这一点。

梅琴可谓是学者中的学者。在面对仇敌的攻击时，他为了捍卫上帝的真理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动摇，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自由主义神学泛滥、基督教基要派提倡反智主义时，他不断为真理奋战，既没有放弃信仰，也没有放弃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向人们展现出—一个持有正统基督教信仰的顶尖学者的形象。



83

卡尔·巴特

(Karl Barth, 公元1886~1968年)

“新正统运动”的得胜者

没有一个人喜欢独自去面对一群人，尤其是当这群人里既有你的朋友又有你的敌人的时候。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在与德国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及希特勒的纳粹党对抗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

20世纪初，自由主义神学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然而，巴特却坚持抵挡住了这股潮流的侵袭，开始了一场神学革命，后来被人们称为“新正统运动”。在面对纳粹党的疯狂举动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

巴特出生于瑞士的巴塞尔，父亲是一名改革宗牧师，同时也在大学里教导新约圣经和教会历史。巴特在欧洲最顶尖的大学里接受了教育，并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神学家那里接受了自由主义神学的基本思想。1911~1921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头10年，他在一个乡村教会里担任牧师。由于每周都需要讲道，他不得

不认真地阅读圣经，同时他也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最终，他得出结论说，自由主义神学根本不符合圣经，完全是错误的。当自由主义神学大肆鼓吹人性本善的时候，你看到的却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法国的战壕里被机关枪扫射而死，自由主义神学对这样的事应当作何解释呢？就像故事《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诚实的孩子一样，巴特说出了实话，他宣告自由主义神学完全站不住脚。

后来他在几所不同的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了纳粹党夺取政权后的暴行。然而比纳粹主义更令他感到痛心的是，教会居然对纳粹党的行为听之任之。德国教会里的一些人甚至还尝试在纳粹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寻找共同点，并在讲道中称耶稣是雅利安人，是犹太民族的统治者。巴特立即指出了教会这种疯狂的举动违背了圣经。1934年，他协助成立了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试图将德国教会重新带回正途，勇敢地反击纳粹的极权主义。结果，他被波恩大学开除了。此后他在自己的家乡巴塞尔大学任神学教授，并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

他在自己所撰写的《罗马书注释》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本性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善良，而是已经完全堕落，因此人类根本无法在自己的里面找寻到上帝；事实上，若上帝自己不亲自显明他自己，没有人能够寻找到他；而基督教正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启示给人类的真理，基督进入人类历史，为我们的罪钉

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借此将救恩带给了我们。

巴特的思想无异于一枚炸弹，投向了自由主义神学阵营，于是他们开始向他咆哮，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则开始向他鼓掌。不过，后者很快发现，他对圣经启示及其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说，圣经并不完全都是神的话，而是有一部分是神的话；圣经并不是来自神的直接启示，它记载的只是人类对上帝启示的回应。

结果，巴特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承认，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非巴特莫属。虽然他最初也来自自由主义神学的阵营，但后来他一直在尝试将自由主义神学拉回到正统基督教的根基上。即使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完全归回，但正是他亲手埋葬了自由主义神学发展成为经典神学的希望。

无论如何看待巴特的神学思想，人们从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学到的教训是：无论遭到朋友还是仇敌的反对，都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20世纪
(公元1900~1945年)

84

路易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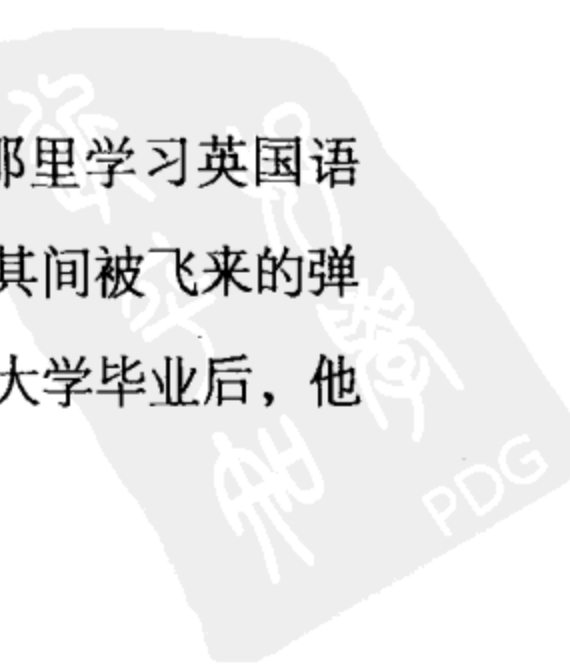
(C. S. Lewis, 公元1898~1963年)

从无神论者到护教者的转变

1963年11月22日，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一幕，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天，C·S·路易斯离开了这个世界。

路易斯出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一个新教家庭，他们全家都热爱读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阅读大量书籍并将自己编撰的故事写下来。9岁时他的母亲去世，此后他便将自己完全封闭在个人世界中，只和自己所喜爱的书待在一起。路易斯虽然从小就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他对母亲的死总有些耿耿于怀，认为这是上帝没有垂听他祷告的结果，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不再信上帝了。

他曾就读于莫尔文学院和牛津大学，在那里学习英国语言及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其间被飞来的弹片炸伤，这使他得以重返校园。1925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



留校成为英国语言及文学系的一名教员，一待就是30年。后来他被剑桥大学授予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教授一职（1954~1963年）。

路易斯一生酷爱读书。他最喜爱的作家是乔治·麦当纳（George MacDonald）和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这两人都是基督徒，这对他无神论的信仰实在是个极大的挑战。路易斯的两位密友也是基督徒，其中一人本来是无神论者，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在牛津大学教书期间，他与托尔金（Tolkien）成为朋友，后者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路易斯突然发现自己所喜爱的作家以及大多数朋友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些聪明绝顶的人。当神开始在他身上动工时，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不认同信仰的合理性，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内心挣扎，他终于在33岁时成为一名基督徒，并在文学创作上展露出他卓越的才能。

路易斯不只是一名作家，他知识渊博、想象力丰富、写作才能十分出众，这使他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才。他的作品根本不能说是“佳作”，只能说是“经典”，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如儿童读物、大众护教学及学术专著等）都是如此。他所写的众所周知的作品有《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1942）和《纳尼亚传奇》系列（*The Chronicles of Narnia*）（1950~195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那些日子里，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在电台发表了7次讲话，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后来这些讲话稿被集结成书，并以《返璞归真》

(*Mere Christianity*) 为书名发表了出来。

路易斯一直没结婚。将近60岁时，他遇到了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人乔伊·戴维曼·格丽莎 (Joy Davidman Gresham) 并与她结婚。格丽莎以前也曾经是无神论者。两人结婚刚几个月，格丽莎便被查出患有癌症，但是后来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两人共同度过了将近3年健康、幸福的时光，直到1960年格丽莎去世。格丽莎的去世让路易斯感到巨大的伤痛。第二年他用笔名撰写了记录着他私人生活片段的《卿卿如晤》 (*A Grief Observed*) 一书，由于书中的内容太过私密，他不得不以笔名写作发表。

路易斯一生共出版过39本书籍以及近百篇篇幅较短的作品，如诗歌、短文、小册子、短篇小说及评论文章等。作为最知名的基督教护教者，路易斯带来的影响实在难以估量，因为直到今天这影响仍然存在。他的书籍一年可卖到200万册，目前的总销量已接近5000万册，未来的销售量仍很可观。再过500年，肯尼迪总统可能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了，但C·S·路易斯的书籍却会继续被阅读，人们也因此会记得他的名字。



85

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 (公元1934年)

人人读懂神的话

没有任何一种版本的圣经能与母语圣经相比，因为这是用我们牙牙学语时就明白的话写成的，其他语言无法带给我们这种熟悉感与鲜活感。当所有普通民众人手一册圣经时，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改观了。耶柔米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威克利夫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他们的工作将神的话语传播到每一个人心中，使他们的文化得到永久性的改变。

19世纪时，要传福音就必须翻译圣经。为了能使那些从未读过圣经的人拥有一本圣经，人们翻译出近500个版本的圣经。大多数在宣教前线工作的宣教士们基本上也是圣经的翻译者。到了20世纪，语言学学科的设立为圣经的翻译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是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该机构是一个非宗派组织，主要从事多语种圣经的翻译工作。

1917年，威廉·卡梅隆·汤森（William Cameron Townsend）在中美洲地区分发西班牙语版圣经，因此产生了成立圣经翻译协会的想法。当时生活在危地马拉偏远地区的20万卡吉克印第安人（Cakchiquel Indians）中，大多数并不懂得西班牙文。当地曾有人问汤森，如果上帝果真像他所说的那么聪明，怎么能不会说他们的语言呢。于是，在接下来的12年中，汤森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语言的学习中，并于1929年完成了卡吉克语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虽然卡吉克语的翻译工作异常艰辛，但是汤森知道这就是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

1934年，汤森成立了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为从事圣经翻译的人提供多语种培训，并以约翰·威克利夫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机构。威克利夫是14世纪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牛津大学学者（见本书第35篇）。20世纪30~40年代，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为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部落翻译圣经。1953年他们开始从事亚洲语种的圣经翻译工作，1962年又开始了非洲语种的圣经翻译工作。此后，他们逐渐成长壮大为世界上最大的宣教机构，拥有5000名宣教士，并安排了丛林飞行员及通讯专家配合这些宣教士的工作。目前他们正在从事好几百个语种的圣经翻译工作，每年都有三十多个语种的圣经翻译版本问世。

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和另一家与它性质相同的翻译机构——夏季语言学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正在致力于向学生们传授一些方法，教他们如何将人们口头发出

的声音转化为书面语言、如何创造字母表、破译语法、教人识字，还有一些翻译圣经的技巧。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与当地
 人合作密切，他们已将圣经翻译成350多种不同的语言，而新约
 圣经已被翻译成50多个国家的近900种不同的语言。很多语言从
 前都没有文字形式，当地人拿到圣经时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语
 言变成了文字。

尽管圣经翻译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剩下的工作仍十分庞
 大而艰巨。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的人口数量爆炸式地增长，
 这就要求基督教的传播速度要更快。如今全世界总共有5000种
 语言，而圣经仅被翻译成其中的1500多种。

圣经的翻译工作对完成“大使命”很有帮助。将上帝的话
 语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使得神的话对人的影响不再只是表面的
 和外来的，而是得以深入到各个文化的里面乃至核心。然而，
 福音时代还远未结束。21世纪很有可能会超越19世纪，成为前
 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福音时代，而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很有
 可能会投入到这个时代第一线的福音工作当中。因此无论是年
 轻人、退休的老年人，还是那些希望有机会服侍上帝的人，都
 不妨考虑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圣经翻译工作，它虽然
 充满挑战却富有深刻的意义。



86

朋霍费尔

(Dietrich Bonhoeffer, 公元1906~1945年)

做门徒的代价

当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章24节）的时候，听见的人都仿佛看见了那个十字架。十字架是罗马的一种酷刑。耶稣对那些愿意成为他门徒的人说：“如果你们要跟从我，就不要再在意人用对待犯人的态度对待你，而且你们还要随时准备牺牲。”朋霍费尔对耶稣的这句话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这个人和他一起去死。”

朋霍费尔出生在柏林一个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之家，全家一共有8个孩子。他曾在自由主义神学最后一名大师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的手下受教，后来转去随从巴特。21岁时，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神学博士学位。朋霍费尔聪明过人，有着牧者的心肠，他对牧养的热情远比对学术更高。1930年，他接受按立成为牧师。当时有许多德国牧师选择

跟从阿道夫·希特勒。

因为朋霍费尔反对纳粹，柏林大学解除了他附属教堂牧师及大学教师的职位。此后两年他在伦敦的一家教会做牧师。两年后，他回到德国，在费因克瓦尔德成立了一家小型的地下神学院。1937年，纳粹强行关闭了这家神学院；第二年，他们要求所有的牧师向纳粹效忠。朋霍费尔拒绝了这个要求，再次访问美国，试图寻找服侍上帝的最佳之地。朋友们请求他留下来，但因为看到许多德国基督徒在纳粹党手下噩梦般的遭遇，他决定重返德国。回国后，他既不能讲道也不能写作。不久之后，他参加了一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

1943年，朋霍费尔因将犹太人偷运到瑞士而遭到逮捕和监禁。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并遭到严刑拷打。他曾想过自杀，以免自己在压力下崩溃、出卖朋友。但是他既没崩溃，也没自杀。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甚至还给他提供了一些“奢侈品”，诸如书籍和写作用品等，还允许友人来探访他。他在监狱中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一边安慰着其他的狱友，甚至还有狱卒。

1945年春天，盟军长驱直入德国，纳粹知道自己的气数已尽。但希特勒不想让那些有影响力的囚徒落入盟军手中。因此，4月9日，当苏联红军接近弗罗森堡集中营的时候，朋霍费尔及其朋友被处以绞刑，他死时年仅39岁。教会又多了一名殉道者，世界则少了一名斗士。

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形成于他的求学、坐牢两个时期。他

说，真正的基督徒远不止于做一名门徒就够了，而要像耶稣那样彼此服侍，甚至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去宗教化的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是一个活泼的信仰，依赖内心深处的属灵源泉而非外在的宗教仪式，这信仰将属灵的真实注入每天的生活之中。他的这些神学思想记录在他的《狱中书简》（*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做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以及《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等书中，这些书直到今天仍在激励并影响着基督徒，甚至那些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

朋霍费尔激励人们，不要对上帝的恩典等闲视之，只把它当做廉价的礼物，而是要在上帝的面前做出严肃而庄重的承诺。在这方面他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他一路跟随耶稣一直到走上了绞刑架。这个得享上帝儿子荣耀的人，这个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神学家之列的人，就这样惨死在地上最邪恶的罪人手中。

第十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公元1946年至今)



87

死海古卷 (公元1947年)

从古籍中学习

经过数个世纪的历史变迁，那些使教会得以建立的古代文献是否仍值得人们的信赖呢？在复制的过程中，这些文献的内容是否有所改变呢？考古发现一再证实了这些文献的准确性，死海古卷则是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代文献。死海古卷是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写成的上百册古卷本的通称。这些古卷是在死海西北角附近一个山沟的11个洞穴中找到的，它们被藏在那里已经有190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它们为什么会被藏在那里呢？

曾有某个犹太教派的一小群人预测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他们相信在末日之前世上会发生很邪恶的大事，于是便隐退到旷野，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名为昆兰（Qumran）的社团。这些人很可能是奉行分裂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爱色尼派（Essenes）。但是他们所预测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发生。而在公元66~70年，犹太人

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时期，因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犹太国遭到倾覆，犹太人分散到各处，昆兰社团也不复存在。他们中有一些富有预见性的人，决定将他们的文献藏起来。在罗马军队大兵压境前，昆兰社团的居民就将自己的手稿打包放入瓦罐中，然后把它们藏到洞穴里。后来，这些人可能逃到别处，也可能被杀，但是他们保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文献则十分安全。

时光荏苒，一晃1900年过去了。一天，一个阿拉伯的放羊娃在牧放羊群的时候弄丢了一头山羊。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向一个山洞投掷了一块石头，希望能借此将山羊轰出来。但他并没有听见羊的叫声，而是听到了瓦罐碎裂的声音，吓得他赶忙逃走了。后来他重返原地想看个究竟，结果竟发现了一堆年代久远的瓦罐，里面装满了古代手稿的残片。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瓦罐中装的是古代文献。这些文献最终落入了专家手中，他们开始仔细研究这些文稿，并将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的手稿。这些手稿不仅令专家们目瞪口呆，也震惊了整个学术界。手稿中有一百多卷旧约圣经经卷，都是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50年期间抄写完成的。

圣经注释学家从这些旧约圣经的经卷中发现了一些内容，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一些经文的内容。古卷中那些非圣经类书卷让我们了解了昆兰社团的信仰和生活状况，也得知了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宗教活动情况。此外，文献还让我们对基督教创立初期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有些学者甚至认

为耶稣认识这些爱色尼人，并针对他们的教导提出过自己的建议。

这些文献发现最积极的意义是，我们可以将现有的旧约圣经经卷与更为久远的古卷本做比较。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圣经是公元9~10世纪时抄写的马索拉抄本（Masoretic Text），这个文本的圣经要比死海古卷晚了近1000年的时间。圣经经文研究学者发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旧约圣经与古卷本的圣经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其中只有几处不一样，后来的圣经版本都做出了更正。

死海古卷这样的考古发现，表明了我们目前所读、所查考的圣经的可信性。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圣经的内容与上帝向先知及使徒启示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公元1945年至今)

88

卡尔·亨利

(Carl Henry, 公元1913~2003年)

福音派巨人

我曾听见有人这样描述一个聪明人：“他天生脑量巨大，而且里面一点儿空间也没有浪费。”然而卡尔·亨利比这里描述的聪明人还要更聪明。20世纪中期的美国，有许多人推动自由主义神学和基要派神学向福音神学过渡，其中贡献最大的恐怕非卡尔·亨利莫属了。

20世纪40年代，许多基督教保守派的神学家对基要派的反智主义、孤立主义及其狭隘的态度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基督徒开始在自由主义神学以及基要派神学之间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他们首先成立了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接下来又成立了许多神学院、大学、出版社，并开始组织面向年轻人的福音布道工作。亨利所写的《现代基要派带给人们良心上的不安》（*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可算是现代福音派神学

的代表作，它呼吁基督徒在坚持圣经真理的前提下，一生追求神的智慧与恩典。

亨利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是8个孩子中的长子。在长岛读完高中后两年，他在纽约的一家知名报社开始工作，并在报社同事的带领下信了主。1935年，他前往芝加哥的惠顿神学院读书，获得了学士及硕士学位。几乎是同期，他在北方浸信会神学院获得了神学学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他又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并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学位。

一个聪明绝顶、得到双博士学位的人会拥有怎样的一生呢？最开始，他加入了富勒神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职员，接下来他又成为福音派神学学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的创始会员。1955年，亨利接受葛培理的邀请成为《今日基督教》杂志的首席编辑。再后来，他在东浸信会神学院成立了进深基督教研究院，并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1969~1974年）。接下来，他又成为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的国际发言人。此外，1977年他还帮助筹建了圣经无误理事会（*The Council of Biblical Inerrancy*）以增强保守派基督徒在经文解释上的可信度。

亨利著述颇丰，在这里实在难以一一列举。但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他所写的《上帝、启示及权柄》一书，该书共分6卷，论述了传统的一神论观点、圣经无误论观点以及我们对超自然启示的需要。这部丰碑式的著作虽然

不是让人们在睡前或在飞机上打发时间用的消遣性读物，但它却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头两卷书出版后仅6个月即销售一空，不得不再版。6卷书全部出版之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决定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也给他写信，称赞他的作品。

亨利的影晌遍及世界，受其影响的既有思想家、神学家、牧师、布道家、出版人和政治家，也有教会及各类机构，还包括普通民众。作为福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福音派运动的贡献超过所有人，他为千百万福音派信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音派巨人，但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到了晚年，亨利接受的荣誉不计其数，在他已有的2个博士学位之外，他又被授予6个荣誉博士的学位。

福音派人士要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背景，就必须来认识这位开辟了福音派道路的卡尔·亨利。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天资聪颖，但人们总可以像亨利一样，尽可能地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聪明才智。



89

葛培理

(Billy Graham, 公元1918~)

简洁的福音

在周六的足球赛场上，体育场里挤满了高声尖叫的球迷，他们在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同样是在这些体育馆里，曾有千百万人聆听葛培理的福音布道。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那些布道会实际的属灵果效如何，但仅从外表的效果上看，葛培理不愧为历史上最多产的福音布道家。在他19岁时，他做了第一次布道，那时谁也没有想过这个人以后会享誉全球——人们邀请他在一次周日晚间的聚会上讲道，他勉强同意了，之后仅用了8分钟就把原本要讲4次、每次45分钟的讲道讲完了。

葛培理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附近的一个虔诚的农场主家庭。小时候他并不热衷于教会里的事情，虽然他也去教会，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16岁时，他和几个朋友参加了福音布道家末底改·汉姆（Mordecai Ham）举办的一次复兴大会，本来只是希望在那里能找些乐子，最终他却在这次复兴大会上

悔改信主。高中毕业后，他进入鲍伯·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学习，由于那里的生活太过压抑，他便转入佛罗里达圣经学院学习。之后他又前往芝加哥的惠顿神学院，在那里学习人类学。

在加入基督教青年会（Youth for Christ）之前，1943年葛培理成为芝加哥一间教会的年轻牧师。从1947年至1951年，他一边在小型福音布道会上讲道，一边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西北圣经学院担任校长。1949年，他在洛杉矶举行“烈火布道会”期间，有好几个好莱坞的明星宣告信主，出版商伦道夫·赫斯特（Randolph Hearst）将这件事刊登在自己的报纸上，大肆渲染之。不久之后，全美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始向葛培理发出了布道邀请，所以他不得不每年举办好几场大型布道会，其中有许多通过全美的电视网向公众播出。

葛培理成立了葛培理布道协会（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BGEA）负责制作广播节目、电影并运营《决策》杂志。他还撰写专栏文章并出版了好几本书籍。除此之外，他还和朋友卡尔·亨利（Karl Henry）一同创办了《今日基督教》杂志。多年来，葛培理布道协会组织并举办了好几场大型国际福音布道会，吸引了数千名来自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传道人参加。

葛培理的神学思想极其简单，他首先谈论人类的罪性，然后他强调人类对救赎的需要，然后他会告诉人们基督已经为我

们的罪受死。这个简单的福音真理成为他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他的信息清晰易懂，让人们很容易就能接受上帝的赦罪及永生的恩典。

葛培理是历史上传播福音最广、听众也最多的人（有超过1亿人听过他的现场布道，还有上百万人从广播里听过他的布道）。在他的听众中，有将近300万人接受福音悔改信主，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当然，他所接受的并非只有赞美。持自由主义神学观点的人指责他缺乏社会责任感，基要派人士则批评他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团体合作。

葛培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Eisenhower）及以后历任美国总统的朋友及顾问，他同时也是历任英国首相、英国女王和好几位教皇的朋友和顾问。“水门事件”曝光后，他与政治人物的交往开始变得谨慎起来，然而几十年来，凡有国葬或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都会邀请他作为宗教界的代表参加。

葛培理在福音布道上展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热情，给人们树立起一个虔诚忠信的榜样。



90

吉姆·艾略特

(Jim Elliot, 公元1927~1956年)

巨大的牺牲

吉姆·艾略特的父母每天都给孩子们念圣经。1945年艾略特进入惠顿神学院学习时，由于从小所接受的训练，他已经养成了极为良好的生活习惯。他相信简单的生活（不受多余事物缠累的生活）才是荣耀上帝的最好的生活。他早年所受的训练以及他的人生观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助益。

毕业后，艾略特知道神要带领他进入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群当中传福音，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厄瓜多尔亚马逊河流域的奥卡族印第安人。在反思自己不准备牧养美国年轻人的决定时，身在厄瓜多尔的他这样写道：

“身处美国本土的年轻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学习、聆听和理解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神的道，这样的机会是这里的印第安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拥有

的……这里的人对福音一无所知，美国本土的年轻人和这里的人在知识、机会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当我看到这一切，我就知道神为什么会带我到这里来。那些充满抱怨的美国年轻人……他们虽然拥有圣经，却对它充满了厌烦，而这里的人却从未听过一种叫做文字的东西。”（摘自伊丽莎白·艾略特《穿越荣耀之门》）

1955年，艾略特和另外几名宣教士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奥卡宣教（Auca Operations）的组织，他们是纳特·赛因特（Nate Saint）、彼得·弗莱明（Pete Fleming）、罗杰·尤德利（Roger Youderian）和艾德·麦卡利（Ed McCully）。这个事工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冒险。从来没有人能成功地在奥卡人的领地上定居，几个世纪以来，奥卡人杀死了所有外来者，其中就包括8名壳牌石油公司的员工。

1955年9月，这些宣教士第一次从他们乘坐的小飞机上看见了奥卡人居住的村庄。接下来的几周，他们把礼物放在一只桶里，然后用绳索将桶固定在飞机上，将装着礼物的桶慢慢地从飞机上垂下去，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与奥卡人保持接触。尽管有人事先警告他们这很危险，但他们还是决定进入奥卡人的领地，他们坚信，要为基督赢得这些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冒险还是值得的。

1956年1月3日，他们进入库拉赖河（Curaray River）流域的一片浅滩。头一天，他们已用飞机将所有的必需品都运了进来，并在浅滩上搭起了一顶帐篷。3天后，他们见到了3个奥卡人，甚至用飞机载着其中一个人在天上飞了一圈。1月8日，在飞越奥卡人的村庄时，纳特看到有一群人正在朝着宣教士帐篷所在的方向行进，于是他将飞机降落下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正准备开会的吉姆和其他几个人。不久之后，这5个人都被奥卡人用长矛刺死。

过了两年，两名宣教士的遗孀接续她们丈夫的工作，进入到奥卡人中间向他们宣教。虽然这次向奥卡人的宣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上帝的工作却得以在奥卡人中展开，使许多奥卡人决心像艾略特一样认识并服侍基督。更值得欣慰的是，当艾略特和其他几个宣教士的故事传到美国时，有几百名美国的年轻人决定将自己献身给宣教事业。

艾略特的妻子伊丽莎白在自己所写的《穿越荣耀之门》一书中摘录了艾略特所写的诗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内心中充满的宣教热情。

“如果神的旨意就是如此，我愿意为拯救奥卡人而死。”

“记住，当你做完手里的工，就会成为永恒。”

“用你手里留不住的东西赢得你不能失去的东西”

西，这样的人是聪明人。”

“我不求活得长久，但求活得丰盛，就像我的主一样。”

虽然吉姆·艾略特只活了29岁，但他带来的影响却持续到永远，因此当人们评价自己生命价值的时候，要记得上帝看重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短。



91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公元1929~1968年)

“我有一个梦”

1963年8月28日，有20万人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那里举行的一个集会，这次集会的最后一名发言人是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黑人牧师，当时他34岁。他在演说中向众人宣告，他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孙能够生活在一个“不会因为自己的肤色和个性遭受歧视”的国家。虽然民权运动早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许多美国白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说。

早在美国内战期间，种族间的矛盾冲突就已经和宗教问题一样成为美国的社会问题。然而到了1955年，因为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发生的一起事件，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罗莎·帕克（Rosa Parks）的黑人妇女。她因为拒绝在公共汽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到逮捕。当地的牧师组织人们对城市公交系统发起了抵制，并推选马丁·路德·金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他接受了这项任命，但坚持要求人们以非暴力的方

式开展抵制活动，即使在白人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也要如此。

金出生时本名迈克尔，他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为了尊荣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参看本书第40篇），他父亲效法他的祖父，把自己和儿子的名字都改为马丁·路德。小时候，金曾经连跳两级。15岁时，他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进入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学习，并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学位。接下来，为了预备好自己去服侍，他又进入克罗泽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并获得神学学士的学位，然后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金的神学思想里既包含耶稣关于爱的教导，又融合了甘地和平主义的主张，甘地提倡在面对社会不公时要采取非暴力手段予以应对。

金服侍的第一家教会是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他在那里担任牧师。此后不久，他加入父亲所在的亚特兰大埃比尼泽浸礼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与父亲一起担任那里的牧师。1957年，金帮助筹办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一个向其他民权组织提供庇护的机构。在此基础上，金开始以各种非暴力方式唤起人们对民权事务的关注。

由于早年帮助他的人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后来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严密监视的对象。金曾批评美国联邦调查局与种族分离主义者合作，这更增加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警觉。在四处蔓延的种族歧视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中，许多人开始憎恨金，其中就包括那些提倡以武力回应种族歧视的黑人。作为那个时代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金开始收到死亡威胁并数次遭到逮捕。1968年4月，他访问孟菲斯，代表罢工的环卫工人发表演说。第二天，他在酒店的阳台上遭人枪杀，死时年仅39岁。

金唤起了人们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是当时许多白人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的。他的努力最终导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1964）和《选举法》（*The Voting Rights Act*, 1965）的通过。这些法令强制性地消除了公共设施内种族分离的情况，改善了黑人在住房和教育上的条件，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1964年，马丁·路德·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代》杂志也将他评选为那一年的“年度人物”，他是第一个得此殊荣的黑人。

金是美国民权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有些人不再顾及良心的时候，他却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良心。从1986年开始，每年1月份的第3个星期一被指定为官方假日，以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诞生。他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是让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团体在全社会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92

弗朗西斯·谢弗

(Francis Schaeffer, 公元1912~1984年)

真正的真理

许多生活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年轻基督徒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询问自己的父母或教会牧师神学问题时，得到的答复常常是“不要问，只要信就行了，不要想得太多”。这样的答复导致一些人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如果人们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得不到切实的解答，为什么还要信呢？然而上帝并不是一位拒绝回答问题的上帝，有一些年轻人就从一个来自瑞士的小个子那里听到了“真正的真理”——这个不变的真理触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弗朗西斯·谢弗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城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上高中时，他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然而通过阅读圣经，他发现了自己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这个发现使他将自己献给了基督。在汉普顿-悉尼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期间，他遇到了伊迪丝·塞维里亚 (Edith Seville) 并与

她结婚。伊迪丝与他一起服侍，后来她成为一名知名作家。接下来他又进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及信仰神学院攻读研究生的课程。

1948年，教会理事会决定差派他们夫妇二人前往瑞士，在那里调查在欧洲保守派与自由主义神学争战的情况。在此之前，谢弗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和圣路易斯的教会做牧师。后来他们留在欧洲做牧养工作，并取得了成效，数以千计的生命被改变。1951年，谢弗经历了一次属灵危机，经过数月的思考和反思，他不仅完全被自己的信仰所折服，而且每天都更深地经历到复活的救主。头脑上对真理的确信再加上属灵上活泼的经历成为他事工的主要特色。

在瑞士期间，谢弗夫妇经常邀请外国留学生到家里讨论诸如生命、真理、哲学、宗教、艺术和文化之类的大问题。谢弗诚挚热情地回答所有问题，以致有人说人们可以在阿尔卑斯山脉这个最不起眼的地方找到自己所要的答案。除了组织这类小型的以聊天为主的聚会以外，谢弗夫妇还于1955年成立了一个家庭团契（L'Abri Fellowship）。此后几年，数以千计的学生、学者还有其他人在这个团契中找到了思想和灵性的“家”，他们将自己在这里所学到的一切带回到各自的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中，将生命之道播撒到那里。

1968年，谢弗所写的《理性的释放》（*Escape from the Reason*）和《上帝就在那里》（*The God Who is There*）出版，

这两本书使他的影响波及美国。那些无法参加他的家庭团契的人，通过阅读他的书籍，就可以了解基督徒应当有怎样的世界观、怎样思考问题。他一共写了24本书，已售出几百万本。他还拍过两部系列电影，在各大教派的教会中播放。1978年，谢弗被诊断患有癌症，于是他与伊迪丝一起迁居到明尼苏达罗彻斯特一个靠近梅奥诊所的地方住了下来。他们两人一起在那里服侍，直到1984年谢弗去世。

谢弗是一个哲学家、神学家、教师和作家，但他却称自己为一个福音布道者，一个向知识分子传道的宣教士。他将严谨的思想方法介绍给成千上万愿意深入思考的基督徒。因着谢弗的努力，一大批基督徒逃离了反智主义的牢笼，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为治学严谨的学者，至今还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着这个世界。



93

耶稣运动 (公元1967~1974年)

耶稣迷

有一个年轻的教会领袖，牧养着好几百个刚信主的年轻人，他得带领并教导他们。这些人刚刚信主，很想学习圣经，也愿意为基督而活，但是他们对其他事还不是很明白。这时，有人过来告诉他，教会非常欢迎这些年轻人，但是他们必须理发、洗澡并穿上鞋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在耶稣运动期间，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有些牧者试图以现有的方式牧养、教导这些年轻人。

从20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西方文化发生了改变，一些心灵得不到满足的年轻人开始寻求生命更深层的意义。在反对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他们掀起了一场名为“耶稣革命”的运动。这些激情洋溢的年轻人，不是嬉皮士，就是以前流落街头的吸毒者，要不就是教会眼中的问题青年（Straight Kids），但他们都跟随荣耀的释放者耶稣。虽然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群

体，却拥有共同的信仰：耶稣是人类唯一的道路；他是上帝的儿子，拥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他很快就会再来；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是否犯过罪、长相如何，你都可以来亲近他；还有，这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而圣经是一本从头到尾讲述真理的书。

耶稣运动起始于1967年旧金山市海特-阿什伯里区的一次店面宣教活动（**Storefront Mission**），这次活动挑起了反对主流文化的热潮。嬉皮士的消息总是传播得又快又远，不久之后，耶稣社团就在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西雅图成立了“耶稣子民军”（**Jesus People Army**），好莱坞成立了“日落带”（**Sunset Strip**）。规模小一些的城市也不例外，比如，奥马哈的一些年轻人，为了寻求耶稣去了“基督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hood**）和“灵魂关注会”（**Soul Concern**）。科罗拉多州博尔多市的“耶稣迷”们则聚集一些和“耶稣基督”的名字有关的地方，比如“JC电力公司”（耶稣基督的缩写）。

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开始出现写有“耶稣”字样的咖啡店和报纸，汽车保险杠上也贴着关于耶稣的贴纸。拉瑞·诺曼和其他基督徒音乐家还一同谱写并演唱了一首带有摇滚风格的福音歌曲。教会里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向世俗妥协的表现，但这一群体愿意接受那些被一般教会拒之门外的年轻人。“基督教世界解放阵线”（**Christian World Liberation Front**）起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布道会，它主要面向校园中那些激进分子。后来加州大学一个名为“伪灵

剖析会”（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的事工指出它具有异端倾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早期的各种浪潮逐渐消退之后，主流文化重又稳定下来。那些耶稣子民的情况如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情绪平息之后，热情不再；有些人甚至随流失去，因为他们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们的教会；少数人仍然忠实于这个运动，如芝加哥“美国耶稣子民”（Jesus People USA）的那些人；有些人则成立或加入了诸如“阿拉莫协会”（Alamo Foundation）或“上帝子民会”（Children of God）之类的极端组织；当然，还有许多人加入了福音教会，其中有些人至今仍在这些教会从事牧者和领袖的工作。今天，从大多数教会轻松愉快的敬拜气氛以及现代基督教音乐的发展中，都能看到耶稣运动带来的影响。



94

特里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公元1910~1997年)

爱，照亮黑暗的角落

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见证了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现象。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得比过去的国王还要奢华，与此同时，一些赤贫者却活得异常凄惨。耶稣教导我们要服侍那些贫困的人，这个时代正需要这样的教导。然而，很少有人能像阿格尼丝·勃亚金（Agnes Bojaxhiu）那样，真正实践这个教导。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那些贫穷、患病和濒临死亡的人。她就是特里莎修女。

特里莎修女是一个阿尔巴尼亚裔的印度人，出生在斯科普里（今属马其顿共和国）。年幼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收入，整个家庭都陷入到贫困当中。然而，母亲在贫困潦倒中仍不忘照料患病的邻居，并在家中收留了6个孤儿。母亲的这个举动为阿格尼丝树立了一个服侍别人的榜样，令她终生难忘。

阿格尼丝12岁时，感受到上帝对她的呼召。18岁时，她加入了一家在印度宣教的爱尔兰修女会。一年后，她被修会差派到位于加尔各答的洛雷托修道院(Loreto Convent)，在那里给一群女学生上地理课。周末她带领这些女学生一起到街上服侍穷人。就这样，她一边给女学生上课，一边服侍穷人，一干就是17年。

1948年，她获准单独进入赤贫者中服侍。她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街道上开办了一个露天学校，教导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小孩子。她离开了修道院相对安全的环境，完全生活在印度的贫民当中服侍他们。1950年，她成立了“仁爱宣教修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专门关爱并照看那些无人照料的人。两年后，她又开办了一家专门收容濒死者的临终关怀之家。

多年后，特里莎修女的事工已扩展到全世界。一直以来她都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事工，直到1969年，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以电视采访的形式将她的事迹报道出来。后来他又写了一本关于特里莎修女的书，描述她的生活及服侍，并把它拍成电影。接下来，特里莎修女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还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及美国国会的接见，并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所有这些荣誉并没有改变特里莎修女献身穷人的心志。

87岁时，她死于心脏病，死后仅几天，就赶上英国戴安娜王妃去世，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戴安娜去世的报道吸引了。然而，特里莎修女带给贫困人群、无家可归者无与伦比的影响，因此全世界都为她的离世感到哀痛。

特里莎修女愿意服侍每一个人，从不惧怕任何一个人，这从她与政府官员及教会代表的交往中可见一斑。她还活着的时候就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而且这些人的信仰和世界观是千差万别的。特里莎修女成立了几百家收容机构，遍布全世界，如今有超过4000名修女在其中服侍着那些贫苦、患病和濒死的人们。

特里莎修女在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时，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工作有多么低贱，也没有计算过自己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她只知道耶稣曾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马太福音》25章40节）她在听到这个教导后，就把它实践了出来。特里莎修女的一生让人们看见，每个教会和基督徒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善行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分担他们的痛苦，享受服侍他们的快乐。



95

培养当地教牧人才 (公元2005年~)

展望未来

教会的活力和领导模式从“犹太全地”向西一直传到欧洲，然后又传到北美洲，如今又传至亚洲。它还从北向南跨越了赤道，进入到非洲及拉丁美洲。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数量迅速增长，并开始向世界上其他地方差派宣教士。当西方教会渐渐被西方文化吞没时，神就兴起了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来复兴他自己的工作。

西方教会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好好吸取上一个世纪的教训。格雷欣·梅琴曾指出，错误的观念是人们接受福音的最大障碍（参83篇），然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指出这个问题的人。1980年，黎巴嫩的政治家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在惠顿神学院葛培理中心的落成典礼上警告说，教会中反智主义的倾向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危险。我们正在放弃与仇敌辩论的舞台。美国信徒似乎并不在意也不关心仇敌正在

发起一场攻打基督教的“思想之战”，而这场战争带给基督教的打击比政治迫害还要严重，它深入到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影响着关于生命的方方面面的思考。如果基督教试图恢复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加入到这场智慧之战，而不仅仅是学者、牧师、教师、作家等专业人士。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的大部分基督徒懒得涉足“思想”这个领域，但是美国的学者仍然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一些带着异象的信徒拥有前瞻性的眼光，他们建立了基督徒智囊团，试图将基督教的世界观更广泛地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当中。这些事工通常都位于大学附近，由潮流引导者及培养后继人才的教师带领。

上帝还赐给美国教会财富和教师，世界上的其他教会都缺乏这些资源。有了钱，可以将教师差派到世界各地，培养当地的教牧人才。上帝透过学校成就这些事。比如，他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基督教大学培训教牧同工，然后将他们差派到前苏联各共和国工作。他还使用高科技的事工手段——比如网上神学院——培训教会领袖，受训的人通常来自贫困国家或是禁止神学培训的国家。

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寻求自己在神永恒计划中的位置。对大多数美国信徒来说，很明显，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要遵循西方文化的理念，重视自我中心、自我感觉、自我价值，还是愿意为了获得永恒而丢弃一切？

教会的历史已经有2000年之久，如今你我也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这一切将记录在天上，将来供所有的人阅读。当我们每天都在实践自己的信仰、跟随属灵长辈的足迹时，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的一生中，我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